锦州文史资料

一至五辑合订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

锦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再版前言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政治任务，对于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锦州文史资料》第一至四辑（油印本）系"文化大革命"前，锦州市政协秘书处编辑出版的。所载资料，包括政治、军事、人物、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是锦州地区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此次合订再版时，除对个别文字勘误外，没作改动。

《锦州文史资料》，将陆续出版以后各辑，欢迎各界人士踊跃投稿。稿件应以亲历、亲见、亲闻为重点，力求真实，去芜存菁，不应虚构。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再版前言

（一）

东北第四路抗日义勇军的回忆

……………………宋九令口述　高坦整理（1）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进锦州的情况………刘梦九（6）

锦州市国民党内幕……………………………马士奎（11）

（二）

郑天狗抗日的回忆……………………………李在南（39）

北镇地方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的斗争实况

……………………………………………肖广谱（50）

伪满热河省坚壁清野政策之我见……………春　风（57）

国民党统治黑山的内幕………………………李香圃（71）

我所知道的东北军阀张作霖…………………赵子良（84）

（三）

锦州大军阀张作相的发家史…………………高　坦（93）

锦州军阀汲金纯的罪行片断…………刘梦九　高问樵（113）

黑山县著名匪首老二哥（李魁武）的罪行和下场

……………………………………………郝让先（119）

（四）

锦州军阀郭瀛洲的罪行记略…………………刘文朴（130）

我所知道的“万国道德会”…………………毕玉洲（143）

梨果之乡话今昔……………………李俊儒　杨永平（160）

伪满隆化县禁烟政策的内幕…………………何浚洲（171）

东北第四路抗日义勇军的回忆

宋九令口述　　高坦整理

一、决心抗日救国

“九·一八”前，我在察哈尔作军牧处长。“九·一八”后转任天津盐务局局长。因故乡沦陷心中愤懑，又听到锦西县江家屯民众抗日，击毙日寇谷贺大佐等百余人，深受感动，因此自己决心投入抗日救国中去。老友刘葵忱当时任天津烟酒税局局长，他劝我说：“你既没人，又没武器，拿什么抗日？算了吧！”我很反感，骂他不是中国人！虽经争吵，但我抗日之心已决，毫不动摇。

二、三次面谒张学良

当时张学良在北京。我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去见他，前后三次。于九月才将出关抗日的计划定下来。第一次见他，他说：“你用什么抗？”我说：“我去发动地方武装，不要你给人，我当‘土匪’也要抗日”。他说：“对日早晚得抗，等我计划好了我们一同抗日”。第二次我去见他问：“咱们得等到什么时候抗日？难道等日本打到这里才抗吗？”他很不高兴，还是叫我等一等，准备好再打。第三次我又去见他，向他说：“咱们有三大恨，不能再等了！一是日寇占了我们的家————东北；二是东北土地肥沃，过去我们凭着这沃野千里为资本，使日寇稍有惧怕，因而必须夺

回来；二是大元帅灵柩还在沈阳，我恐怕日子多了被他们烧了”。于是张学良让我写了个计划。我回天津找人写了计划送去。计划的内容：出关只带二十八人，二十支小枪。先到热河，听说热河有许多吉林省旧军官散退在那里，可以通过他们联络地方武装，组成军队共抗日寇。计划送去不久，张学良即准备出国——去法国。他临行前给我二千五百元，作为出关费用，并和我同去见朱子桥将军商议。由朱将军在北京成立国民救国军总监部，以为后援。当时编我为抗日救国第四军，由我作司令官，并暂定每月由总监部发款二千五百元作经费。

三、去热河先见汤玉麟

一九三二年（当时是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我领着二十八人由天津海洋车站下车骑马奔冷口出关，走了二十多天，于十一月间到达承德。往都统署求见汤玉麟。都统署座落在旧清庭行宫。我们被让在客厅等候。见满屋灰尘，看来是多日未经打扫。听说老汤每天只是吸大烟，军纪很坏。从上到下毫无军备状态，当然更无救国为民之意。与老汤见面时，我说明来意。联络地方武装抗日救国，他说：“好！好！你打好了我援助你。”态度冷淡，语言含有讽刺。我已看出他无意协助，只得罢了！

四、联络地方武装

离开承德，于十二月到凌源。当地有汤军一个旅。旅长刘某很招待我们，当即在凌源过了春节。次年初（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到朝阳县羊山拜访大户贺某，很亲切并

留我住他家。他有个弟弟过去曾作过警官，由他为我召集约百余人，编一个营，都有枪，这些人平日在家，有的还作地方警察。又有药王庙民团王团长(原系吉林旧军官)由他招集一个团。也是平日在家务农，用时招之即来。我说："咱们是寓兵于农，因为手中缺经费只好如此！"四月左右到缸窑岭，取得当地王老六、王俊生兄弟二人协助，随行人员逐渐增加到五十多人，都有枪。于六月开往穿心店，继续扩充实力，招军秣马。穿心店附近唐家沟有警察王某为之招集一百多骑兵。松岭门赵金花父子五人，夙有威名，号召办联庄会，全会三百多人都来参加我部。沈家台原上匪李世君，有一百多骑兵，亦闻讯前来参加。又有东北旧将官孙簃印同其部下二人于十二月亦来参加我军。约一年左右，总计参军战士九百多人。当时有枪有药，可谓略有基础，可以随时出击敌人矣！

五、怒斥"西川"诱降

"九·一八"前，约在民国十四、五年间，我于沈阳曾参加办理"红万字会"。那时有个日本浪人"西川"，会说中国话，请求入会，是我主张允许他参加。他带有妻子生活无着，由会里供他一家生活费用。"红万字会"曾到日本设分会，我亦曾到过东京，即由他作翻译。在日本侵华时，他已作了参谋长（某军不详）。于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三四月时，他派一个中国人到江家屯给我送来一封信，内容是诱降，只要我能答应投降日本，要什么官职都可以答应，我愤怒回书拒绝。

六、攻打锦州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我们连开全军会议三天，讨论如何攻打锦州。议定兵分三路：第一路刘某，带二百多步兵攻锦州东大营。第二路赵金花带五百步兵打交通大学（在锦州城外北面）。第三路李世君带骑兵百余人与第一路合攻东大营。我自带数十人夺取城北乱山子，坐镇各方。二十八日晚出发，由沈家台奔锦州。我到乱山子驻冯姓院内，赵金花先到交通大学，将门卫二人、室内二十九人，共三十一名日寇全部歼灭，夺取枪支三十一条。在夜间两点钟开始撤退。东院日寇闻声而起，枪声大作。在激战中，我军只有王营长（民团营长）受重伤，抬至城北鸽子洞后壮烈牺牲！

李世君半夜到东大营，刘的步兵未到，而日寇先有察觉，我先开枪，我军牺牲七人，七条枪同时失落。李只好撤退到义县附近大凌河。刘的步兵到时，李世君已退，天已渐亮，只可不战而走。是时日寇飞机、坦克同时出动，到处搜索。而我军已合兵一处退到曹家屯。日寇疯狂猛扑，炮轰该屯西沟我军隐伏东沟未遭其害。只有一辆大车被其搜山时掳去，车上是办公用品，还有官防一颗（文为华北救国军）。我们继续后撤至唐家沟，天已黑，吃晚饭，当地人民给煮的小米粥。我本想继续反击，奈已人困马乏，只好暂停。三十日天明入穿心店，又将全军分散隐伏。

七、兵败逃亡

九月三十日，日寇出动大批骑兵、炮兵，扫荡沈家台。

把李世君的营房及郭姓的一个院子（开会的地方）和一个小铺（与外屯联络的地方）都烧了。又到宋家屯将我家住房烧了，极尽疯狂嚣突而后扬长而去。在这次战斗以前，五月二十六日，日寇就曾用四架飞机轰炸宋家屯（因其已知道我领人抗日），当时我家房子未炸着，我二弟三弟虽在家亦未受损伤，而这次我家终于未能幸免。

日寇走后，我将队伍解散，只带十数人到江家屯。时已十月初旬，草木仍未凋零。日寇还想追击，有间谍指点他们，江家屯多山，处处可以隐伏不好打，日寇才未追。我等在江家屯隐伏到一九三四年的中秋节后（只剩我和孙肇印等四人），知于此不能久居，只好离去。我们在一个夜晚冒雨到西海口的谷家屯。由朋友送到伪警察谷殿举家，又住了二十多天。蒙其相待甚好，伺机由西海口上小船前进，忽见岸边有日寇帐棚，急速回船，日寇已觉，用兵船追赶，中途遇礁未果。我等亦暂回谷家屯。又雇大商船一艘，内装七千斤小米，避过日寇耳目，回到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进锦州的情况

刘梦九

一九三二年一月初旬，日寇由大凌河向城内会议会来电话，问锦州是否举仪式欢迎日军，当时有赵桂令、许赓云、解麟轩、李翼忱等同到县署告知县长谷金声。谷金声不同意接，他说，不能接，爱怎样就怎样！另方面士绅们也在商议不决。许赓云说，不必取他的同意，咱们回电欢迎吧！大家同意了，于是回话表示欢迎。这是事后许、解二人告诉我的（许赓云是前清贡生，为私立达成小学校长。解麟轩是前清举人，为当地富户）。

当时奉天警察处处长黄显声、督察长熊飞，都在锦州，招募些义勇军（数目不详）。熊飞在城内南街住，在绅士们已决定迎接日军的次日，召集开会，征求士绅意见。有县长谷金声、士绅朱显廷等及我都在场（朱是前清进士）。熊飞说：黄司令（因招军抗日所以称司令）现在城西女儿河，方才来电话，要打。当时士绅们要求不必打了，因大局已不可挽，两军实力悬殊（日军已大军压境，而义勇军新募，人数不多，训练不久，服装枪械也不齐，其中份子也不清，思想不一致）打也无益，徒使地方人民遭害。熊飞说：锦州是辽西重地，我军不能不放一枪一炮自行退却。谷金声说：大军四万左右，在锦驻扎三个多月，地方供应浩繁，人民已经担负很重。临行时再向日军放些空炮，势必使日寇来时屠

杀百姓，这样做对不起人民。议还未决，隔室忽来电话，熊起身去接，回来时面色骤变，不主持会议了。谷金声说大家不必开会了，熊督察长自有办法。会议遂不决而散，心中莫明其妙。事后由谷金声说出，当时的电话，他在旁窃听，电话来处不知道，只知道是告诉熊飞说：有日寇汽车队由锦州城北余积屯一带南下，势将包围锦州城，如此熊飞得信大惊，变更原来主意。会议散时，就看见熊飞用电话通知义勇军各部分，约午后六时在城北交通大学集合，准备向日寇迎击。后来据附近居民所见，他们不过是将许多财务和军用品与锦州警察局所有的枪枝弹药等物，装载数辆大汽车向城西女儿河运去，找到黄显声，一同逃走了。等义勇军在午后六时左右到交通大学集合时，因无人指挥，纷纷散去。看熊飞原意，拟打算在日寇距离较远时，虚放几枪，然后退去，以取抗战之名，等日寇到达时，他们已走远了。但又闻日寇汽车队前来，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故而急速逃走了。是夜有所遗之残部，成群结伙（人数不清）先叫西城门，后到南门、东门呼令开城，意欲入城抢劫。因城门不开，大声叫骂并向城内放枪。到天明始散去。

次日清晨，日寇大批到锦州城外，由士绅们迎进，我也在其中。日寇骑兵、步兵等都由东门入城。进城后有日寇将领找县长，士绅说，县长在县署。日寇将领叫人到县署与谷县长见面。谈些什么不得而知。午后，日寇中将师团长室兼次在东站临时司令部，召集县长、士绅、四局、三会人员开会，到场的有财政局长刘梦九、教育局长李子荣、民政局长郭兆麟、实业局长苏纪轩、商会长魏振卿、农会长赵桂令、教育会长刘炳麟、士绅解铭阁、徐子聘、陆辑五等。

室兼次讲话（有人作翻译），大意是日本军来意是除暴安民，肃清兵匪。讲完谷县长始到，室兼次又与他单独谈话。出来时，大家问他，他说：日本军让他维持地方，他再三推辞，结果未决，言讫大哭。当即与大家一同回城，入南街田氏医院养病。

第二天午后四点钟左右，日寇来人先到县署找县长和四局三会各主脑人，结果只有我和商会长魏振卿、县长谷金声三个人。我们坐马车被拉到西关河西褡裢胡同一个民宅院内东正房。面见日本一个队长，一个朝鲜人作翻译。问谷金声三件事：第一，日军来了你们欢迎不欢迎？谷答：不欢迎；第二，张学良好不好？谷答：好；第三，东军在东北很扰民，是不是？谷答：没有。日寇队长很不悦。又说：日军来了是为了救东北的百姓，你们因何不欢迎？谷说：我是地方官，只愿地方安静，没有军队才好。不但日军，就是中国军到锦州，我也不欢迎。日寇说：张学良为人很坏，东北人民怨声载道，你因何说他好？谷说：他是我的长官，我认为他是好。你们日本人也是一样，能说长官不好吗？日寇说：听说张学良的军队很骚扰地方，倾害百姓，我们都调查属实了，你因何说没有？谷说：我是文官专管地方事，他们军队的事没有告诉我，有无扰民我不知道，所以说“没有”。日寇又问：地方上有多少枪。谷说：不知道，因为近年来地方荒乱，家境稍好的，都要允许买一支枪。当即指魏振卿说：例如他家，因有几天地，够养一支枪的资格，所以就得让他家购买一支枪。全县各户是陆续买的，并无确数。现在正要计算数目发印花税票，还未调查，你们就来了，所以不知数目。时天已大黑，谷说：天已黑了，没事可送我们回城。日

寇派一日本兵，将我们用马车送回。

次日又在南街王在邦的大楼上，召开全县绅士机关大会。室兼次与许多日寇军官到场。正式宣布来意，教大家安心。最后让谷金声继续当县长。谷力辞说：绝对不做了，一定向商农两会作交待。室兼次先是劝他继续做，后来才允许他辞职。散会后，县公署院内突然有许多日本人作监视者，监视着谷的行动。

又次日，日寇的特务机关长，召开全县地方代表大会。到会约十数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上有于静夫等三四人出席。据说是由伪省长臧士毅那里派来的。特务机关长宣布，谷县长已准其辞职，这次请大家来是为研究地方治安，可以研究地方维持会。选举委员会内分八大处（如财政、警务等）。由委员担任处长，旧日的官照旧供职，如我原管财政这回任财务处长，只有警察局长（姓名不详）在事变时随熊飞走了，这次以农会会长赵桂令接任，其余都是原人不动。日寇特务机关长说：谷县长辞职，你们应另选一委员长，总理全县事务。当时大家群起要求，仍要谷金声作委员长，日寇不允，相持不决。丁静夫说：你们自由选举不必问了。然后大家投票选举，仍是谷金声。但这次谷金声未到场。又次日，室兼次等日寇在公议会召开大会。宣布地方维持会正式成立。选举委员长时，由士绅朱显廷将谷金声劝来，大家仍选他做委员长。谷说：我是张家任命做地方官的，日军来了，我就要交出职权。日军如允许我，我还可在锦州居住，如不允许那就怎样处理都可。熊飞临走时约我同去，我没跟他去，是为了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百姓。熊飞说我，想作日本官，其实冤枉我，所以我决不能就任。日寇说：他们的话

不必听，你现在仍是维持地方才对。应该做委员长，不违背你为百姓的本心。最后大家仍都劝他就任维护地方，他才默而不言了。散会后他回县署办事了。监视他的人也没有了，只派一个青年日本人名叫"青山"作指导员。出布告安民，日寇想用维持会委员长的名义，谷说：地方人不懂委员长是怎么回事，于是仍用县长谷金声的名义出布告，维持会遂无形取消了，仍用以前的行政机关办公。谷金声回任锦县县长，日寇"青山"就成为锦县参事官了。

锦州市国民党内幕

马士奎

前　　言

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经中学时代的同学王德光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的组织。先后在市党部担任过宣传科助理征编组长、市党执行委员兼组训组长、伪市参议会参议员等反动职务。仅就我所知道的锦州市国民党内幕情况，概述如下。限于时间和本人写作水平，难免挂一漏万，尚希熟知锦州市国民党内幕的各界人士，予以指正。

一、“八·一五”前，锦州市国民党地下组织概况

锦州市开始有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大约在伪满康德元年。当时锦州初设省会，汉奸徐绍卿，出任第一任锦州省长。他由沈阳带来了很多官员，其中有一个石镇藩，又名石墨堂，化名石坚（他原来是沈阳师范学院的教员，“九·一八”前，经梅孚光介绍参加国民党），由沈阳来锦州，在教育厅任中等教育股股长。他在锦州，从伪康德元年至康德六年，先后发展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参加了国民党地下组织。据我后来听吴卢生和张庆凯说，他们发展的党员，有杨伯龙、张化堂、周振寰、冯国卿、冯泰来、王之勋、张兆明、刘西馥、宋光宇、杨文奇等很多人。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

十日，这个地下组织，曾受敌伪警、宪机关破获，杨伯龙、周振宸、张化堂三人被捕，后来被处死刑，在锦州监狱内绞死。冯国卿被捕后投敌，给日本宪兵队当翻译，一直干到"八·一五"光复。张兆明跑到齐齐哈尔去了。宋光宇跑到吉林一个农村去种地。杨文奇跑到朝阳去了。石坚本人跑到天津去了。从此这个组织中断了地下活动。国民党内部称这个事情为"一二三〇事件"，当时我和这个组织尚无任何关系，所以其详情内幕情况，我不知道。上述情况都是在"八·一五"后，听张庆凯、吴尹生、冯泰来等人述说的。

"一二三〇"事件以后，国民党在东北一度中断了活动。当时的重庆中央国民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又派他的嫡系党员罗大愚又名罗庆春为党务专员，来东北进行活动。罗到东北后，先后在长春、沈阳、锦州一带发展了新组织。罗大愚是辽阳人，曾留学日本。一九四一年罗在长春派张庆凯来锦州，任锦县党部书记。张庆凯也是辽阳人，日本东京警官学校毕业，曾在伪新京（长春）中央警官学校任教官。来锦州后，他的公开职业，是伪锦州市警察局保安科长（警正）。张庆凯（化名赵时鉴）来锦州后，在地下工作时期并未开展什么活动。从他到锦州，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被捕，只吸收了一名党员，就是当时女子师范的教员张子良（化名仇非）。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罗大愚被他身边一个国民党员（姓名不详）出卖被捕。这个叛徒并把全东北的党员花名册都献给了敌寇宪兵队。就这样罗及全党先后在各地被捕，组织几乎全部被破获。张庆凯于同年六月上旬在锦州被捕。党内称这次事件为"五二三事件"，意思是五月二十三日组织被破获的。以后为了纪念这个日子，锦

州市国民党曾经成立了一个“五二三印刷厂”，专门出版国民党的一些刊物，如蒋介石著的《中国之命运》以及《三民主义》等等。

“五二三事件”在锦州被捕的除张庆凯之外，还有伪锦州宪兵团的分团上尉王团副（名字我不知道），大仁病院的院长赵连壁，锦州师范学校教员石英特，伪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官陈国兴，锦州第一国高教务主任刘宽谟等人。这些除张庆凯外，其余都不是国民党员。原因何在？听吴升生告诉我说，在张庆凯从事地下活动时，伪锦州宪兵分团的上尉团副吴尚志（又名吴效起）和张常来往。后来吴尚志转勤到北满去了，由王某接任他的职务。张庆凯入狱后，伪检查机关听说他和宪兵团的团副有联系，就把这个团副抓了进去。在伪检查机关根据长春党员花名册的线索，发现在这个组织中有个医生（其实当时确有一个地下党员李俊升（化名闻道）是经长春党员赵岳山介绍入党，是在锦州开设天德眼科医院的），由于张庆凯常到城内大仁医院去打麻将牌，所以把赵连壁也抓进去了。当时党内确有一个化名叫“石英”的，他本名叫单永谦，北镇人。当时在义县敌检查机关，翻遍各机关的名册，发现锦州师范学校有个教员叫“石英特”，就把他也抓进去了，严刑拷打，而石却啥也不知道。伪一高的刘宽谟，是因为在张庆凯的家中，搜查出他的一张名片来，因此被捕。不久，刘被当时的一高日本校长柴谷与助保释出来。张庆凯和其余的人，则在“八·一五”日本投降的次日，才由监狱被释放出来。张庆凯出狱后，把赵连壁、陈国兴等人吸收参加了国民党。在国民党锦县党部公开后，赵连壁、陈国兴都担任了社会科助理职务。从上述事实看，敌伪的统治机关

并不考虑调查研究，处理案件只是望风扑影随意抓人。用各种酷刑逼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良民。当时在敌伪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人身自由根本没有保障。不知什么时候，或因为什么事就被抓进去吃官司！类似上述的冤枉案件冤抓冤死者不可计算。又如现在的锦州民盟副主任委员高伯东先生，也因为日本宪兵队要想抓一个中学教员高伯苍，就把高伯东当高伯苍抓去，拘留了一天。其实高伯苍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秘密地跑到国民党后方西安战干团受训去了。以上是我所知道"八·一五"前锦州国民党的大致情况。

二、"八·一五"光复后，锦州国民党的活动情况

1、接收伪康德新闻社出版《辽西晚报》。

"八·一五"光复当时，日本投降，伪政权瓦解，苏联红军和解放军还未到锦州。锦州一时出现无政府状态。张庆凯由狱中出来便成立国民党部。公开在东门外伪协和会大楼的西北角开始办公。这个组织对外称国民党部；对内称"光复里"，参加的国民党员化名都叫"光"字。如参加党部办公的有：张庆凯（德光）、吴尹生（极光）、单永谦（汉光）、冯国卿（铁光）、冯泰来（鑫光）、胡耀民（仲光）、胡石麟（晓光）、王德亮（复光）等等。"光复里"成立后，对外由吴尹生（化名陶极光）出面联系一切事务，吴尹生是吉林人，"八·一五"前，曾在伪新京邮政职员训练所任教官，秘密参加罗系的国民党组织后，任辽西一带的交通。担任联络各地的党部书记长。"五二三"事件后，他坐火车由承德去北京转道来锦，隐蔽在県康门外天德眼科医院，改名"老

三”，以炊事员掩护身份。“八·一五”后出来和张庆凯一道主持地方党务。他化名陶极光的由来，据他自己说：“八·一五”后胡耀民（仲光）介绍他去拜访城内问陶医院院长穆文彬（字问陶），当时胡耀民和吴尹生都吸“极光牌”香烟，于是他灵机一动，自己起名叫陶极光。陶极光曾经在这一阶段，接受胡耀民的建议，接收了伪锦州“康德新闻社”出版辽西晚报，并任命胡耀民为报社社长。胡耀民沈阳人，伪满时是锦县协和会事务长。本来不是国民党员，而是一个亲日汉奸。只因他本人在敌伪时期和张庆凯私人有些来往，而张庆凯在敌伪时期又未吸收几个党员，所以在“八·一五”后就立即吸收汉奸胡耀民和剑作春（伪锦县政府警务科长）二人入党。胡耀民自从摇身一变当了社长后，对外则到处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国民党员，有事和我商量就行”。辽西晚报利用原来伪康德新闻社的全部人马刀枪，委麻德魁（原康德新闻社编辑）为总编辑，张小痴、杨上吉、刘彦（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解放军入城后，任解放军机关报民声报社总编辑）等人为编辑。

2、蒋敌伪合流后，牛鬼蛇神出头露面。

陶极光的第二件事，是搜罗汉奸组织旧时地方维持委员会。根据国民党部张庆凯、吴尹生、胡耀民、冯国卿几个人的研究，认为在当前若要安定地方秩序，必须把有名望的人请出来。在他们认为伪省长王瑞华，伪军少将宋树声，伪商会长王益三都是有名望的人。于是由张庆凯、胡耀民出面分头走访，把他们一个个请出来，成立了地方维持委员会，挂上牌子，在伪协和会大楼办公。参加维持会的人据我所知有伪省长王瑞华，伪军少将宋树声，伪警察局长艾定一，伪

锦县警务科长刘作春、伪商会长王益三，地方劣绅白毅忱、张秀峰等人。维持会的工作是维持地方秩序，保护日侨俘，接待苏联红军等等。维持会门前每天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在宣传工作方面，县党部曾派单永谦、周寿臣两人到市内各中学校去讲谈三民主义。记得有一天日本侨民丢了衣物，王瑞华还亲自领人去道歉赔礼。报纸上则大谈要保持大国民的风度，对日本人应当以德报怨，我用关心来感动他们悔罪等谬论。当时蒋敌伪合流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了。

3、一九四五年锦州初次解放后国民党的地下活动。

"九三"胜利后，苏联红军开入锦州。不久解放军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了锦州，国民党又转入了地下。张庆凯搬到城内北街人字胡同张棨家里去办公。张棨锦州人，地主成分。伪沈阳农业大学兽医科毕业。以后曾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一年。回东北后，在长春任畜产兽医大学教授。在长春参加了罗大愚系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五二三"事件发生后，曾和罗大愚同时入狱、坐牢，是罗大愚的亲信之一。地下活动时期(即四五年九月)被罗派回锦州，和张庆凯、吴尹生三人共同领导锦州的地下活动。吴尹生住在北关静安街平安医院院长刘向如家里。当时锦、长、沈、平大量吸收新党员，扩大组织。有些青年知识分子，看到张庆凯等人，伪满时入狱坐牢，认为他们是抗日革命的，所以在地下活动时期，纷纷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后来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勾心斗角的政治骗局，才又相继离去。详情后面再述）。仅仅八十三天，发展了党员约四百多名，成立了五个区党部，三十八个区分部。当时的地下活动，有四项任务：

①组织工作：物色对象、吸收新党员、扩大组织。

②宣传工作：印发刊物，宣传三民主义。

③调查工作：调查敌伪物资情况，为国民党接收作准备工作。

④经济建设工作：当时因为国民党经费困难，号召党员养党，向党捐献物资及党费。

当时在多闻里(天德眼科医院楼上)，由闻超（本名于超）、闻贤（本名姜宝升）二人曾负责任出版地下油印刊物《凯声》。这些油印刊物都通过县方联络员张文伯，向各区分部散发。当时每个国民党员，每天都能领到一些《内部》刊物，如油印的《三民主义》、《孙文学说》、《民权初步《等等。对外曾散发过两次传单，散发过一次蒋介石纪念“九·一八”讲演原稿。

4、公开前夕的一些准备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有一天下午，县方联络员韩冰来找我，带我到北关静安街平安医院去，当时我是第二区党部的执行委员，我们到了平安医院在楼上一间屋子里，会见了吴尹生。这天吴尹生在屋里摆上八仙桌子，铺上了麻将牌，我们几个以打牌为名，坐以研究工作。参加这次集会的有：李生（化名桂光）、邢春普（化名荆凌）、张文伯（化名高毅）、白家声（化名冰）、马士奎（化名启智）、吴尹生（化名述仁）、吴荫实（化名今明）。这七个人都是区党部以上负责人，吴尹生主持开会，他坐在中央，拿起一张麻将牌说：“最近我们军队已经打出山海关，不久就要到锦州了，我们从现在起要准备光复工作。为了防备万一，我已经把一部分领导人员，分散到乡下去了。一旦我们被捕，还可以保存一部分力量。现在我们来研究研究当前应该准备些什

么工作”（讲话内容大意如此）。后来我知道被遣送到乡下去的有县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孙振声（化名慧明），第二区党部书记王德亮（化名后光）等等。当天会上决定的事情大致是：

①高毅负责联系各个区党部。

②平安医院是县方联络站，高毅每天来此处，和吴尹生接头。

③复昌负责筹备发行两个对内宣传刊物，一个“唤起”，一个《东北风》。

5、征求党员公开后的打算。

①关于职业问题，打算做何职业？

②愿意公开身份呢？或愿意地下活动呢？

这次会后的几天，韩冰在一次接头时，送来一张县方书记长张庆凯写给我的一张纸条，条上是这样写的：

“复昌同志：党部不久即将公开，公开后兄须以宣传科代理主任身份，负责领导宣传工作。希赶快做好宣传工作计划，报县审核。‘时鉴’”。

又过两天，韩冰领我到城内北街去会见张庆凯。在这里有赵莲壁（崇光）和张军（复醒）。张庆凯叫我负责准备在国民党军队入城时，要动员各区分部张贴欢迎标语。这一天下午，张庆凯和吴尹生两人研究组织地下军队。万一国民党军队入城时，解放军抵抗，准备叫地下军在城内策应。我听他们讲：复勇那里有十几个人，克明那里有十几个人，另外再想办法。吴尹生说：“必须要有军事经验的人做领导”。张庆凯说：“今天晚间我去见宋树声。”当天晚间张庆凯去访问伪军少将宋树声，约在夜间十点钟才回来。他神色十分

高兴，一进屋就向吴尹生说："老头（指宋树声）精神很饱满，他说一切由他负责，必要时他到咱们这儿来"。第二天上午，张庆凯把复勇（李铁萍又名李藩）找来。命令他骑自行车去高桥迎接国民党军队，并向他们报告锦州市解放军防务情况。在高桥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会见了李藩，并亲手写了一个手谕，内容是：着李藩同志为锦州地下军司令，署名十三军军长石觉（大意如此，意图是派他在国民党军队入城时，万一解放军抵抗，他好领导地下武装为内应，这个地下军也叫突击队，共有三十左右人。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伪军官学校学生，和一些伪警察）。在国民党军队入城时候，解放军主力早已向义县方面撤退，所以这支地下军，并未起什么作用。后来党部公开了，为了酬谢宋树声和党部合作，由张庆凯保荐宋出任锦县县长。

李藩由高桥回来的当天，也就是国民党军队入城前的那天晚上，在北街内人字胡同张紫家里，由张庆凯主持召集了一次核心会议，研究公开后的人事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庆凯（时鉴）、吴尹生、（陶极光）、张文伯（高毅）、白家声（韩冰）、朱蕴实（今明）、韩永康（行一）、李茂生（程光）、邢春普（荆凌）、马士奎（后吕）等。会议首先由张庆凯发言，他说：今天上午，复勇同志在高桥会见了十三军军长石觉，我们（指国民党）的军队，估计明天就能到锦州。在国军入城后，我们党部必须立即公开。因此我们今天要研究党部公开的一切工作。如在什么地方办公、分几个科、谁担任什么工作等等。张庆凯发言后，他由衣袋中，掏出来一张名单，发表组织机构及助理以上的人选，看来这已经早就由张庆凯和吴尹生研究过了。助理

以下人员由大家提名。最后的决议是：办公地址是在中央马路民生报社（即现在百货公司批发站楼址），人事机构如下：

书记长：张庆凯（赵时鉴）

- 秘书
  - 张子良（仇非）
  - 于　超（翊赵）
  - 邢春普（荆凌）
- 总务科主任张文伯（高毅）
  - 助理 朱蕴实（今明）
  - 助理 王德亮（庶光）
- 组织科主任张渠（魏士贤）
  - 助理 白家声（韩冰）
  - 助理 李茂生（程光）
- 宣传科主任吴丹生（述仁）
  - 助理 马士奎（复昌）
  - 助理 孙振声（愚明）
- 社会科主任韩永康（行一）
  - 助理 陈国兴
  - 助理 赵连壁
- 调查科主任胡石麟（晓光）
  - 助理 高而全（女）（哲林）

总务科

交通组长：	张威州（嘉明）
庶务组长：	么俊州（夷明）孙贻昌（达明） 宋林芳（英杰）
文书组长：	陈　祺（赤诚）
会组组长：	程鸿志（继鸿）
打 字 员：	阮孝玉（丽明）（女）

组织科

编制组长：	白家声（韩冰）许秀珍（共　明）
报到组长：	白　慕（韩铁垒）
训练组长：	李茂生（程光）刘敏芝（宵　明）

科	组	人员
宣传科	征编组长：	马士奎（复昌）齐瑞麟（化 明） 张文淑（振怀）王瑞明（王 明）
	工作组长：	孙振声（慧明）张芷郁（哀 明） 张林玉 赵麟声（克明） 王怀仁（明×）郭乃丹（晓 明） 白绍馥（旭日）
	出版组长：	阎洪志（仲志）李士贤（维 城） 姜宝升（闻贤）
社会科	民运组长：	苏锦华（锦疆） 王恩（王 达）
	交通组长：	陈尚达（世一） 姜××
		安文煊（以平） 刘 强
		李维一（一宇）
调查科	情报组长：	李玉树（仲图）孟庆杰（宁 伯） 朱朴春（璧光）郝 彤（聪 明）
	守卫班长：	许蔚林（林蔚）史 兴（润 彦） 刘 [illegible]（瑞光）崇 仁（封 仁）

三、公开后的锦州市国民党部

1、组织工作：弄虚作假，伪造党籍，突击学习，训练党员。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队由西关入城，这天的上午，解放军已经主动往义县方面撤退，下午国民党十三军和五十四军先后进入锦州。二十三日国民党锦县党部在中央马路现在百货公司楼址公开办公。科室工作人员四十多名，都把行李搬来，在党部集中食宿，白天办公，晚上六点到十点学习讨论。

当时组织科的主要活动是：（1）成立党训班。每天晚上进行四小时的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讲授“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孙文学说等等。讲师由科室领导人员担任。第一期学员是全体科室办公人员，第二期和第三期抽调各街区党

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外聘的临时讲师如有伪辽宁省教育厅长卞宗孟、睢军长官部顾问白实高、睢军长官部第二处谍报科少将科长简洁等人。（2）编制区分部：过去国民党在地下联系的方法是点线联系，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

譬如：复光→复昌→国昌→新日→华东→东桥

复昌只认识复光，国昌只认识复昌，其他党员都接触不到，因此也不认识。公开以后，党员互相见面，打开关系，按地区情况成立区党部，把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党员，都编在一个区分部内过组织生活。基层区分部，按国民党党章规定，设区分书记一人，委员二人，党员三人至十人左右，当时全县党员（包括锦州市、锦县）约有四百多名。

在“八·一五”前，张庆凯在锦州吸收的地下党员只有一个张子良，这样“成绩”是无法向上级汇报。为了虚报成绩，为了和别的派系争夺势力，必须多报地下党员，来向其他派系显示罗系党员在地下时代的成绩，于是在罗大愚的指示下，把四十左右名党员的入党日期提到“八·一五”之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上旬，罗大愚第一次来到锦州，当时国民党锦州市党部竟吹捧他为东北青年导师。罗大愚和他的妻子刘郁中住在南关同盛泉澡堂附近高宅（是刘郁中的亲戚家）。这时罗已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罗到锦州后，即向张庆凯说：右坚不久就要来东北，假如到那时咱们拿不出地下党员来，基层势力将完全被人夺去，须事先下手准备。罗如此面授机宜后，张庆凯立即命令组织科助理白家声，将骨干分子四十名把党籍提前到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五月。这次被虚报党令的党员据我记忆有：张文伯、

李茂生、白家声、朱蕴实、王德亮、马士奎、胡石麟、韩康、孙振生等全体科室干部，以及各区党部负责人如李师贤、王鹤亭、徐一戌、李治民、郭裕等共四十人。当时张庆凯还兼任辽宁省党部第八督导区督导员。第八督导区东起新民县，西到绥中。这辽西一带包括盘山、黑山、锦西、兴城，义县统由督导员领导工作。执行委员们党籍也被提到“八·一五”前去。在当时这一带还都是罗大愚派系的势力。

2、宣传工作：空喊口号，大摆摊子。宣传科在公开后，摆了大摊子，接收了很多文化机关：

①接收了解放军的民声报社，成立新生命报社（新生命报社是张庆凯提请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命名的）。委马士奎为社长，李泽琛为总编辑。

②成立新生活话剧团。委张履祥为团长，李申雷为导演。

③接收伪锦县印刷厂。改名“五二三”印刷厂。委阎洪志为厂长。

④接收广播电台。委高连仁为台长。

当时锦县党部组织科，曾派党员高而悌、朱蕴诚、郭金钫、宝光宇四人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锦州分团。三青团的团员都在“八·一五”光复后吸收的，没有一个是“八·一五”前的地下团员。三青团曾接收了两座电影院。派张履祥负责经营。其中一个较大的被重庆飞来的复兴社东北头子匪军少将刘广瑛强行占去。并罢免了党部派去的四个青年团负责人，另派由重庆来的西安战干团出身的曹键为三青团主任。改强行占去的电影院为青年馆。从此三青团和团部分家，并形成互相对立的局面。刘广瑛又亲手接收了一个日本舞厅，改名为

青年餐厅。楼上是西餐馆，楼下是跳舞厅。找一些日本妓女当舞女。日本人伴奏音乐。整天有一批国民党校尉级军官以及统一接收委员会和东北行辕的一些接收大员们，来这里跳舞。伴奏的乐曲都是一些黄色的流行歌曲。如“何日君再来”、“桃花江”等等。宣传科在报纸上和街头张贴的标语上，经常空喊一些无聊的口号。如在报纸上用大号铅字写“一定要做中国人，是我们的权利；努力去做中国人，是我们的义务”。又写“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不可当”。这样话要在“八·一五”前提出来，是很坚强的，可惜在日本人投降后，就变成无病呻吟了。

3、调查工作，巴结军方，提供情报。

调查科的主要活动是将公开前党员所搜集的情报，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向匪军长官部第二处谍报科提供材料。当时调查科长胡石麟和谍报科少将科长简洁往来频繁，几乎天天见面。简洁对胡石麟十分器重。我记得当时有个杜云珍，调查科提供材料说她是共产党嫌疑。简洁曾几次了解，调查科又送去了两张杜的像片。后来情况不详。党部曾推荐国民党员杜书棠（化名蔚书），许蔚林（化名林蔚）到谍报科去当少尉军官。一九四六年匪军长官部迁往沈阳。简洁留在锦州当锦县县长。简洁请党部调查科长胡石麟当他的秘书。另外主任秘书是郭健生，建设科长贺竹，财务科长张文伯，会计股长杜书棠，都是党部推荐去的。简洁曾聘请国民党员李铁萍（化名复勇）到他的县政府当侦缉队长，李铁萍未去。后来张巢推荐国民党员刘铭九（化名复仁）去当锦县警察局行政科长。可见党部和简洁的密切关系了。

四、争权夺势，勾心斗角，派性倾轧，相互排挤

按罗系国民党原来的计划，本来想叫张渠当锦州市长。可是匪军一到锦州，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马上派他的少将高参韩德身任锦州市长。当时党部感到失望！这时张庆凯每天奔走长官部，有事就去请示杜聿明。当时党部一切经费都由杜聿明供给。杜聿明刚到锦州，就拨给张庆凯二千万关金，充作党部经费。另外党部集体食宿的经费是由汉奸王益三（伪商会会长）全部供给。尽管王益三再三投靠张庆凯，可是最后还是被长官部当做汉奸押起来。吴尹生和张渠认为张庆凯竟走上层路线，是个官迷，几次利用晚上学习时间，背着张庆凯开小会攻击张庆凯。后来张庆凯和张渠、吴尹生三人关系日益恶化。张渠和吴尹生索性全不上班。张渠去沈阳在沈阳市党部帮助张宝慈搞组织工作。吴尹生躲在城内南街朱蕴实的家里印发小型传单，攻击韩德身说："我们反对变戏法的人当政府科长（指段一樵）"又说："韩德身任用私人，把市政府变成了家天下，市政府实质是韩家大院。"韩家大院名称的由来，实际上是吴尹生给他起的。在四五年来，一些"九·一八"前入党的老党员到党部去报到，党部对他们十分慢待。不给安排工作。于是以石子范为首的非罗系老党员在伪省主席徐箴（政学系分子、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市长韩德身的支持下，竟在城内大塔胡同，又成立了一个锦州市党部。公开挂牌子办公。这样一来锦州就出现了两个国民党部了。谁真谁假把老百姓弄糊涂了。罗系党部赶紧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查锦州在"九·一八"前并未设市。锦州有市政是伪满州国政权政治产物，国民政府中央并未承认。本党部在

“八·一五”前地下工作时代一直受中央党部特派长春党务专员领导。锦县党部直接管理现在的锦州市县党务工作。希有关单位、机关、团体谅察。凡有关党务事宜希来我会接洽为荷（大意如此，原文忘却）。这时非罗系的锦州市党部，也和当时的省市政府取得联系。他们的执委会成员组成如下：

书记长：孟范民（孟晋）

执行委员：石九畴（即石子范）、赵镜湖、刘惠民、翟一民、陆稼轩。

后来还是吴尹生出来，亲身到城内大塔胡同和孟晋、刘惠民等谈判。孟晋表示只要罗系党部收容这伙人，愿意合并。于是双方共同邀请铁路特别党部东北局主任委员单成仪和长官部顾问焦实斋从中周旋，两个党部才并在一起，称锦州市县联合执行委员会（简称联合党部）。新的阵容如下：

书记长：张庆凯（罗）

秘书室主任：翟一民

监察室主任：赵镜湖

组织科长：张渠（罗）

宣传科长：陆稼轩

社会科长：孟范民

调查科长：胡石麟（罗）

总务科长：李茂生（罗）

执行委员：吴尹生、张渠、胡石麟、李茂生、陆稼轩

监察委员：刘惠民、孟范民、翟一民、张庆凯、石子范、赵镜湖

市县党部成立后，张渠和吴尹生始终未上班。一九四六年二月，随军长官部迁往沈阳，吴尹生趁机离开锦州。到沈

阳中苏联谊社去当少校工务科长（中苏联谊社是匪军长官部政治部所属的一个旅社，地址在沈阳太原街，内有舞厅、餐厅）。吴尹生临走时并介绍“新生命报”总编辑李泽琛到沈阳“中苏日报”社去担任中校编辑。这时张棨也在沈阳市党部工作了。张庆凯弄得众叛亲离，加之东北接收委员会，又强占了党部的办公大楼，把市党部逼到车站前吉庆街一个小楼去办公。经过几个月的耳闻目睹，一般青年知识分子，都看破了党部内部的矛盾重重，上层党员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排挤，于是相继纷纷离去，不过组织生活了。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凄凉情况下，张庆凯才自动请求辞职，到沈阳东北大学去读书（后来当了东北大学区党部书记）。

一九四六年春天，罗大愚在沈阳和东北党务的另外两个头子石坚、李光忱三人谈判，互相分地盘。罗大愚任辽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任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任安东省党部主任委员。锦州市由罗大愚派人担任书记长，锦县由石坚派人担任书记长。张棨回锦州后党部已经缩小编制，由原来五个科缩编为三个组。科室办公人员由四十多人减为十几个人。这时的编制机构大致如下：

书记长：张棨，秘书胡石麟。总务组李茂生、李云阁、史兴。组训组：白家声、徐一成。宣传组马士奎、王恩。

一九四六年秋天，吴尹生和李泽琛二人回锦州，成立辽西民报社。辽西民报发行人是罗大愚，社长吴尹生，总编辑李泽琛。这个报社利用“民生”印刷厂为印刷车间，在四六年双十节创刊，成为市党部的机关刊物。以后在市参议会竞选和伪国大竞选及立法委员选举中，这个报纸都起到了对罗系国民党宣传吹捧等作用。

五、一场丑戏……伪参议会和国大竞选

一九四六年冬天，锦州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通过选举的形式产生。国民党员在市内各选区通过党员的活动大部分当选。除国民党员外，在各区当选的都是一些土豪劣绅，兹将这届参议员的名单列下：

议长张槃（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城内选区。副议长石子范（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城内选区。参议员李茂生（城内）、王恩（北关）、张志诚（妇女会）、马士奎（教育会）、路迎洲（东关）、刘振元（工会）。以上八名为国民党员。张铁屏（商会）、陈质华（商会）、白毅忱（西关）、刘庆五（北关）、朱文前（城内）、解绩超（城内）、宋树声（正阳区）、穆文彬（医师会）、聂化宣（大岭）、綦起富（向阳区）、大会秘书徐文波（国民党员）。

第一届临时会第一次大会，在城内北街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召开。在礼堂的正面悬挂一幅对联，上联是：策励人民，恪遵法令。下联是：监督政府，杜绝贪污。当时的参议会主要矛头是攻击韩家大院。会议开始，听取政府各科首长的工作报告。首先是市长韩德身的报告，其次是主任秘书陈殿权的报告。以后是各科长的报告。参议员质询以李茂生和马士奎发言最多。主要是揭发市政府任用私人和贪污事实。材料的来源都是市政府内的国民党员提供的。其中以建设局焦汉章股长（国民党十五区分部书记）提供材料最多。有关教育局的一切舞弊和任用私人材料都是由小学教员龙春霖供给的。开会期间市内的两家报纸"新生命报"和"辽西民报"以及广播电台每天派记者去采访。两家报纸每天用正版篇幅

登载会议实况。当时伪市政府主任秘书陈殿权是义县人，是韩德身的同学。他曾在半年的短期间内提拔他的同乡陈凤山由小学教员一跃而为教育科长。这件事在小学教员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马士奎为了向小学教员们讨好，博得他们的拥护，于是在质询中毫不留情的向陈殿权质询。问陈殿权为什么在半年内由小学教员升任校长、视学、科长。他究竟有什么出人头地的地方。这时市内的小学教员多数出席旁听。主任秘书陈殿权弄得无言答对，十分狼狈。

参议会开会后，国民党员李维一（当时在日侨俘管理所工作），曾向市党部书记长张渠汇报陈殿权在遣送日侨回国时，曾把一部分遣侨经费贪污自肥。当时由张渠、吴尹生、石子范三人进行调查研究，并向检察院提起控诉。结果把市政府主任秘书陈殿权扣押起来。后来由市长韩德身私自和法院院长林中贞疏通，才把陈殿权偷着释放出来。陈出狱后，即悄悄地离开锦州回义县去了。参议会开会，在实质上是反映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反映罗系国民党员和重庆飞来的老国民党的斗争。

参议会闭会后，要通过市参议员的投票，选举省参议员。这时想竞选省参议员的有张庆凯、高筠、吴尹生、赵尺子等人。张庆凯为了竞选省参议员，曾由沈阳回锦州，住在平安医院刘向如的家里。高筠是三青团锦州分团主任。他和张渠是世交。通过张渠介绍，高筠曾在城内成德馨饭店请全体参议员吃饭，表示竞选省参议员希望大家投他一票。赵尺子也通过老派国民党员田树森、石子范等的介绍，请参议员们在成德馨吃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确实是那种情况。这以后不久，张渠在党部秘密

召集李茂生、马士奎、田恩、张志诚、路迎洲五个国民党籍的参议员开会。张渠向这几个人说：高鹞是我个人的老世交，又是三青团主任，咱们不能得罪他，这次投票，你们几个和我一定要选他。投票的时候，最好要高鹞本人或是和他有关系的人作监选人，明显的看出我们是在投他的票。另外我们要发动所有的党外参议员，投票选举吴尹生。这次我们一定叫吴尹生当选，这是罗先生的意图。这样我们可以向高鹞说：党外参议员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党员可都选你了。既不得罪高鹞，又贯彻了领导的指示。以后在投票那天，果然国民党员的参议员都在选票上一笔一划地写高鹞两个字，并且都被三青团部的监票人看见了。而其余的议员却都选了吴尹生。结果吴尹生得十二票，高鹞得六票，吴尹生当选为省参议员。

1、市参议会请愿团。

四六年十二月，参议会组成赴省请愿团，去沈阳请愿。请愿的内容是：

①、要求辽宁省迁到锦州来。

②、要求锦州市公署由铁道北迁到解放路（当时叫中山路），和当时的第六兵团司令部交换地址。

③、要求善后救济总署拨给锦州市救济物资。

④、要求对锦州市的民众武装，拨给一部分枪支（当时锦州市的民众武装在张鸿夫的领导下，都用的是刀枪棍棒等）。

请愿团的组成名单如下：团长张渠（市参议会议长），副团长穆文彬（参议员医生），团员李茂生、王恩，随员李敬诚（参议会职员）。在参议会请愿团临行时，韩德身市长曾拨

给全部旅费（数目记不清了），其他参议员陪送到车站。省参议员吴尹生同行。请愿团到了沈阳，住太原街中苏联谊社。次日访问的辽宁省主席徐箴。徐箴在省主席办公室接见我们，还简单的置备了一些茶果糕点。刚开始谈话也还客气，后来张棨要求他答复市府究竟能不能由铁道北迁到中山路去？他不耐烦了，索性站起来举杯送客，他说：“我忙得很，不能奉陪了，有事可以留个书面材料研究”。张棨赶紧站起来说：“我还有话向主席请示。”徐箴好象未听见似的回转身便走了。请愿团对他这种态度十分不满。第二天在沈阳城内鼓楼南福禄寿西餐馆楼上招待记者，被邀请来的记者有十多名。有沈阳中苏日报、前进报、盛京时报等十多家报纸的记者应邀赴宴。中苏日报的记者说：“这次你们访问徐主席他对你们的态度如何？”原来沈阳市党部负责招待我们的高组长已经事先把徐箴的态度告诉了一部分记者。张棨当场把访问徐箴的经过详细向记者们述说一遍。记者们对徐箴的官僚架子向来不满，此次有此机会，巴不得登报攻击他一番。中苏日报的记者说：“他竟假慈悲，乍到东北来，一讲话先流眼泪，好象很爱国似的。去年到北市场皇寺去参拜一次佛，临走时皇寺的金佛就丢了。这尊金佛有七斤重，是赤金的”。第二天有好几家报纸都登载了徐箴对锦州市参议会请愿团下逐客令的消息。请愿团以后又走访了匪东北行辕秘书长胡家凤，请示兵团司令部和市政府迁移地址的问题。走访了匪军东北保安司令部的顾问焦实斋，请示拨发枪支问题。走访了东北物资局局长杨绰庵请示救济物资问题，所得的答复，都是研究研究，一旦可能马上用信答复你们……四项请愿内容是毫无结果。请愿团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锦州。这

一次沈阳之行，吴尹生曾去四平拜见了辽北省党部主委罗大愚，报告锦州市罗系党的活动情况。罗大愚为了扩充他的实力，曾请求中央教育部长朱家骅（罗的入党介绍人）批准保送一批国民党员入东北大学深造。锦州被保送的国民党员有高尔悌、徐一戊、王德尧、朱蕴实、刘慧仪等。沈阳市党部也被保送一批。以后张庆凯就在东北大学内任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东北大学直属区党部书记长。这些人一面念书，一面搞政治活动。监视进步学生，把持学生会等。张庆凯每到星期日，必在沈阳市党部召集有关国民党员开会，布置工作。他本人还要每星期向辽宁省党部汇报情况（至于详细内容，因为我当时在锦州，所以不了解）。

2、张棨和国大竞选。

张棨本人是个顽固的反动分子，四六年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曾连续聘请他三次到东北大学农学院去当教授，他都不去。张棨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研究过马病理学，以后又在伪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当过教授。臧启芳把他看成是专家，所以一再请他。当时我也曾劝过他，我说："还是去东北大学为对，不然你所学的东西怕过几年都忘掉了"，当时他回答我说："罗先生和述仁不同意我去有什么办法！"那时我的企图是假如张棨能去东大，我也跟他去，弄个助教或讲师当。因为我也是学农的。张棨所以不去的原因是因为：①他家有很多房产和土地，需要他经营，在城内北街和东街都有市房。在乡下还有大片土地出租。张棨是个地道的地主。记得在四七年，因为佃户欠他的地租不给，他曾在市党部打电话给锦县警察局行政科长刘铭久（国民党员）让刘替他索租。②在党内他是市党部书记长，市参议会议长，四八年又

当选国大代表。这些地位确实也吸引他不愿离开锦州。③党部有个直属的新生活电影院，张桀把他的堂兄找来当经理经营这家影院，如果他走了怕打了他堂兄的饭碗子。为了这个影院，吴尹生和白家声对张桀都很不满意。张桀从表面上看，非常斯文稳重，轻易不说话，象个大姑娘，但是遇有必要，他却气势汹汹，盛气凌人。记得在四七年冬天，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开首次大会，听取市长周日晖的报告。开会时间已过，周市长还未到，大家都静坐等候，约有半个小时，走进会场，张桀沉着脸很不客气的问："为什么来晚了"？周日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的腿坏了"，张桀说："有事可以事先通知一声，这些人都在等着你！"当时伪市政府的科长们都端坐在市府席上，周日晖的态度十分狼狈。因为在平日周对他的属下，向来是狐假虎威的，想不到他今天也有人来管教他了。

张桀是蒋介石的一名忠实走卒。记得在四八年他去南京参加伪国大会议，他从南京给锦州来信，每次信中都对蒋介石敬佩的五体投地。有一次来信说："大会期间秘书长洪兰友招待代表们特别周到。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亲身到我们宿舍来个别问候，问长问短十分亲切。总裁（指蒋介石）当选总统，真是天与人归一致赞成"。又有一次来信说："总裁和我们在一起摄影留念，他老人家站在中央，真是鹤立鸡群"。可见当时他对蒋介石崇拜的心情了。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一心梦想总统的宝座。在这一年里，全国各地普遍扮演了一场民主竞选的丑剧。竞选国大代表、竞选立法委员，弄得乌烟瘴气。实质上都是党内早已内定的候选人当选。在锦州参加国大代表的有张桀、吴尹生、

田树森、常怀仁、路迎洲。田树森是四五年由重庆飞回来的老国民党员。他和辽宁省主席徐箴、锦州生产局长石九令等人有些老交情。四六年任命为国民党锦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在这次竞选中他自认为是老资格，就和张梨真刀真枪地唱起对台戏来。另外一个竞选人是韩介生，他为了竞选国大，特意从南京赶回来参加竞选。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个专门委员会的要员。他的一儿一女都是国民党员。儿子就是现在市医院的外科医生韩杰。女儿叫韩蕴琴，当时在医学院念书。常怀仁是个老锦州，他自称在锦州住了三百多年。常怀仁是当时伪辽宁省主席徐箴的学生。徐箴到锦州，曾给他一个中学校长当。以后他在历次市参议员竞选中，都积极参加竞选，可惜一次也未当选。记得四七年竞选教育会参议员时国民党内定马士奎当选，可是当时的市教育会会长，师范学校校长王述琦，坚决要参加竞选。初中校长常怀仁也积极奔走，四处拉票。这样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王述琦在锦州师范读书时，常怀仁曾经是他的老师。常利用老师的身份，动员王述琦把票让给他。王坚决不让。这样三个人只好各显神通。马士奎发动中、小学教员中一切国民党员替他拉票。王述琦也派去一帮教员如王鸿钧、方溢等替他奔走。常则天天往返各小学校长，足足奔走了一个多月。投票那天，有人提议候选人要发表演说。首先是王述琦发言。大意是说：他要参加竞选，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身份比较合适。如果他当选，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方便，可以直接走进教育厅，见厅长等等。他的发言是摆老资格，认为自己是由重庆飞来的，并在省教育厅当过督导。常怀仁发言说：“他在锦州世居三百多年，声望最高，理应替地方办事等等。”马士奎说：“如果

他当选，他能替所有的教员伸屈喊冤，他的嘴就是大家的嘴……”发言完了，接着投票。投票结果：马士奎九十二票，常怀仁八十三票，王述琦得四十六票。尽管常怀仁几次失败，但他并不灰心，他每次都认真地参加竞选。在国大选举时，他曾厚厚地签署了五百个公民的名簿，送到市政府民政科去，报名参加竞选。现在看来，当时常怀仁确实是个官迷。国大代表按选举规定，各市县政党提候选人一名，这个人不必有公民签署，就可直接参加竞选。除政党提名外，凡是想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必须有公民五百人的签名拥护，才有参加竞选的资格。锦州的政党提名候选人是张渠，其余的都是公民签署。在选举前夕，党部曾印发了很多竞选传单，上面印有张渠的像片和他的简历，张贴在大街小巷和酒馆饭店茶楼。党部曾发动全市国民党员积极为张渠拉票。为了竞选国大，在四七年春天，曾吸收三十多名伪保长参加国民党。在投票那天，保长们亲身率领选民，到投票场所投票。国大选举因为有田树森和韩介生参加竞选，所以不得不在表面上走走民主形式，发动选民投票。但实质上监票人、查票人都是国民党员。尽管如此，田树森还是把张渠告到伪辽宁省高级法院去，控诉他在选举中弄虚作假。其实国大代表竞选，本来就是一台假戏，唱一唱给百姓看，给外国人看。当选的代表有几个不是内定的？国大代表投票结果在锦州是张渠当选了地区代表。胡石麟当选了锦县地区代表。王述琦当选了教育会代表。在王述琦竞选时，常怀仁率领锦州初中全体教员三十多名投反对票，表示不拥护王述琦。张志诚当选了妇女界代表。这四个代表在四八年都去参加了南京的猪仔国大。投了蒋中正一票。从而亲手把蒋介石捧上了伪

总统的宝座。

至于立法委员的选举，更不成样子，干脆就是选举事务所的几个职员包办代替。在选票上划圈。锦州地区的政党提名候选人是石九令。石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室少将主任五年。在选举前夕，罗大愚曾来信指示，罗系党员要支持石九令竞选。并具体指示各地区给石的票数。锦西县有一部分给罗大愚本人。石九令在投票前夕真有些战战兢兢，怕罗系党员不真心拥护他。石在选举前大肆宣传，造成声势，成立了选举事务所。初中校长常怀仁，女中校长阎文玲，三青团主任高鹏，师范校长王述琦都积极为他奔走。石本人则在吉日街每天请客吃便饭。街上悬挂大型宣传标语。选举当天选民廖廖无几，都是事务所的职员，成捆成捆的往票箱里投票。

六、其它二、三事

史兴被贬：史兴是市党部的总务组长。他是一个典型的流氓党棍。靠三理会起家。他原来是黑山的一个地主子弟，伪满时在黑山国高念书。中途被开除学籍，后来当铁路乘警。“八·一五”后，参加国民党。党部公开后，在党部当守卫。因为他善于逢迎拍马，专给有权势的领导献媚如吴尹生、白家声等，对他就另眼看待。四六年党部改组时，他便爬上了总务组长的职位。他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专靠勾结特务为生，如当时锦州中统负责人乔长虹、吕东藩就和他经常来往。当时市党部的其他人员，很看不起他，常背地开会想把他从市党部排挤出去，但由于吴尹生和白家生十分重用他，才无从下手。四七年由马士奎带头向当时的市党部秘书

白家声上了一个签呈，上写“无条件要求史兴同志离开党部”。后来白家声召集了全体科室人员开了一个秘密会，问为什么对史兴有此反感？此时在场的，有马士奎、王恩、程矜志、孙绍吕、陈淇、张敬毅等人。马士奎便述了史兴如何表面向白家生献媚背地大骂白家生无能的话，学说一遍。白家生听了默不作声，以后也未撤换他，只是从此后，白对史的态度冷淡了。四七年冬天吴卫生去沈阳出席省参议会，当时白家声调辽西民报去当总编辑。党部秘书由马士奎代理，于是大家又向书记长张渠递了一个签呈，上写“查史兴同志媚上欺下、惯以党部名义在外招惹是非、到处撞骗，倘不开除出去（指史兴），恐“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希书记审查处理为荷。”此签呈由王恩、陈淇、张敬毅等全体科室人员署名，由马士奎面呈张渠，在这以前陈淇还向张渠详细介绍了史兴以党部名义在外敲诈勒索的情况。史兴曾依仗职权，在各处饭店吃饭不给钱，在丝房买布不给钱，在皮毛业工会制皮袄不给钱等等很多勒索事实。张渠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把史兴撤职。由于史兴的请求，对外未公开这件事，所以外界人始终不知道，只是史兴从此不到党部上班了。每天只夹着皮包到三理会去鬼混（当时他是三理会的理事）。史兴自从离开党部后，对白家声、马士奎等人怀恨在心。后来他和匪军第六兵团九十三军侦缉队长温上尉勾搭上了，他向温告秘说：“白家声和马士奎两人和共产党有联系。马士奎曾去朝阳廿家子等地讲演过共产主义等等。这些都是和温上尉有联系的，孙绍吕暗中告诉马士奎的。直到四八年，解放前夕温上尉还在调查马士奎和白家声。在四八年秋天，三青团主任高瑶和县党部秘书李茂才，都因共产党嫌疑被逮捕押在第六兵

团。这件案子也是姓温的搞的。温当时住在城内大塔胡同，德记印刷所西院宋传典的家里。他手下有很多暗探，史兴和孙绍昌都是他的腿子。孙绍昌当时是正阳区副区长，国民党员，四七年曾在市党部任助理干事。史和孙两人的特务身份，都是以个人身份秘密参加的，连市党部都不知道。孙绍昌偷着向马士奎讲，温上尉手中有个黑名单。在黑名单上有高錡、李茂生、白家声、马士奎等三十多人的姓名。后来高錡和李茂生先后被捕，，押在剿匪总部（在铁道北铁路局附近，主任是贺魁）。还未等逮捕其余的人，锦州就解放了。史兴和温某都跑了。那些特务腿子也散了。史兴还扔下个老婆名武爽书，住在城内南一街，炮火炸断一臂（现在此人还在）。高錡、李茂生等出狱，国民党在锦州演出的丑剧告终了。

郑天狗抗日的回忆

李在南

（一）郑天狗组织义勇军

郑天狗名桂林，改字天狗，其意为天狗吃日（指日本），沈阳人。民国二十年在昌黎县五二军一八五团为军需中士。以后入军需训练班，毕业后回团升军需上士（与绥中张安屯、郭治安同在一团充差。郭现在打雀子卫生所任医生）。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不抵抗，东北地盘被日本任意践踏，人民沦为国破家亡。天狗有爱民之心，即辞差赴建昌县南境，集三四十人作抗日宣传，同年阴历冬月到绥中县北境山村宣传抗日道理，得到穷人欢迎。

日军于阳历腊月三十日进绥中城，大户惧怕日兵，纷纷逃走，城外各户居民惶惶不安。当天，在杜家屯铁桥，日军设岗哨，无故开枪打死卖粮车夫一人和打死一个过路人，传到各村，乡民十分愤怒。

郑天狗闻之，将队伍带到绥中城西十五里的凡石山，路上郑天狗对百姓说："日本人占了东北，咱们当了亡国奴，日兵竟无故开枪打死咱们赶车的，政府也不敢管。来，都跟我走，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刀，拿棒子，跟洋鬼子拼！"乡人居于气愤，争着入伙，很快聚集了三、四百人。郑天狗又令人去富户借枪，初二晚间派一人去周家村孙九伶家借

枪，来人对孙说："奉郑司令命令向你借一支枪"，孙应允。来人又说："你也跟我去凡石山见我们司令。"孙即跟去了。又到同屯齐香臣家叫门说："奉郑司令命令向你借枪。"齐怕是土匪未敢开门，却将枪从偏房扔出院外。又叫后周村韩会民二弟去见司令，二人到凡石山，天狗礼宾相待，并给二人团长职。天狗向人们讲抗日道理，人人佩服，都愿去跟郑司令去打小日本（当时我在周家村开药铺）。

（二）义勇军攻绥中驻扎的日本兵营

腊月初二晚间（日本进绥中第四日），日本有部分在县东大街住，有一部分驻车站。郑天狗领三、四百人，摸到车站附近，将人分成五队，前一队数十人持枪，后四队是刀棒。攻东大街又是一队。只听信号枪一响，城里城外喊杀声震天，有一队攻城，一队攻车站，日军惊慌开枪抵抗，因他们兵多，枪支良好，弹药充足，不到半点钟车站义勇军退走。同时攻城义勇军大喊一声直扑南门口，日兵用土袋在南门外双升号前垒一小土堡，内有三、四个兵站岗，被义勇军包围，双升号柜伙郭明德（大钟鼓屯人现在仍活着），伏俯窗下听到日兵叫喊甚急，不多时日本将坦克开去，用机枪扫射，义勇军摸黑向北山岳地带撤退，因天黑日军未追。天亮后日本军坦克车直向西北大路出发。二道岭屯，夜间住义勇军马队五人，清晨见日本坦克追来，两名上马逃走，一名因马蹶没得骑上被坦克射中身亡。有一义勇军为北山人，在西大街被日本军子弹射伤足部，不能行走，住到韩家洼子他亲戚家。其亲戚恐遭其祸，报告村长，村长韩老润说："你不报告我装作不知，你一报告我也没法子了，只好报告吧！"

即时韩报告警察，警察将那人绑缚而去，处以死刑。孙九伶次日回家，我问作战如何？他说："我没去。我一寻思，你拿大汉奸张凤阁当亲人看待，我不赞成。"后来齐香臣对我说："孙九伶随义勇军到车站后，留在后队呐喊助威，他没上前作战，孙九伶不敢说实话，怕汉奸张凤阁知道。"过了几天，义勇军把借孙、齐两家的枪送了回来。

第二日，日本几十人出城扫荡，周家村进城人被打回。二台子有一人骑骡子进城，他见日本军队迎面而来，回转马头就跑，日本马队追击，开枪把他打死。

（三）张凤阁组织维持会

初三日夜，日本兵营受到义勇军突然袭击，十分恼火，日军斥责伪县长温桥说："你说县内没匪，昨晚是怎么回事？"温无话可答，旁有张凤阁对日本人鞠躬说："凤阁有良策，"日官高兴，张自报为农务会长，并说到车站欢迎的有他。日本问其策，张说："义勇军为匪人多，枪弹不足，散居山沟，宜以武力围攻，凤阁为农会长，了解民情，可命各村组织乡勇，大户每家可买枪一支，小户三五家凑钱买一支，各村建自卫团，撒下天罗地网，很快就能消灭。日人欢喜，令县长召开各绅士会议，组织维持会，任县长为正会长，张凤阁为付会长。因张是第一个献策者又是本地人，了解乡间事，掌有实权。日人为了及早消灭义勇军，又准发给各村枪支弹药，遂成后日急剿义勇军的伎俩。

（四）维持会极力宣传"大商字"

日本兵未进绥中时，阴历九月间，夜，匪首"大商字"

直奔杨保屯，议定绑王八老客(即李少白)肉票，因李家屯无人，遂由杨家屯到周家屯，绑去赵老红到大石谷吃早饭，这时绥中商务会得知消息，张凤阁请绥中陆军出剿。当时“大商字”令赵老红面向屋内北墙坐着，他卧炕手持烟枪抽烟，一人对“大商字”说：“晌午有云彩有用（指陆军警察）外面土匪与陆军开火，抢山头。”“大商字”故做镇静，吸烟不语。外面枪声更急，“商”遂领人去抢占山头。日陆军反击，被“大商字”打死九名。事后不知“大商字”去向。张凤阁以“大商字”为借口，通知各保甲长、警察所向百姓讲演说：“义勇军就是“大商字”，他们走哪儿就抢哪儿。”人们听了都惊慌，财主反对义勇军，穷人也对义勇军疏远。警察们讲话说：“昨天攻城就是‘大商字’干的，他们混进城抢买卖，被皇军打跑了，皇军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安宁，让我们组织自卫团，咱要和皇军一心一德，共存共荣镇压土匪。”并说：“当义勇军的家属应劝自己子女回家，政府不惩处。不听从者法办。”之后，穷人不敢参加义勇军。富户怕抢，极力出钱买枪。日本又给保甲长发枪，总共每屯不下十几支枪。村外设有岗哨，大户自家修炮台，借以抵御义勇军。

（五）义勇军攻大王庙、业家坟警察所

年底大王庙警察所所长蔡化南领警察数名到山沟宣传义勇军是土匪，应当消灭，阻挠穷人参加义勇军，恐吓义勇军家属。义勇军司令郑天狗十分愤怒，派人侦察，得知该所确有警察二十几名，时常出去欺诈人民。于腊月二十九夜十点多钟，郑天狗领人将警察所包围。警察所在房顶设岗哨一名，他并未发现，当义勇军爬到墙下，警笛一响，四面一齐

喊杀，猛烈向院内投手榴弹，顿时院内硝烟弥漫，警察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义勇军抢入屋内将二十几名警察全部绑缚，内有裴策安，是宽邦人，办内勤，二十多岁，被绑后吓昏了。事后裴对我说，忽听有人叫我，“你不是宽邦老裴家的吗？”我回答：“是”便与我解了绑说：“别害怕不毙你。”后来把蔡化南等二十几名警察跪绑成一横排，枪毙于院内（裴策安逃生后对我说）。

攻业家坟警察所

民国二十一年春。业家坟原有几名警察，一天由绥中又去几名共十四、五名，住严振武院内。入夜项警长令人站岗，他同其他警士在屋打牌。因业家坟穷人多数为义勇军，早已报与郑天狗，郑司令命旅长雇永祥带人去攻。当晚队员拨到墙角，枪声一响，从墙外扔进手榴弹，并跳入院内。项警长等因打牌未得及伸枪抵抗，即被义勇军活捉，遂推到院心都被枪决。

义勇军未搜翻住所，只把枪支弹药全部带走，唯有二警察钻进秫秸垛中才免于死。

汝河站距此七里地，有自卫团大队多人，闻枪声未敢援救。

从此义勇军名声大振，穷人方知义勇军是抗日队伍，纷纷参加。我叔李森林和该屯穷人都入了伙。

（六）义勇军队员窦海山被捕

窦海山回家（忘其屯名），被警察告知警察局，局长张子卿领人去捕。穿便衣带草帽，到村中查访，见海山在门前站立，突见张子卿来，回身进屋急上炕翻行李底下的手枪，还

未取出，张子卿已追到屋里，纵身爬到窦海山身上，将他抱住，警察进屋把他绑缚送日本营看押。他脚带铁镣，每日给稀饭吃，吃尽苦头。正赶日人宴会，看守的小洋鬼子已喝醉，牢房有铁道钉一只，他塞在袖筒中，然后叫道："我得去拉屎"，日看守开其门，到厕所因他无屎拉不出来，蹲了老半天，看守等得实在不耐烦，左右徘徊，他见日兵回头，握紧道钉向日兵猛击一下，日兵昏倒，将子弹带束在身上，取枪在手，越墙而走。跑到东园子白菜地寻石头两块，用平生力气，砸开脚镣，往东而行。顷刻马蹄声渐近，他趴在白菜地里让过日兵后渡过六股河跑到兴城县青山。

（七）枪杀"土居本"

民国二十一年春，日本派"土居本"到绥中北大路沟村、李新山村公所，带马警二名，土是日本娼窑掌柜的，此次被派侦查义勇军行动。土居本穿中国兰士林布长衫，匣枪跨在腰间，戴黑缎六块瓦便帽，无帽疙疸，仰卧炕上睡觉不用枕头，卧床抽纸烟，李新山看了太不顺眼就说："土先生你快走吧，义勇军有几十人，在郭家庄火石门等屯，居民正往南跑。"土说："你的心不好，想将我支走，你说有几十人我得查查。"李说："倘再迟疑，义勇军将你抓去怎么办？"说话之间有人进屋报告了，"快跑吧"！"土"听了害怕，到东平坡派出所，那马警二人往别处跑了。东平坡有个姓支的队长，青年人，为东平坡自卫团团长，心早已投诚义勇军了，但未得机会入伙，因见"土居本"带有镜面匣子，见他耀武扬威，十分气愤，便起杀机，欲请功义勇军，遂将"土居本"诓到村外说："土先生咱到外边看看义勇军

有多少？"上"随到外边，一问头先令人抱住，后面开枪，"上"死于非命，支令人在河套沙地挖七尺深坑埋之。义勇军走了，乡人大恐，日人因士居本失踪，屡找北境数村长，迫促调查下落。李村长（新山）不堪其扰，骑一驴到县，见县长温继桥，李说："日兵营老找我，叫找士居本下落，我挡不了，这怎么办？"温施一计说："你找一能说的人，给几个钱，就说看到来的。"李回乡果找一能言之人，滑片薄嘴，四十多岁，当过警察，有胆量，给钱一百元，便来县城日本兵营，对日长官说："我看到来的，义勇军大队过来，我跑到树林里躲藏，听人声杂踏而去，知义勇军到，在树丛中偷看，见绑一人穿兰布大衫，戴六块瓦帽，无帽疙疸。众人说："他不是高丽就是日本，拽到青山后打死。"日长官伸出大姆指："你是大大的好人。"并给伪币两元，一包糖。日人对此事并不死心，仍在东平坡调查，有知者不敢言，恐遭其祸。延宕二年，日本派中国特务一名，到该屯大户尹四先生家，调查此事。东家让上屋睡觉，他坚决不干，自愿到下屋睡，下屋有一放牛娃，与他在一起吃睡，每日给放牛娃零钱和糖，日过很久，小孩与他混熟了，便说出实话，特务跑回日本兵营，告知日人，日兵令乡人挖地七尺取出死尸，筋肉皮肤犹如生时，其妻用手巾拭其脸上沙土哭曰：将挖坑的，抬埋的，调查不报的罚跪在坑边一日。李新山常说："我吓坏了，但却未受连带。事过一二年得知支队长被捕，押送锦州，生死不详。

（八）日本飞机轰炸和平居民

义勇军枪杀"士居本"后，日人对义勇军施行暴力，遂

派飞机监视义勇军行动。同年三月，日本飞机到平河子村上空，屯长命令拿出日本旗铺在地上，飞机才飞走。

午后前街死一人，聚集多人，商量打酒买菜，做酒席发丧，日机飞来，错当是义勇军，遂向人众投弹，炸死数人。有一家新媳妇，坐在窗台上也被炸死。肖景清听到炸弹声，全家几口都卧在屋地下，他去下屋关门，炸弹落在上屋，肖在下屋被炸昏，他苏醒过来，到上屋一看，老母被炸烂，三弟妹被炸死，肖老五头部炸伤，石板屋顶被炸飞，箱柜成灰，挂在墙上的两棵快枪被炸碎（肖景清到县城萃文阁向大家说的，我又细问一回）。

（九）义勇军副队长王怀武遇难

王怀武抱庄子人，年五十余为义勇军，出身破落大家，是个"秧子"，没当过兵，没当过胡子。对日本欺压中国十分愤怒。加入义勇军后，常骑马回家，日久天长被日人所知。三月一个中午，他正坐在炕上吃午饭，警察程连哲进屋，看王的衣服及枪挂在墙上，程象猛熊一样，阔步进屋，摘墙上的手枪，一看还是枪壳，程叫王怀相把枪拿出来！"王见程手枪对准自己，没法抵抗，只好将手枪由屁股底下拿出来递给程，王被程逼上马来，未绑，王马快他想打马飞跑脱险，程骑的是小黄马，比别的警察马快，但追不上王的马，眼看王怀武要脱险了，程连哲想用枪叫住他，失手一枪正中王后腰，王坠马牺牲了（这段情况是程连哲到翠翁阁刻字铺说的）。

（十）义勇军攻打四家沟

县中城北四家沟，四面高山峭壁接连，只南面有一小口可

以出入，地势险峻，多年来土匪不敢抢掠。六月里义勇军离此屯三、四里住，财主徐化轩闻之，使徐少甫骑毛驴上城告密，被义勇军探知。

第二天义勇军派一差人报信，要他给义勇军作饭吃，徐化轩应允，惟大小两院不许入，紧关大门，并进炮台准备抵抗。午饭时，不少义勇军带武器来徐家吃饭，饭后走了。

徐化轩告知大小两院，义勇军不可打，大小两院不听并说："到我们院我们就打"，不一时，回来几个人叫门说："文明棍忘拿了，徐化轩开了大门，义勇军直扑上屋，屋有铁柜开不开，在院中找到一把铁镐，两下就凿开了铁柜，内有钱三百元，三人数后正要走，窗外有一人说："也不分我点？"屋内未答，屋外人便扔进一个手榴弹，炸的三人成肉泥。大队来了，令徐化轩叫大小两院的门，叫不开，义勇军向院中扔手榴弹，大小两院炮台还枪，徐三、徐老五守上屋，打死三名义勇军。徐化轩躲在猪圈内，右手腕中一弹（我给治过伤），又攻大小两院，未攻下来，义勇军死伤数名即走。郑司令在外边一带活动未亲自进院指挥作战。

（十一）火烧东岔沟，扫荡炕大道

八月十五日各家正过中秋节，义勇军司令郑天狗令人给东岔沟会头高明远信（治红伤大夫），要借道北去，被高拒绝，高又召集多人，在东岔沟西山上布防。义勇军大队于早饭后来到，各山头开枪打义勇军，天狗司令命大队攻山头，不多时将山头攻下，乡勇溃退入庄中，各家百姓扶老携幼，驴驼东西，人喊马嘶，同乡勇全跑。山上有雷殛石块。我内人胡氏，正在东岔沟住娘家也跑了。屯中剩有王清顺和我岳

母岳祖母三人。下午义勇军打到村里，挨门搜查。各家锅里有肉有饭，义勇军吃饱了，于晚八点钟，手拿松树枝子，挨门点火烧房子，不多时村中火光冲天，照的如同白日，次日一查烧房约七十多间。

要烧我丈人家房子，一人将高粮楂子都抱来了，他问："你家有谁做过事？摆的这么漂亮？"我岳母回答："这是我姑爷李在南的东西。"他说："那是我家侄儿，我不烧你的了。"胡家房子才留下未烧。可惜我有两个包袱，我内人没拿走，次日回来都丢了。

哨响集合，借道宽邦北沟，从烧大道去大栗屯，直奔建昌（是我叔李森林所说）。

扫荡烧大道（小屯名）

八月十六日有义勇军到烧大道，叫朱家做饭吃，朱不允。考虑东西为高山，不能攀登，南北有一口，沟长七里无人家，这是北去必经之路，朱家有钱，枪弹充足，全家男女都会打枪，打的很准，遂关上大门，上炮台开枪抵抗。郑天狗司令向朱家讲道理，朱家不听，不得已令人围攻，至下午仍不能破，郑天狗急调迫击炮，仅两枚炮弹满院爆炸，震天动地，尘土飞扬。当家的看义勇军威力太大，不能继续抵抗，全家人停止射击，开开大门，领全家男女十七口出院，义勇军激于愤怒，将十几口人枪毙在院外后边，改名大坟圈。朱家只剩下朱志信媳妇老娘，侥幸得活命（此事为她所述）。

（十二）义勇军北上

义勇军在义沟西南一带活动，因重重困难，仍不能攻县城，又连日受警察大队的攻击，只好采取游动战术，子弹

给养全无接济。大户受维持会领导，各屯有乡勇，对有加入义勇军和与义勇军有联系者全严加限制，因此义勇军失掉与人民的联系。这时日本封锁长城各口，关内抗日会朱子桥不能供给子弹。又加所招来之队员不分好歹，有诚意抗日的；有想乘机发财的，当无给养时，便向大户要粮要钱。有个别队员又抢老百姓东西物件。

我叔李森林（义勇军）所说："郑天狗司令，见部下有错不以军法处治，全用说服教育，有一次一个队员娶媳妇，商好了财礼，娶时给少了，媳妇翻脸，报告了郑司令，郑司令说："这是私事咱不能管。"女人心中不悦。

如刚到凡石山招孙九令及前腰屯孙寺三，全是破大家"秧子"，这两人会抽大烟不会作事，只招去充数而已，来一人给一团长之职，均系虚名，他说："待我抗日成功时，好好编制各得实职。"

腊月，维持会严密封锁各地，义勇军活动建昌一带山村。几年后传闻郑天狗领导义勇军在张家口一带抗日，后被蒋介石收为杂牌军缴械于张北县（离张家口四十里）。

小结

民国二十年腊月，郑天狗领义勇军进绥中县，至民国二十一年八月退至建昌，未与日本作大战，但小接触很多，义勇军多数采取游击战，给日本造成军事上的困难，打击了土豪劣绅等的气焰，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儿女。

此材料多为我朋友所述，他们都是亲身参加义勇军或目睹的人，材料是真实的。但也难免有错误，希望指正。

北镇地方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的斗争实况

肖 广 谱

（一）前　　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沈阳不久，又继续向辽西地区侵略，因为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使祖国大好河山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所以东北各地人民揭竿而起，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北镇县人民也和各地人民一样，奋起抵抗。当日寇未进犯北镇之前，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主张抗日的全县各乡群众拿起土枪、大刀、扎枪、木棒，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约万余人，与进城躲避，准备投降的汉奸，大地主地方投降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将县城团团围住，激战七昼夜，眼看县城即将攻破之际，城内的汉奸、地主秘密差人到沟帮子向驻镇日寇屈服投降，要求日寇来北镇县城镇压抗日群众。日寇随派侵略军高地少佐一个大队，于一月十三日由汉奸柏瑞方（县城南沙河大地主）带路向北镇县城进犯。围城的抗日武装和各乡群众虽坚持抵抗，后因寡不敌众，抗日武装队伍才被迫撤退，到闾山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二）十二路军的缘起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在苏荣山、张忠齐二人领导下，组织了两个特别连，有三十余人，活动在闾山老爷岭、大芦花和蟠桃宫一带，治护地方，维持治安。到一九三二年一月间，老爷岭圣清宫监院(道士)王子仁开始组织“穷党”，苏张两个特别连随即参加了“穷党”，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在闾山牵马岭、内口沟及义县肖屯一带共发展到三百多人，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号称“闾山”。不久义县肖屯周某（称为周大老爷，在开鲁当过县长），吸收地、富分子又组织了一个“富党”，专和“穷党”做对，反对抗日斗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穷党”首领王子仁被“富党”所杀害。王子仁被害后，继由龙潭宫道士（监院），田信斋为穷党首领。

一九三二年二月，即王子仁被害后不久，张海涛（北镇县后青堆子人，系北大毕业生），会同于汇川（关内人），由北京来到北镇闾山龙潭宫，与田信斋取得联系，共同筹划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决定由于汇川任司令，张海涛任副司令，钱殿荣任参谋，田信斋具体负责招收人员和联系工作。

同年三月间，在闾山下马沟王太然家中，由田信斋等人研究制作军旗和臂章。确定军旗为三角形，兰色白日旗，上面写着“抗日救国军”，臂章为红色黄边，上面也写着“抗日救国军”字样，并有一行小字“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从此十二路军即在“穷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起来。十二路军正式成立后，就积极着手进行组织和扩大队伍的工作，招收了许多爱国群众和原有土匪各股绺如张绺子等，共计有一千五百多人。

关于这支抗日队伍的给养，主要是依靠闾山一带各大寺庙和当地大地主供应。他们有严明的纪律，不抢劫群众财物，如需要柴米时，崇海涛就给各寺院去信，要多少给送多少，供应是充足的。

（三）消灭“富党”给王子仁报仇

一九三二年四月某夜，十二路抗日义勇军，汇集二百多人，去义县肖屯攻打“富党”，给王子仁报仇。结果包围并烧死了反对抗日的“富党”头子周某，活捉了二头子周大麻子。获胜后，于第二天拂晓返回闾山肉口海。

（四）截击日寇军用汽车

一九三二年六月三日，由十二路抗日义勇军罗明臣带领四十余人在沟北公路何家营子截击日寇守备队的汽车。义勇军首先和伪警察队队长徐某取得联系。由徐某将日军守备队汽车出发时间告知了义勇军。罗明臣即先至何家营子动员当地群众，在西河套挖好了陷坑。第二天日寇守备队的汽车四辆开赴沟帮子，行至何家营子时，四辆汽车全部掉在坑内，不能开动。罗明臣带领义勇军即猛烈的向日寇迎头痛击。当时鬼子手忙脚乱，慌作一团，直到县城的日寇调来大量军队才得解困，仅有一辆汽车逃回县城，这次阻击战，打死日本鬼子三十七人，对日寇震动很大。

第二天，日寇派大批日伪军到何家营子，将附近树木全部烧光，并烧毁了民房，杀害了群众六人。

（五）三次召开抗日救国会会议

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召开第一次抗日救国会会议。由龙潭育监院用信斋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各邦绺头目五十多人，会上由副司令张海涛讲话，其大意是："我们东北沦陷了，要想不当亡国奴，大家就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不然亡国奴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今后大家（指各邦绺）就不要乱抢乱夺了，要遵守纪律。"

同年六月末，又召开第二次抗日救国会会议，主要是研究改编队伍问题。这次会议分别委任原各邦绺头目为旅、团、营、连、排长。任命：张发为旅长；杜铁军、苏荣山为团长；陶树范、王玉廷为营长；郭奎元、吴启山、王华国和洪林为连长；冯广富、罗明臣、于济川、刘廷玺和于洪奎等人为排长。

同年七月间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此次会议由副司令张海涛主持，有六十来人参加，除抗日义勇军人员外，并有大刀会会长罗荣山和法师王海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策划攻城打击日寇。

（六）攻打县城未获成功

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发出动员令，全军一齐攻打县城。事先由副司令张海涛派出四人，预计先到城门将日伪军岗哨杀掉。命他们四人化装成农民，跟一辆拉草车由北门进入城内，到北门时，前二人已随草车进入城内，车后二人被守城的日伪军发现，二人见势不妙，拔腿向城外就跑，日伪军随即将五门紧闭，并向城外开枪射

击。十二路军和大刀会队伍，见敌人已有戒备，考虑难于攻下县城，又撤退至闾山，这次攻城因失策未获成功。

（七）救援老梯子，消灭警察队，枪杀单喜廷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老梯子（彰武县抗日部队）由彰武县带领骑兵五百多人，来北镇预计和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汇合。当路过北镇城西十五里地的闾山东侧小白屯时，恰与扫荡义勇军的伪警察小炮队一百名汉奸特务相遇。双方展开了战斗，老梯子见势不利，随派人赶至龙潭宫找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于汇川司令求援，于汇川接信后，立即派出队伍前往助战。大刀会的法师王海峰和传教法师冯泽周自告奋勇，带队打前峰。与抗日义勇军一同前往。队伍行至小白屯时，日本人见义勇军遍山都是，一齐围攻上来，十分惊慌，急速后撤逃跑。伪警察见日本人已经后撤，也不约而同的向四处乱窜。伪警察局长单喜廷忙向小白屯西北方向跑去，但被义勇军赶上包围，并将其活捉，当即用札枪刺死。这次战役缴获大小枪二十多支，打死打伤小炮队警察二十多人。由于伪警察给日本军打先锋，日本人在后面督战，更因日本人跑的快，所以未能将日本人活捉住，这次战役给敌人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鬼子叫大刀会为“铁孩子”。

第二天日伪军共出动千余人，分五路围攻抗日义勇军，前面用炮车、铁甲车攻打，日伪军在后，用大炮机枪疯狂进攻。义勇军在此不利情况下，依然坚持战斗。并向日伪军反攻三次，未获胜利，死亡七、八人。后见敌人众多，难于取胜，随即迅速向闾山西部义县撤退。当天日伪军在闾山十字口、闫家店一带村屯中，烧毁民房五百余间，杀害群众四百

余人。黄昏后，日伪军才从闫家店集合返回县城。

（八）击落日寇飞机、生俘飞行员

一九三二年初冬，抗日义勇军由苏占北带领一部分人员，在北镇县境内的八家子车站附近的高台子，用连珠枪击落日寇飞机一架。该机共有两名日军，一名飞行员掉落在八家子屯，当即被俘获。另一名随机落在黑山县境内摔死。苏占北随即派人到黑山县境内将飞机取回。为避免日军发现，随用秫秸将机骸埋藏在高台子大桥下面。日寇摩托队当日即到八家子寻找，此时苏占北已带领队伍离开八家子，将被俘的一名日寇飞行员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带走。该日军飞行员走到半路，听到后面有摩托车声，企图待救就赖着不走，苏立即将其就地击毙，并将尸体塞在冰窟窿里。然后逃脱了敌人的追赶，返回驻地。

（九）田信斋被害

由于当时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镇特别支部的领导，所以抗日义勇军，特别是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从成立起声势日益扩大，在打击日寇和汉奸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日寇和汉奸反动派兵力占优势，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受到了敌伪的严重控制。为了扩大抗日的活动，龙潭宫道士田信斋曾先后两次去北京，与抗日义勇军联系。而第二次，约在一九三三年秋季，田信斋去北京时，就被日伪特务分子发现，并跟踪。当田信斋由北京回来在沟帮子车站下车时，就被日寇绑架，并将其杀害。田信斋就义时还大声疾呼："要救国就不怕死！"

（十）十二路抗日义勇军撤离北镇，开赴热河继续抗日

一九三二年底，日寇联合北（镇）、义（县）、阜（新）三县日寇和汉奸警察队，组织较大兵力，大肆搜山。十二路军见此形势，才被迫撤离闾山地区，大部奔赴热河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另有部分逃散回家。但是义勇军遗留下来的小股部队在日伪统治时期，始终未停止过反满抗日斗争。

（十一）后语

北镇县地方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虽然从成立到撤退热河仅仅一年的时间，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对日本的打击是不小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抗日义勇军的抗日事绩，至今仍在县内群众中广泛流传，将永远鼓励群众建国之斗志。

伪满热河省坚壁清野政策之我见

春　风

我堕身于伪满十三年，在热河省境达十三年。前七年职位是在省公署，任务是经常下乡调查宗教寺庙，古寺古物，学校教育等事。所以省政乡情大都耳闻目睹。后三年任热河省隆化县长，直到解放。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毒政暴行，多是身受亲尝，其中最残忍最凶恶的就是热河省的坚壁清野政策。抚今思昔，令人不寒而栗！

一、伪满坚壁清野的开端

伪满的坚壁清野政策，一般人都以为是在热河省开始施行的，其实来源于通化。由于通化省在"九·一八"事变后，有爱国志士杨靖宇，邓铁梅等义勇军，风起云涌，愈来愈盛。致使日伪满军讨不胜讨，一时计穷智竭，莫可如何。适有通化省警务所长岸古隆次郎（后任通化省次长），是一个满州通（会说中国话，对满州事情比较熟悉）。鬼计多端，具有一付假仁义真狠恶的心肠。他一方面组织警察讨伐队，进行讨伐，一方面利用地痞流氓，悬赏搢缉，终把杨靖宇部下的叛徒程斌捉获。程斌曾冒充义勇军参谋、师长等职，深知义勇军的底细，心肠非常毒狠。竟将义勇军食粮接应情况，隐身屯处所，一一暴露。并向岸谷献策"清乡断根就可制义勇军于死命"。此计正对岸谷心头，就在这一带开始了

坚壁清野政策：十家连坐，百户同科，一人犯法，各户均受牵连；清理人口，合屯并户，限制谷物出入，禁止人畜上山……岗哨林立，昼夜巡视，无辜居民，每遭诛戮！义勇军见此情况，遂转移阵地。日本鬼子认为得计，喜气洋洋，提升岸谷为伪满国务院地方处长，让他企划整个伪满州国的坚壁清野政策。当时热河省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把这条鬼计先搬热河去了。

当时的热河省情况怎样？他们在通化的简单的坚壁清野能否用得上？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当时的伪热河省西部有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向热河省内进攻。因为是人民的军队，到处可以为家，是反对侵略的战争，人人都愿相助。人民军队巧妙的施行了蝗蝶战术，这个战术是聚散无常，变化多端，说聚则遍地飞来，说散则踪影不见。明明是锄地农夫，紧急就变成战士，眼看是放羊童子，扬鞭举手都是通讯的暗号，追之于前，忽然出现于后，困之于中，转眼反被包围于内。在伪康德五年春，滦平县红梅寺警察署，买了一车烧柴是一个村妪赶车，一进院就由车内钻出八路军数名，全警察署都被缴械。同年秋季，日本鬼子听说八路军攻打兴隆，动员全省军警都去围剿，赶到兴隆一看，只见驻守兴隆的鬼子死尸在地，标语满墙。正在撕标语开追悼会的时候，距此三百多里的青龙又被攻下。待到青龙，而西北部的丰宁、滦平等县（青龙西北四百多里）都告紧急。东突西奔，不知所以，南瞻北望，草木皆兵，欲退不得，欲罢不能，遂使日本鬼子数万军警部队疲于奔命。但是帝国主义者向来不会甘心死亡的，每到穷途末路就向百姓张牙舞爪，这是他们的本性使然。约在康德五年，这个万恶的坚壁清野

政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在热河施行了。

二、坚壁清野政策的具体内容

伪热河省的坚壁清野政策，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进行的。共分四个步骤。第一是清乡，第二是划定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第三是集家，第四是三光政策。在形式上看，有时各自为政，从本质来看，混然连成一体。是步步紧、步步狠，狼狈为奸，相互为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1、严格的清乡制度

首先是整理街村机构，重新划定村界，按照地形人口、情势险要程度等，规定每个县旗（旗是蒙民、旗公署相当于县公署），为十至二十个村，每村设有村长、助理员、司计（会计）、行政（管户籍等）、烟政、弘报（类似特务）等股，村内职员大约不下二十多人，小村也有十几个人，重要地带的村公所还设置一至二名日本人，名为村付，实为掌握全村大权。凡事都得通过他，否则就是藐视皇军，违背王道。村长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有财有势的人，其他办公人员，或由县旗公署委派，或由本村推选，大都是认为政治可靠、家道殷实，有线索牵连具备着一定把握的人。每村公所内都暗设监视人一名（形同特务），村公所处还有专门对该村公所监视的一、二人，定期向县旗公署弘报股和警务科汇报，情节较重的还得直接送交日满当地宪兵队。至于村长和村付唯一的职责，就是定期向上级汇报村民的动向。有书面汇报，定期汇报，紧急汇报，临时口头汇报，各有指定时期，逾期或谎报，即按西南防卫司令部的军法处罚，有功的也按规定行赏。其中比较最突出的是[illegible][illegible]工作（也叫特务组织）。这个工作名义是

一般地把户数、人口数、年令、住址、、职业等项了解清楚，还要把每个人都划定类型。第一类是良民，多数是地主富农，守财如命，不能逃跑，恐怕八路军闹革命的人。第二类是次良民，所谓殷实人家，随着地主一边倒的人。第三类是"要视查人"。这一类人包括很广，一般无产业、光棍汉、旧军人、旧职员(指旧中国或伪满退辞的)、部分村长和个别警察署等都划为这一类。第四类是由关内或远处新迁来的住户，或临时寄居的人。第五类是形迹可疑，或家中人有在关内工作长期不归的住户。分门别类，登记在暗中的簿册，由警察或日满宪兵特务保管，逐区(按特务特殊规定的区域，经常变换，外人摸不清)、逐户都有专职监视人员，一举一动都得汇报。

此外各村还有协和分会的设置，名日是日满协和，伪装着一付慈善面孔，实际上是最阴险最毒辣，杀人不见血的特务机关。在坚壁清野的政策上，专搞村民思想工作，他们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专找穷人的破绽、机关单位行政部门的漏洞、各个级层的底细，暗中向特务机关汇报。但是表面上却处处要显示出同情群众的样子，如张罗救济粮，发放救济衣，帮助医疗疾病，有时还出头保释犯人等装腔作势地假仁假义，无非借以掩人耳目而已，骗取群众的信任和好感。如此等等，鬼子以为是在政治清乡的基本工作上，作了万全的准备，有了必胜把握了，于是就开始坚壁清野第一步的屠杀政策，进行镇压。约在康德五年秋季，就在承德大抓通匪嫌疑犯(指和八路军有联系的人)，把省公署的张实科长、王股长、科员、椿员以及税务临督署科股长、警察、司法、工业、商业、一般住户等四、五十人，都抓进监狱。轻

的长期监禁，重的就地枪杀，以示坚壁清野政策的威力。弄的人心惶惶，恐怖万状！接着各县旗乡村，大势的进行同样的逮捕，凡是他们爪牙认为有嫌疑者，都难幸免。每日有大车小辆或成帮成伙的向承德押送。这时承德有三个大杀人场，是承德有名的三个大杀人窟。这是伴随坚壁清野政策益形扩大的最残忍的产物。第一是鬼子的西南防卫司令部（承德离宫），凡是百人左右的大型集体屠杀，都在这里执行。因为这个地区是旧日离宫，周围城墙二丈来高，方圆四十多里，无论如何烧杀，外人都难看见，免露王道主义的丑态。并且有日军把守，不易遭到意外的抢袭。第二个是承德监狱，能关押千余人，备有刑台、绞架、枪杀室、炼人炉，电烙室等，极尽其残，天天都有一、二十人的生命葬送在这里。第三为日本宪兵队部，是个专门逼罪问供的地方。他们的刑具颇多，据说有百余种。按抓来人的年令、性别、犯罪情节使用刑具。一人受刑众人陪场，弄的人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一经吐露真情，承认罪状，立即烧杀，尸骨无存，恐怕泄露底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皇道"，这就是王道、皇道结合而成的坚壁清野政策的一端。

这样做，鬼子认为他们所谓的坏人，就都能斩尽杀绝了。而乡可清，祸可避，高枕无忧了。谁知越杀八路军的攻势越猛，越清八路军的耳目越多。各地此起彼伏，八路军日见增多。于是日寇又布置了警察密网，张大爪牙，凡是大一点的村庄，几乎都有警察署和分驻所。这些豺狼的毒辣更非言语可以形容。人民自然遭到了很大的涂炭，可是他们对于八路军的行动是无法弄清的。不但如此，他们这些警察署、所往往遭到八路军的袭击和消灭，如在兴隆，滦平等县活动的八路军王抗部

队，是专能打警察的，好象是接取伪警察枪械的别动队，每攻一处大都是满载而归。伪警察机构倒成了八路军的供应站。日本鬼子狼狈益甚。于是就开始了第二个坚壁清野步骤。

2、残酷划定无人区

啥叫无人区？无人区也叫无住地带，就是把热河西部，八路时常出入地带，或比较难于防守的地方，指定不准有人，名为无人区域。将原有住民，用扫荡方式撵走，房屋不自己拆除就被烧毁，鸡犬不留。设置监视哨所和扫荡部队，经常巡视。原则是见人就杀，见树必毁，蒿草没人头者都得焚烧，几乎使这里成为一片焦土！用意是想用这个办法筑起无形的长城。当然他们是挡不住八路军游击队的。可是这一带的人民就遭到了难以形容的灾难，有家不能归，有房不能住，几辈子血汗积累的庄园，就在这个坚壁清野的政策上化为灰尘！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腿快的逃走了，老弱病残、恋恋不舍的，大都尽被杀戮！从热河的西南起，沿长城附近的山区，即凌南、兴隆、滦平、丰宁等县的西部，直至大西北和察哈尔永宁县接壤的四海野（俗称樊黎花城）等地方，长约五六百里，宽有一二十里，人口不下十余万，就这样悲惨地葬送在坚壁清野政策的刽子手的手里了。

这时候我们考查古迹古物一行，经常去到长城一带附近无人地区的地方。大的部落如程子玉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白马关、樊梨花城，辽时的兴州城、韩昌府，辽皇肖银宗的梳妆楼、大阁镇，宋时的八郎村、令公庙，孟良盗骨的红阳洞、白草山，传说的是李陵碑、苏武庙等处，无人地带的惨事悲音常常催下人们的酸心泪水。一般的古迹古物，也都在这坚壁清野的政策上被摧毁了。如苏武庙中的碑文，

姜女庙中的记载，玄阳洞的栈道夫，红梅寺的红莲遗迹等等，虽属传称，也是足资验证的珍贵材料，也都同归于尽了。

有一次我去到热河最西北部的一个接近无人区的地方——樊梨花庙，在这接近无人区的田间里，锄地拔草的人，都是一些老弱不堪的女人，全不穿衣裤，多数腰中围一块破布或麻袋，好象是不顾羞耻似的。我向当地领我去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裸腿露胸呢？天气热吗？他说：不是。他们没有衣服吗？他说：也不是。这是当地的规矩。谁定的这规矩呢？他说既不是前唐定的，也不是大清国定的。说完这些话他向四下望一望说："先生你不知道，这是接近无人区的地带啦，从去年扫荡队来到这里发现耕地的人身藏武器，干粮袋，暗结八路以后，就给我们下个禁令，不许男人到这里种地，女人种地也不许穿衣服，经大家要求才允许围在腰间一块布，这可就笑话了……"我追问再三，他才说："不但这样，有时鬼子来了，还让他们围布扯掉，任意耍笑、调戏，那些样子可就难说了。年青女子有的疯了，有的跑了，所以就剩这些老弱锄地拔草了。唉，！前几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还被他们拉去了呢，先生，你知道咱这仅是接近无人区，那无人区比这还惨呢！唉！那说哪了罢，先生！"

这是在坚壁清野政策下，划定的无人区，是热河省的最西北的一角。热河的西部还有更甚者，就以我在兴隆县的水场沟所见的一幕来说，有一位受苦最深的老大爷说："哎呀，你来了，你再晚来两天连我也看不见了，我一家十一口人，全变成鬼了，给你讲修长城的那个老太太，被火烧死了。我的大儿子被吊在树上点天灯了。我三个小儿子一个被枪杀，两个被扔在火坑里。最可怜的是我那两个青年媳妇，三个小

孙子，一个将及十四岁的老闺女！都活活的被鬼子拉走弄死了。我，我还能活着吗？我们的祖先是修长城时死的，我的父亲是直奉战争给军队拉道（引路）被枪打死的。我的母亲不是前二年你来时被鬼子搜家时吓死了吗？我还活着干啥？这次是鬼子有意让我看这些情景，以好宣传皇军的厉害，所以没把我绑在树上弄死。咳！家家有死人，户户遭火烧。还用我说吗？谁不害怕呀！我过几天就跳长城找我们祖先去……”。这是伪康德五年日军扫荡热河西部的情况。这不过是悲惨中的一点点。沿着长城这一带，人家星散的山沟里，多数是这样。时常尸横遍野，臭味相闻五、六里，哀号声音彻云霄，令人毛骨悚然！真是

长城压倒运，
鬼王逞凶豪，
死尸遍山野。
王道仗俩高。
秦皇日寇一辙修，
帝制由来是恶谋。
不用人言来作证，
请看长城几道沟！

3、凄惨的集家

无人区这是日本鬼子对待八路军第二道挡箭牌，既能坚壁，尤可清野，似乎是一个得意的阴谋，可是事实恰得其反，不但未挡住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攻入热河省的内地，不但未减少八路军的力量，反倒壮大了八路军的队伍。无人区的青壮年除死者外，大部都成了八路军的坚强战士。地理熟悉，人情透彻，不仅到处可以为家，还能得知敌人的底细。

白日隐避，夜间行军。在康德五年末，部分八路军已攻到热河中部，直到东部的平泉县、凌源县、喀喇沁诛左右旗等处。连承德街的伪西南防卫司令部、日满宪兵队，省公署、警察等机关门口，都被贴上了反满抗日的标语。有时岗哨丢枪，有时手榴弹炸到院内，甚至有时伪军失踪和丢失密件等等，层出不穷。把一些鬼头鬼脑的家伙们，都弄成昏头昏脑的东西了。于是又想出了集家的政策，对照英帝十六世纪时的圈地政策来进行圈人。按照地理环境，防守策备，把全省各地人民都集中在各个指定的村屯，用围墙圈起，设置门岗警卫，检查来往行人，以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这样好象是得以安诸了。

集家政策的规定

（一）为实行王道主义，“保护”人民利益，便于皇军“剿匪”工作，进行全省集家。

（二）凡不满十户或稍多一点的“通匪”地区住民，一律迁移指定部落或地点，不准有任何留恋。

（三）一经被指定迁移的人民，不拘远近，一律限期搬净，过期即是有意资匪，尽行烧除。

（四）不向指定地点迁移，逃亡山野者，均为不法，枪毙不贷。

（五）所遗田园，须按驻在警防机关指定时期耕种，遇有违犯，即行严加法办。

（六）所有指定的集居部落周围，都得修一丈二尺以上的高墙，开二门或三门，最多不超过四个门，每门修炮台一所，守卫室三间，昼夜设置岗哨，遇有外来串亲等人，均须验证登记，否则不准入内。

（七）为锻炼国民道德，尊皇“爱国”思想，凡出入卡门时，须向日满国旗和门卫人员敬礼，必要时得令背国民训。夜间禁止出入，遇有特殊事故，必经保甲长证明事实，门卫批准方可放行。

（八）门卫有检查盘问搜身权限，无论何人不分男女老幼均不得拒绝。

诸如以上二十余条规定，形同监狱，没有两样。根据这些法则，由康德六年起，就开始了严格的集家工作。散居的山乡农民都得向指定地点搬家。祖祖辈辈燕子垒窝一样的一砖一瓦的修盖起来的房屋，眼看着被拆除，被焚毁！爷爷奶奶所栽培的果树，眼看着被砍伐，被烧掉（特别是热河西南果树最多，人多依以为生）。多年血汗化成泡影！有的性急投河跳井，有的悬梁自尽！差不多哪个村庄都有这样惨状，若以全省来说，死者更不知多少了！

集家后的部落，都得严格执行保甲制度（伪满除热河外其他都是街村制）。十家连坐为一保，十保相邻为一甲，甲上为村，村属于县。每村设一警察署或分驻所，要塞地方，布置军警讨伐队，或固定的监视据点，备有各村攻守设施，层层节制，步步森严，不异天罗地网。

整个热河全省，至伪康德十二年止，除隆化县外（隆化只集家一部分）全部集家，也就是把全省人民都圈在这样的人圈里了。财产的损失，人命的牺牲，真是一个不可估计的数目！至于对人民侮辱的情况，更是不堪设想。每个部落都有一至二、三个警卫室，备有刑询看押的屋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押，夜夜有人被侮辱。就以围墙的卡门来说，那种非人性的搜查，一般妇女都认为是一个鬼门关。天天必须经过，

经常受到警卫人员的耍戏。偶一触动这些豺狼，就被提到关押室内，百般侮辱，莫可言状！被关押的有人被折磨死，有的人忍辱自绝。但这些兽类还不以为足，有时插圈弄套，夺人妻女。试看警卫人员，或讨伐队的头头恼恼，谁不是三妻两妾呢？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越这样做，和人民的结怨越深，而八路军的行动就越得劲。结果，把集家变成了给八路军的让路工作。遍野无人可以任意出入，地点集中攻击的目标非常好找。用粮即到部落攻取，用枪械弹药即向警察署所提拿。今天这里陷落，明天那处被包围，致使鬼子顾不了头脚。不得已他们就在各部落大量屯驻日满军警，殊不知进时容易退时难，多数都被八路军困在部落的核心，周围埋伏许多地雷炸药。仅用少数人提防，他们就不敢出越围墙一步。如此圈人竟成了圈己。

4、血腥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是日本鬼子穷途末路的一着，也是热河省坚壁清野中最后的丑态。他们的目的是，宁可把热河省人民杀绝，不让八路军进犯雷池一步。决心是很大的。殊不知历史的发展规律，早已注定了帝国主义者必死的命运，这些垂死挣扎又何济于事呢？

约在伪康德七、八年以后，尤其是伪满末年，驻在热河省的西南防卫司令部和伪热河省军政当局，曾一再奉行日本鬼子关东军的命令，伪满国务院的指示，必须把热河省的八路军铲草除根，否则就以军法从事。这一严格的要求，就冲起了魑魅魍魉——伪日满军的凶头凶脑，动起无恶不作的屠刀，用着他们所称的三无政策，群众所遭的三光暴行。何谓

三光？就是使热河全省境地，无八路军的踪影，无通匪的人员，无资匪的财物……。有则杀光、烧光、抢光，所以人们管他叫三光政策。他们为完成这段政策，把在东边道大显凶手的"岸古隆次郎"，由国务院地方处长，调任热省特任（一般省次长是简任）。他又把他豢养的爪牙警察讨伐队程斌部队、范文部队、鹏飞部队、徐景部队、陈天部队等调到热河。再加上日寇伪军，不下十来万人，组成西部防卫的攻势，也就是三光政策大型集团的刽子手。他们的分工是以行政警宪伸入各村搜根摸底，洗清思想，以日伪军讨伐队，展开扫荡，洗光山野；以司法特务，毒刑论罪，洗净"匪源"。进一部落清一部落，见一"坏人"杀一"坏人"。何谓坏人？凡财产少，以劳动为生，光棍汉，或稍带民族气节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见着这种人，就得追踪问底决不放松，偶有破绽，即行烧杀，认可错杀、错烧、错抢，不可不杀不烧不抢。少杀少烧少抢者无功；不杀不烧不抢者有罪。什么罪呢？不是通匪，就是思想须要矫正，要送法院关押或关在矫正院。一经触犯，就决不赦免。各地配有日本宪兵队，从侧面监视，无论那个讨伐队人，都得走这条杀人放火的道路。特别是凶残暴暴的刽子手程斌伪警察讨伐队，不但尽可能的杀人放火，还借机大肆抢掠，每人都发了一笔横财。有一位名叫"阿部军副"的，就是指挥官，别号大鬼头。曾以卖棉被絮钱向本国邮寄。他还有个兽性嗜好，专门搜集妇女花枕、衬衣、裤袄、小娃用物之类的东西，所以人们又都暗地称他为猪八戒。他又是一个极凶恶极残忍的野兽，他在滦平县烟筒梁一带讨伐时，吃过人心，喝过人血。如是形形色色不止阿部一个人，一般日本鬼子和丧心病狂的伪警察

多数是这样。至于大型屠杀的情形，更是有甚于无人区的扫荡和集家工作的凶残，天天以汽车大车络绎不绝的向承德三大杀人窟送人，日日可闻烧杀不绝的哀音！如青龙县玉耳崖南边一个部落，据特务腿子报告，曾住过几次八路军，这些屠夫就大发雷霆之怒，在一个早晨，鬼子军队就把这个部落围住，假称集合讲话，把全部落三十余户二百多人口，不论男女老幼，都驱逐到街头，用机枪射杀，接着就纵火焚烧，哀号震天，正在这时，他们又拉来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就用枪挑到火堆里去了。他们还说："老八路、小八路统统的死了的好……"。杀人臭气数日不绝。其他如汤河口，盘道梁、玄阳洞、涝榆沟、三义岭等沿着长城附近的山沟里劳动人家，更可想见杀了多少，烧了几何！抢去若干！原来鸡犬相闻，人烟在望，这时三十里四十里找不到一个人家。到处是烧杀遗迹，破户残梁。草木半生半死，山野尽变焦黑，形成一片阴森凄凉景象！

八路军为减少人民的灾难，一时暂避收兵，不大出动，鬼子们以为得计，喜上眉头，就大开庆祝第四步坚壁清野的成功。没想到仅过两个月，而东部北部的八路军就纷纷出动。部落据点，时闻陷落。伪警、伪军节节败北。鬼子大慌其神，调兵遣将，昼夜奔忙。正忙于东北的堵击，突然八路军肖克、王抗率领大军，由西部分两路攻来，西部情势倒呈紧急。弄得鬼子仓惶失措，慌作一团，垂头丧气，伎俩全无。据说西南防卫司令官稻田降职调转。永桥僚二大队长由于在围场御道口，全军被歼，破腹自杀。

这时恬不知耻的日本宪兵队长和大名鼎鼎的坚壁清野凶手——岸谷隆次郎竟倡出悬赏缉拿八路军首领的口号。拿获

肖克为十万元，李运昌为五万元，王抗为三万元。连级以上干部由二千元至两万元。有私报住处因以捕获者，各尝各该金的十分之一。穷途末路的日伪军，丑态毕现，这段坚壁清野政策就这样苟延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时才收场。

总之政策之毒辣，莫过于伪满的坚壁清野；受害最深莫甚于伪满的劳苦大众。日本鬼子真算是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奇迹。他们的凶恶狠毒，残暴绝伦，我虽在热河亲尝目睹十年之久，恐怕是穷我毕生之力，亦难罄其万一。唯仅撮其梗概，亦可窥见伪满王道政策的本质，帝国主义的全部真相了。

国民党统治黑山的内幕

李香圃

国民党盘据黑山不足二年，由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末。在这二年期间里，换了四个书记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马文彪任书记之前（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最尖锐、派系斗争最剧烈的阶段。任公度任书记长以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二月），是国民党贪污腐化最严重阶段。刘远卿任书记以后（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十一月）是国民党变成了军阀的附庸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工作是搜刮民脂民膏，欺压百姓，为虎作伥，装腔作势，直接帮助沈百昌，实质就是吹捧蒋介石。苟延他的独裁统治，王朝寿命。不曾想二年后，受到了八路军的铁锤惩罚，全县人民的唾弃！

一、刘马孙的派系斗争

刘、马、孙的派系斗争，就是国民党统治黑山的前幕，也是国民党内部的丑剧——狗咬狗的一部分。若把它说得清楚，就可以说明国民党的腐朽一面，也可以说是它的回光返照。所说的刘，就是刘景峦。原籍黑山荒地人。他在一九四〇年间从西安战干校毕业后，接受了胡宗南的指示，潜来故乡，奔走阜新与新立屯一带。结交常春贵与赵洗尘等人。当时常春贵是黑山国高学生，毕业后考入伪满外交部（长春）

充当委任官试补。同时在伪满法政大学夜校学习。赵洗尘是新立屯镇的一个成衣匠，仅仅识字。刘景峦认为常春贵是一个青年，具有一定的文化，联络他可做一个膀臂。而赵洗尘自己开设一个裁缝铺，可以作为新立屯的落脚地方。并且说，他们三个人都是荒地老家，因此气味相投，这才结为一体。他们凑在一起，口头上讲一些反满抗日，地下工作等。实质是扩张自己势力，等待时机，出头露面，当官发财，显示地下工作的老资格。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日寇宣布投降。刘景峦从阜新急忙到新立屯纠合党羽，联络地主劣绅，自称奉胡宗南密令，来此业经数年，抗战有功，自当首居权位。与地主王丹忱、张化宣等人勾结一起，成立新立屯维持会。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成立新立屯区党部。在区党部内设有五个科：总务科、组训科、宣传科、社会科、警保科。任常春贵为新立屯区党部书记。下有杜林田、王兆一、王贵荣、宁瑞衡、宁雪桥、张德新、刘景明、朱天沌、杨焕廷、王恩金、石显文、贾凤先、张锡年、赵万荣、王绍文、刘尚华、金祝三、林泽洪、宋惠普、王聚贤、王恩沐、李淹源、赵祥符等人分担职务，各负其责（这是由孙延三记忆的，不详各人的职务因此漏记）。维持会中掌握大权的地主们把新立屯及其附近，双山子飞机场的敌伪物资，万民膏血，抢掠一空。而新立屯区党部的国民党员们，也跟着抢夺了一些财物。到一月末黑山县城国民县党部争夺书记长的内乱已起，刘景峦又伸出魔手去黑山，巧夺了书记长。

前边所说的马，是指马文彪。原籍黑山县城内人。他由黑山县国高毕业以后，考入新京（长春）法政大学。受辽阳张枢的领导。在长春、沈阳、黑山、大虎山等地（一九四四

年——一九四五年中）吸收党羽。搜集一些知识青年，组织抗日救国青年队。于一九四五年六、七月中，曾在大虎山北高粱地内，组织宣传讲演等活动。和马文彬一起的王志全，冯明也曾来黑山。他们把宣传的材料塞在鞋里，裹在腿上防备日寇或警特的突然搜索。“八·一五”光复了，他们敢于半公开了。他和冯明、王志全一齐来到黑山，拿着中国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李光忱的委任，联络当地一些伪吏员与一些知识青年，内有张汉澄、王敏良、宋连甲、刘广守、李印棠、张国典、吴明生、江树滋、李时白等人，打算出来参加维持会，成立县政府。

前边所说的孙，其名孙家昌，他是黑山县城内人。父名孙万魁，曾当过小学校长多年。孙家昌从黑山国高毕业后，也考入了长春某大学。他接受了国民党辽宁省地下工作大员罗大愚的委任，在光复前，也在黑山地区活动。他回到黑山与姚智先、李树田、尹奉先、梁化廷、佟祥格、王韵清、傅景春等人也加入机关里来。约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八路军来了一位于科长，与戴天民到黑山接收县政府。伪满县公署行政科长张金铸带上了国民党员的徽章，以国民党员的牌口，口中唱的是国共合作，出头引导着于科长接收了敌伪政府。

“同志社”的片断

这个时期是一个混乱的局面。苏联红军的兵车一列一列地南来北往，沈阳天天飞来国民党的接收专员，有的说是天上飞来的，有的说是地下爬出来的，云山雾罩，都说自己有功。而大虎山又一列一列地过八路军的兵车。当地的地主财阀们纷纷成立维持会，维持自己的势力，掠夺日伪的遗留物资。而有些旧军阀投机分子们也纠合当地的土匪流氓，市井

无赖，抢掠日伪的武器，扩大自己的势力地盘。新立屯的雷子杨，八道壕的崔星武，都是这样货色。而黑山县究竟是一县之首，光复后就成立了维持会。山韩希侯、杨品芝、宋祖培等人筹谋划策，留下了一部分伪满县公署职员，组成了县维持会，代理了伪政权。于科长出头后，马文彪、孙家昌也出了头，他们各人同各人所纠合的人们，外增加了李贺山、张德著（他二人后来是黑山三青团的组织者），共同组织了“同志社”（地址在伪县协和会旧址），参加“同志社”的，包括马文彪、孙家昌两个系统的人们，共约有六十左右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一般知识青年。祖国光复后，在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感支配下，以为国共合作，初次投入祖国的怀抱中，而去参加“同志社”。

八道壕的崔星五，“九·一八”事变他投降了日本，效忠日寇，升为旅长官职。约在一九四〇年前，他退职回家。“八·一五”光复了，在八道壕招引他的旧部下，开始建军。等待国民党中央军的来临，暗中与伪满末任县长勾结，反对八路军。听说黑山县城里，八路军派来了于科长，立刻率领着他的部下六、七十人，乘车由八道壕开往黑山县城。亲自率领着他的部下到县政府与于科长晤面，没说上几句话，崔星五叫他的部下开枪，当场把于科长打死。从此“同志社”的人们，就烟消云散了。人们四方逃走，有的人下乡，有的人进大城市去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八路军向北转移了。黑山县来了一个国民党县长沈百昌，国民党员又出头露面了。马文彪首先要组织县党部。召来他所拉来的党员，连夜开会，进行组织。而孙家昌也不示弱，也召集他的部下，组织县党部。马

文彪说孙家昌是假的，是充牌的国民党。说李光忱是蒋介石直接派来的，是国民党的嫡系，是飞来的接收大员。同时自己领着从辽阳来的王志仑、冯明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拉拢大虎山的赵海杨、半拉门的张鸿勋、无梁殿的张德、姜屯的袁百庸、芳山镇的我，地盘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孙家昌说马文彪是假的，是冒牌的。说罗大愚是地下工作者，多年有功。光复了，不能出头了。一定是辽宁省党部的主任委员，黑山县党部的书记长已经任命了孙家吕，马文彪是白闹扯，早晚要垮台的。开始他们两派都是吹嘘自己，接着是谩骂对方，最后，要动武力。沈百昌一见不好，这真给国民党丢人现眼哪！闹出事来怎能对得起省长徐箴哪！同时也要显出自己的身份来，自己是飞来的大员，是黑山县的一县之长。所以出面调停，说和他们合作。书记长一席以先来者居上，谁的委任书记的日期在前，谁就是书记长。

这时候刘景峦已经在新立屯基础打好了，去黑山县城争夺书记长。沈百昌一看，说："嘿！你两位不用争了。你们看人家来了四、五年了。你们两个人还都年轻啊！把书记长让给刘同志吧！"，这样一来，马文彪和孙百昌就都哑口无言了，认可不争了，这才举行了和解会议。推选了刘景峦为黑山县国民党第一任书记长。刘、马、孙的派系斗争到此就算告一段落。明和暗不和，各揣心腹事，各人还加强各人的势力，挤压别人的地盘。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的四月间，马文彪正式由省党部任命为书记长，刘景峦当了沈阳警察学校的教官，孙家昌全部垮台，才算黑山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了帐。

二、刘景峦的大伸魔手

黑山县国民党的派系斗争，经过沈百昌的调停和解，书记长的交椅，由刘景峦坐下了。在一九四六年×日，召集了县城里的党员会。确定了秘书室、总务科、组训科、社会科、宣传科、警保科。是一室五科的编制。秘书室设两名秘书，是孙家昌、姚智先。总务科长马文彪、副科长张汉滢。下分文书，会计两个组。文书组长汇树滋，会计组长王正（王敏良），组训组长王志全。下分组织、训导两个组。组织组长佟祥格，训导组长宋连甲。社会科长刘××，副科长吴越（朋生）。它的外围设有：妇女促进会，主任委员赵祥符，商工公会主任委员韩希侯，农会临时代理会长杨品之。因为当时全县农村和县城还是处于气息不通的状态中，男中女中分别成立学生自治会。宣传科长冯明，副科长尹丕先，下分普通宣传、特别宣传、文艺三个组。普通宣传组长刘广守，特别宣传组长王韵清，文艺组长李印棠。出刊一本《大动脉》，只出了一次刊就告流产了。警保科长李澍田，下有两个卫士（徐魁、徐××）。县党部内还有一个执行委员会的组织。主任委员当然由刘景峦担任，同时把马、孙两方的主要成员都组织进去。有马文彪、王志全、冯明、刘××、吴明生、孙家昌、姚智先、尹风先、李澍田等人，掌握着黑山县国民党的大权，决定一切政策政令，作为县党部的指挥机构。

县党部下边设有新立屯区党部书记常春贵，八道壕区党部书记赵洗尘，大虎山区党部书记赵海杨，半拉门区党部书记张鸿勋（设在饶阳河），姜屯区党部书记袁百庸，无梁殿

区党部书记张德。

当时马文彪暗中在芳山镇设立一个直属自己的区分部，准备刘景峦和孙家吕垮台，好一手遮天地把新立屯、八道壕两个区党部调换自己的人。

孙家吕在黑山城内叫梁化廷，开了一个世界书局，它是黑山文化服务社的前身。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党羽实力，一方面奠定自己的经济基础。参加这个组织的是梁化廷、刘太珍、杨朝标、孙玉昆、傅景春。这个书局开始发卖一些文具纸张，后来销售一些书籍，学生用的教科书，最后扩展了印刷厂。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由梁化廷主编了一期《学生》杂志。由黑山高中学生投了一些稿子，内容也不够充实，不受青年人的欢迎，出刊一期宣告流产了。

新立屯区党部由王兆一、王荣贵主编了一期《新生》油印的小册子，内容更觉贫乏，没人爱看，送都送不出去。

县党部出的是《大动脉》，是马文彪系统的。新立屯区党部出的《新生》，文化服务社出的《学生》。这三种刊物虽然都是一期停刊，但却暴露了内部派系的尖锐矛盾，互相攻击和国民党的腐朽事实。也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以致一般青年脱离国民党，个人都要求另找新生道路。

三、马文彪的扶正

黑山县党部的书记长由刘景峦担当后，辽宁省党部也象黑山一样。李光忱是飞来的大员，张光慈是爬来的代表。他说他是假的，他说他没得到蒋介石的秘令，互相咒骂。你不叫我挂牌子，我不叫你公开。就这样闹了些日子，后来国民党中央知道了，派来大员钱公来东北调处。李光忱到底当上

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马文彪也当上了黑山县党部书记（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一下子刘景峦得走了，去沈阳警察学校当教官。新立屯区党部只剩下常春贵、赵万荣准备接交。八道壕区党部只有书记赵洗尘一个人，死守区党部，拒抗不交。孙家昌、姚智先、尹奉光、李澍田都离开了县党部，各谋出路去了。梁化廷、刘太珍好在有一个由宋祖培等办的农村合作社，它是以农贷为主体业务的组织，把伪满的兴农合作社的金融部门的旧职员接下来了。他们俩的生活出路暂时安置了。而孙玉昆、傅景春就来文化服务处呆下了，只是作自己的买卖，和县党部的关系是割断了。马文彪上台后，有心重整旗鼓，大捞一把。在县政府召开的全县各乡乡长与绅士联席会上，大肆宣传三民主义。在沈百昌操纵下，按地拨款，每“天”土地三元，作为黑山县党团经费。把全县的贫苦农民刮了一层。同时召开了一个党员训练班，充实区党部实力。在县党部召开了七天学习会，自己亲自出马讲课。又把区党部的人调整一下，命令李香圃、王荣久接新立屯区党部书记，叫常春贵来县党部当组织组长。由于他们俩都在长春法政大学学习过，马文彪是正班生，常春贵在夜校学习，原来有些交往，故此留情，给一个小位置。对八道壕赵洗尘的对待，就大不相同了。马文彪、佟明孔、周尚文去八道壕接区党部书记。赵洗尘抗拒不交，携带钱款、账目文件去黑山找到刘景峦，说：“面交刘景峦，决不交给马文彪。”这时马文彪大发雷霆之怒，令卫士将其送警察局看押。赵洗尘住了三天拘留所，饱尝铁窗风味，倒底输嘴了。只要给他自由，他情愿把钱款、账目、文件交出不管了。

这样才算统一了黑山国民党。接到省党部的指示，开始

国民党员的总登记。它的主要内容：不论国民党的哪个派别，新老党员，愿意继续参加的由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起，开始总登记，不申请登记的，就为脱离了国民党。据估计黑山国民党员约有五百左右人，而进行登记的不足二百人。后来发展的不算在内。就是马文彪的底柱，如王志全、吴鹏生、李印棠、张国典等经过了内部的派系斗争，各人的争权夺位，爱财如命，也都看出了国民党的腐化将亡。实质上是“官迷，一帮官迷，真正的没味！”一些人纷纷四散，离开了县党部。马文彪上台后，挣扎了几天，也就大厦将倾，无能为力了。

马文彪勉强把地县党部改了组，文书组长陈晓楼，会计组长王敏良。组训科长李香圃，下有四个组，把社会科的业务并入组训科，组织组长常春贵，训导组长佟祥格，民运组长宋连甲，妇运组长汤素云。宣传科长刘广守，下分三个组，普通宣传组长李时白，特别宣传组长王韵清，文艺组长刘玉琦，编辑陈镛。执行委员只有刘广守一个人了。

四、县党部成了特别啃娼的聚会场所

马文彪看到了国民党的大势已去，自己也另谋出路。打算回长春法政大学去念书，又打算去沈阳另谋职业。终于在六月中省党部派任公度来黑山接任书记长。任公度在日伪时期在“盛京时报”当过采访员编辑。光复后在张枢领导下办一个“辽阳日报”。这次来黑山带来一个亲信汉奸赵相城。任公度在七月一日正式接任了书记长。他曾坐过狱，自恃资格老，到黑山后，大肆活动。首先县党部添设秘书室。赵相城任秘书兼总务组（原名总务科）长。调统室赵相诚任调统

员。把尹奉先又请回来当调统员，都没有变动。

任公度由于任用了尹奉先就靠近了文化服务社，和刘太珍、梁化廷都打成了一片。党部向文化服务社投资八十万元，做党部的经济基础。开办了印刷厂，包销了全县的教科书。此外还开办一个民众食堂，派王敏良和阚大胖子共同张办这个食堂。任公度和赵相诚就大酒大肉地享受起来。又开办一个黑山剧场，作为党部的宣传机构。派尤向勋在剧场掌握。又伸魔手去大虎山和三青团共同开设青年食堂，作为出门经过大虎山的吃住场所。

任公度到黑山以后，他认为黑山的经费实力在于新立屯。他在九月中，亲自出马去新立屯拉拢王丹忱，遭到王丹忱的白眼相看。又去拉拢张化宣、王殿忠，得到了他们俩的招待，答应他在新立屯秋后开拓经费道路。

任公度把县党部添上调统室以后，和省党部安置在黑山的特派员邸铁铮勾结在一起。经常和县长沈百吕、警察局长洪彦升密谈。他们五个人往来频繁，对外对内部都保守秘密。

任公度把县党部改组以后，把妇女促进会的几个女同志也放在书记室外屋办公，任公度和曹××，赵相诚和郭敏，一个人把着一个，不论黑夜白日公开调戏，昼同坐，夜同寝，去沈阳、回辽阳也共同往返，形影不离，就是不婚的夫妇。任公度八月节后患了肾炎病重，曹××还向我哭诉："这可怎么办哪！他死了我可怎么好哇！我去辽阳人家（指公度的妻处）能容我吗？我若不去，我的肚子可怎么办啊！"一直把任公度弄死了，曹××才离开了县党部。郭敏在十一月也怀了孕，赵相诚领她去沈阳坠胎，一去不返了。

任公度不注意下级的发展，芳山镇屡次要求成立区党

部，尚文杰要求了几次，才答应把原来的区分部升格为区党部。此外，新立屯区党部书记王荣久也申请成立一个贫民诊疗所。

在任公度任内，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也换了石坚，代替了李光忱。黑山县党部也增派了执行委员刘选卿、赵尊谦。他们俩是石坚的底柱。任公度又给赵相诚申请了执行委员，这时候县执行委员就有六个人了。组成县党部执行委员的成员是任公度、赵相诚、刘选卿、赵尊谦、刘广守、尹奉先（他在北大开学时走的）。

五、官迷刘选卿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刘选卿被任命为黑山县党部执行委员。被选后，他就奔走沈阳石坚处，钻营县书记长。他说："石坚已经答应他了，黑山县书记长早晚是他的"。可巧任公度在十二月中病死在黑山。赵相诚代理书记长几天以后，又去沈阳为给郭敏坠胎，一去不返。黑山县的书记长就落在官迷刘选卿手里了。本来石坚他俩有旧关系，石坚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就发了任命状，刘选卿就正式任了书记长。省里又给调来两个执行委员：吴尚民、魏春和。又任命黑山县政府的社会科长夏景林为执行委员。刘选卿根据省方指示，把县党部又改了组。书记长下设有秘书一人，会计员一人，组训组长下有干事二人，宣传组长下有干事三人兼理调练员业务，秘书是我，会计员刘玉琦，组训组长吴尚民。宣传组长魏春和，干事是常春贵、何文儒、陈镛、陈晓楼、曹映长。

党政的尖锐矛盾结果，使刘选卿变了应声虫儿。

这时候执行委员会有刘选卿、刘广守、吴尚民、魏春

和、赵尊谦，夏景林等人组成县执行委员会。夏景林是怎么当上了执行委员的呢？省党部指示：县政府所增设的社会科，科长一席，得由县党部选拔一名执行委员去充任之。但是黑山县政府添置社会科的同时，沈百昌就派了夏景林为社会科长，任公度的意见是叫刘广守去。刘广守一去，沈百昌就给了一个股长，不让这个科长席位。沈百昌又为夏景林奔走省党部，任命执行委员，黑山县党部的人们反对他，都要求县党部再去一个执行委员把夏景林顶掉。但是沈百昌钱大，买动了徐箴的爹，给说了话，终于省党部任命夏景林为黑山县党部执行委员。在刘选卿未任书记长之前，在任公度任内，县政府有一个党政特别小组，他的成员是县长、主任秘书、书记长、三青团主任、三青团书记。在决定某项事务中，因为党团占三个席位，行政占两个，还有发表决定政策的可能性。刘选卿当了书记长，夏景林当了执行委员之后，这就是行政的力量强行打入党部中，党政的矛盾暂时统一了。从此刘选卿的开口发言，举手办事，皆以沈百昌的马首是瞻。他是墙头上的草了。东风西倒，西风东随，一点主观性也发挥不了了，从此党部变成了县政府沈百昌的应声虫。

这年是蒋贼的六旬大庆，刘选卿派人裱糊了几本大型纪念册，派专人下乡，强迫老百姓在册上写诗、写文章签名祝寿。写完了十几本大册子送到省党部。

省党部发下来伪宪法草案，县党部首先派人宣传伪宪法的假自由假民主。

这个时期，刘选卿把黑山区党部恢复了组织。派梁化廷为书记，刘太珍为执行委员。半拉门区党部本年设于饶阳河，书记又是小学校长张鸿勋兼任。由于张鸿勋的转勤，区

党部的工作也陷于停顿。刘选卿又把半拉门的区党部恢复了组织，选姜中玉为书记，穆海泉为执行委员。又着手组织十里、胡家、二道镜子、大营盘等区分部（属于黑山区党部），这样一整顿，黑山县党部下属有八个区党部了。

刘选卿被选为县教育会主任委员后，县里就筹备县参议会，刘选卿被选为县参议员。他当了书记后，开始选举省代表，沈百昌支持他的木偶儿宋祖培，刘选卿也就支持宋祖培，不敢支持李贺山。接着又选国大代表，沈百昌支持王奉瑞，刘选卿也就支持王奉瑞。所有的会议发言，他都看着沈百昌颜色，沈百昌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党部里边用人，也得问一问沈百昌。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被沈百昌驱出党部，常春桂任了秘书，三月常春桂任了县执行委员。这时期，县党部全员出动，到处奔走为王奉瑞竞选国大代表。

一九四七年十月，黑山解放，刘选卿率党部内的几个职员逃往大虎山。在青年食堂内潜藏了两天，回来黑山。适黑山第二次解放，刘选卿逃往关内，黑山县党部到此寿终正寝了。

我所知道的东北军阀张作霖

赵子良

一、张作霖的出身及其一般经历

张作霖，字雨亭，清光绪元年（乙亥）生于黑山北镇两县之间的二道沟子村（现属北镇县）。幼孤贫。父名有禄，早亡，母守孀以纺织度日。作霖十余岁时，曾为邻乡皂君庙屯地主赵家放牲口，颇勤苦，所以地主也很爱他。十八岁时随兽医师学习医术，技术精良，驰名四镇，曾在黑山开过兽医桩子。

光绪二十四年，有清朝旗兵仁字军寿统领，从沈阳赴北京路过中安堡（现属北镇），战马患病不能走，所以行旆暂驻，寻兽医诊疗马病。当时街头兽医铺门关闭，有人介绍张作霖医术精良，统领遂派差招到，作霖乃用针砭术将马治愈，赏以金钱，作霖不受，且说："愿效犬马之劳，随营听用"。统领大悦，擢任作霖充当马医官。作霖返乡辞别老母，随营而去。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起义后，八国联军攻破京津，帝俄当时进兵东北，三省人民尽遭蹂躏，慌恐万分。这个时期，张作霖从天津返回故乡，仍操旧业。有一次胡匪来治马疾，张氏说此马不能治了，胡匪大怒弃马而去，次日马死，胡匪即逼他赔马，经人调处并代垫马价，胡匪始走。次日张氏即向原调人借了枪马，说他们能当胡子我也能当胡子。遂纠集地方草莽四十几人，成立地方团队，称保险团

（实际就是宫胡子）。他们公推张作霖为首领。驻防中安堡镇。该镇有进士李维桢，很支持张作霖，并常用天罡星将领二十八宿的故事，向张作霖讲说，张很感兴趣，虚影领受。当时张还没有成家，由队中孙德山首先代为介绍息君庙赵氏地主家的女儿（赵氏原系张作霖所钦佩的一个人家），又经郑殿甲、郑殿升（与赵家地主是亲属关系）的撮合，把婚事说妥，不久便迎娶过来。

该保安团，驻在中安堡镇。由他们保护，因而四乡安堵，民心稳靖。张氏因全家团圆，颇觉愉快。其母便向作霖谈起往事，母曰："回忆当年，你兄弟分离天涯海角，各居一方。如今人口团圆，全家幸福。我已往曾许过口愿说：如果霖儿平安还乡就许一台戏，以答神佑，不知你是否照办？霖对母很孝顺，立即允从。不多几天他即招集地方财主绅商、商妥演戏。正在关帝庙前开台唱戏的第三天，忽有王怀三之妻（系作霖姨娘）协同霖母去二道沟子马林阁家参加婚礼。就在这晚间九点钟，匪首金寿山率大批股匪包围了作霖的大本营。当时枪声震耳，作霖因寡不敌众困在垓下。没有办法，作霖即手持双短枪突围而出。光头跣足逃命而去。在这三更半夜，霖妻赵氏大喊救命，忽有队中孙秀峰（号大虎）闻声来援，背负赵氏逃出险地，负至中途，遇见一车，遂坐车跑到王家窝卜大地主家安身得救。从此孙秀峰即巡游四方，找张作霖的踪迹，不知张作霖早已逃到姜家屯镇洪辅臣的保险队中去了。

辅臣初见作霖便道："你原任中安堡保险队首领，理应率众力敌，何故只身一人弃甲而逃？有何面目来此希图苟安，你真是无耻少勇，可崩不可留，乃命人推出问斩。"付

守陈义堂见事不好，也不敢阻挡，急于暗中差人请烧锅老板钟成文前来，向辅臣恳求开恩，饶恕作霖一命。洪辅臣又转脸说：“我不过向作霖闹玩笑耳”。因此得以不死，即谢恩而去。以后充任姜屯当炮手。他的部下四十几人，以后也陆续投在陈义堂的队中。张作霖的眷属，住在王家窝卜王大地主家，地主之母待作霖之妻很好，双方结为义母女的关系。以后张的母、妻全家也在姜屯团聚了。张学良就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

洪辅臣粗暴异常，一怒就好杀人，也不问罪行轻重。姜屯有张某两家守一个儿子，一次因些生活小事，洪辅臣立即令人将其推出斩首。他对人一律不讲情理，群众多数怀恨在心，不敢明言，以后终于被部下暗杀了。从这以后，姜家屯镇防守权就归于陈义堂和张作霖二人掌握了。其余如孙秀峰、郑殿升、郑殿甲等亦皆归来。唯孙秀峰因有保全张氏全家有功，所以深受张氏的优遇。当时黑山有这样传说：“老伊乔占北边，洪辅臣地面宽，杀官夺印金寿山”。说明了当时兵匪骚乱的情况。

二、张作霖归顺满清

满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有钦差大臣伊乔统领率兵到辽西新立屯镇，招安辽西一带匪团。张作霖等奔走黑山县联系五大哨长，有（忘姓氏）子新、何显廷、候国桢等，称五大哨。杜泮林（原系满清秀才）与五大哨首领均有联系。张作霖颇崇拜杜泮林，拜为义父，双方关系极为亲密。因此杜又为作霖和五大哨长等去联系了方举人，李秀才、钟成久等财主士绅。给他们作一份降书顺表请求归顺满清。大家公

推张作霖送文交到新立屯镇，拜见伊乔统领。伊乔启表检阅，见这些匪团企求投降，又有地方财主士绅担保签字，便允许了他们的投降。遂依照人数派定官衔。首先加张作霖为营官，镇守黑山县，张作霖从此便归顺了满清。

三、张作霖谋杀匪首——五大哨长

张作霖从匪团转升为清朝的正式营官，可能满足了他的愿望吧！不，他野心很大，决不是一个营官地位即算达到了目的。从表面上看，他好象不忌妒，不藐视穷人，不忘旧，但他的争权夺势升官发财的野心是很大的。到了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新民府（即今新民县）增府尹子固新莅任，听得伊乔统领招安了辽西匪团，便行文催该匪团代表人入府开会。这次文先到镇安县（即黑山县），地主财阀士绅杜泮林、方举人、李秀才等招集匪团首脑三十余名到会讲话，让他们公推代表到新民去，各匪首都心怀猜疑，不敢前去。大士绅杜泮林手指义子张作霖道："吾儿雨亭是否有胆，能不能前赴新民见府台？"作霖答道："应先请别人，如别人不去时，我虽肝脑涂地，也愿学荆卿（即荆轲）只身前往。"士绅们研究了一番，别人都不称职，最后仍公推张作霖为代表，要求带队一百五十人。于是从河东张绪武处调一百人，加上作霖自有人数共一百五十人。当时军纪严正，人马齐全，都是白马红褥套、圈刀大洋炮。先自方举人李秀才乘车前行，全队在后边追随。正当秋季八月，从黑山上午起队，当日进入新民府大街。群众夹道观看。及到府衙，大启仪门，增府尹协同士绅李如柏等与作霖及方举人在大堂会面，双方致礼，款待优厚，部下士卒尽入营防，在衙内会餐完

了，各回寓所，独张作霖捧交投降人员名册一份，经增尹按名检阅，便问作霖道："尔既代表众人投诚，为了地方安清，理当尽忠，投效国家。"作霖再三允诺，并对府尹道："作霖出身兵役，蒙仁字军统领颁赏我六品军功（指兽医官）只知有国，不顾身家，国家如肯用我，我当以身报国。"府尹听作霖语气不凡，不觉心中甚喜。移时府尹退席，作霖回到营内，又向方举人等行了慰问礼。府尹派差给送来肉酒，自面以示优待。从这以后作霖天天不离府尹左右，当时人称虎威将军。据说张作霖曾赠府尹五百锭纹银以后，张作霖从此得势。每年又赠他十万现洋，这是后话。方举人等在新民盘旋月余，看府尹待张作霖很厚，便返回黑山，面报杜泮林，说作霖事无后患，各哨官哨长等闻之亦皆欣喜。后来哨长陈明广、卢永山、徐汉武、侯国桢被许多人控告，说他们除强抢外还有血债多名。黑山县接到诉状，县长吴某到任月余，即将这些呈状尽数上报新民府，府尹当时检查案卷，人命很多，不觉内心焦灼，有一天把作霖召到衙来，乃向作霖现出愁容，时在初秋月色正明，作霖站在府尹身边好久，便向府尹故意地问道："府尹召某，有何事故。"府尹道："黑山有四名盗魁，如陈明广等，血债累累人命关天，有干法纪，应当如何处理？"这两句话连说两次，作霖便向府尹鞠躬道："这样案件既关紧要，何不召陈明广等来府听审。"府尹道："召他等到案，倘有危险，那时怎办？"他便道："作霖从来不惧生死，如将他等召到时发生意外，我愿负全责，为国为民虽死无恨。"府尹采纳其谋，于是就通知黑山四哨长来府会议，各哨长得了府令，即带各哨人马，一齐来到新民市内，各安营寨。其时市内各要

隘咽喉之地，张作霖已令人严密把守，被传的哨长有陈明广、卢永山、徐汉武、侯国祯入衙后，府尹均各赐坐。先由增府尹发言说："尔等哨长既然归顺，理应改邪归正，严守法令为是，为何还要寅夜肆行奸抢，并杀害人命呢？"哨长答复道："有何呈状可凭？"府尹乃把呈令差员拿出，传令各哨官观看。座上侯哨长便道："这些都是黑呈子，请将呈状罪条贴出，纠明谁是原告，不然恐系误捏。"府尹道："尔等胡言，难道还想违法狡辩不成。"即令衙役们"与我绑了！"话音刚落，卢永山即抽出暗藏的手枪向府尹打来。作霖正在府尹身边侍立，用脚将府尹坐椅勾倒，府尹落地，作霖即抽出手枪，还击三弹，立将三名哨长打倒，尸横地上，因徐汉武在卢永山开枪时大呼道："不可，不可，这是父母的官"，这句话救了他自己的命。因为张作霖见他发言合理即未打他，遂把他逮捕入狱，听候处理。大街众匪闻讯乱窜，早被作霖予先安置的人完全缴械了。从此后四境安堵，民众乐业，交通无阻，商工逐渐繁荣，地方才太平起来了。于是府尹具文，呈报到沈阳赵尔巽将军府下，转奏清廷。蒙赐赏作霖四品花翎顶戴，升职统领。委任将下，不意驻防蒙边新立屯的统领伊乔将军，于十月初旬染病而死。作霖得了讣闻，乃前往吊唁，卑礼厚弊，临棺异常哀悼。伊乔统领这时业已准备荐书，保作霖为他后任。文书呈报到沈阳将军办公厅时，赵尔巽已接清廷命令，许可张氏作统领，同时又有伊乔统领的荐书，这真到了张作霖平生官运亨通的日子了。

四、张作霖除掉杜立三

杜立三也是当时"绿林英雄"。在黑山一带为非作歹，

抢夺民财，当时的北京清政府捕他。这个责任又落在张作霖的身上，这是张作霖一件难办的公干。一是杜立三势力很大，二是杜立三也是杜泮林（张的义父）的同家，怎么办呢？张作霖就来到黑山面谒干老杜泮林，述说此事。杜泮林说："事有机缘，山前有路，如此这般。"张便告辞了。杜立三在黑山一带声势浩大，闹的很凶，后来被别的匪首把他缴械了。于是杜立三来到泮林处，泮林说："给你写封信去找张作霖吧！"立三初时不肯去，经泮林力劝他才去了。当时张作霖正在整顿兵马准备出讨蒙匪，忽有人报告杜立三来见，张作霖迎出见礼，请入会议厅。立三从囊中抽出文件一封，递给张作霖，张一见是杜泮林的信，便将立三留下，伪称予以安排，立三辞出就职。张作霖便整顿人马出发了。待张作霖回来时，杜立三已作其刀下之鬼了。这便是杜泮林说的事有机缘，山前有路的本意。也就是官僚地主、土匪互相践踏，狡猾的借刀杀人不见血的手法。但杜泮林闻此恶耗，乃大哭不止，并作祭文以吊之。其文略云："呜呼阁卿，阴鬼有灵，我待你如子，你敬我如翁，借如椿草，义如天伦。我荐你升官享福，脱险席夷，敦礼厚弊，接见东歧。我好比汉家杜保，他好比蜀国张松，殊不料张松无义，万不想我杜保无能。呜呼阁卿，阴鬼有灵，听诉祭文，聆受佛经，真灵超渡，呜呼尚飨！"

五、张作霖讨伐蒙匪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蒙人汉籍苏天锡、苏天满、苏天禄，他们先人给蒙王做劳工，蒙王赐他奴女为妻，成立家庭，故生他兄弟三人，以后又生一女，名唤天姣，年

轻美丽，国色绝伦。蒙王欲收入宫中，苏家不允。又按蒙古僧制，一家不管兄弟几人，只许一人娶妻，余者都要为喇嘛。而苏家昆仲不守僧制，三人皆自结婚，因这两件事，蒙王大怒，欲加罪重惩。苏家兄弟因而谋叛，后来集众为匪达数千人，大肆抢夺，窜扰洮江上游一带，进而包围洮南府，通辽各地人民惶恐万分，告急于奉天（沈阳）。奉天将军赵尔巽无力剿抚，时清帝被八国联军入侵，又不能出兵支援，所以赵尔巽就把张作霖调到奉天，任命为讨匪司令。张氏讨伐蒙匪计划三路进军。一路从沈阳出发，张作霖亲自统领；二路从新民出发，由汤玉麟、张作相统领；三路从黑山出发，由孙占鳌统领。三路大军共约五千余人，浩浩荡荡向洮南洮江一带出发。不久汤玉麟首先迎着了陶什陶（天锡）基本匪团，双方激战三昼夜，苏天锡的马队手握套马竿子，在马上任意逞能，套去了军人不少割头抛地，十分凶恶，因而汤玉麟大败。便又开了军事会议，想出妙计，即先用步兵手持大刀将敌人的马足砍坏，又用锋刃镰刀，见套马竿子就加以割断，于是蒙匪马仆人落，遂用手格杀之，顽敌大受挫折，死者不计其数，正好张、孙两路人马俱到，三下合围，苏天锡大败而逃，蒙匪从此敛迹，洮江一带，从此安定下来，捷报到了奉天，就把张作霖升任为洮辽镇守使。

六、张作霖任洮辽镇守使，及其当时经济情况

张作霖平定蒙匪后，升任了洮辽镇守使。当时尚有残匪三、五成群十数伙，出没无常。张作霖便把全军分驻在县镇，大县驻一营，小县驻一连，均是半步半骑相兼。因此残匪逐渐被消灭了。张作霖便在洮南府内修筑镇守使大衙门，

又在通辽市修建公署，为孙占鳌驻军所在。

匪患肃清后，民心安定农业有了发展。农民前来垦荒者益多。以后陆续成立了垦荒公司、牧养公司、丈放土地局，官膏局（卖大烟的）、禁烟所、税务局及银行等机关，还有私人经济借贷庄。当时金融很紊乱，商号也乱发纸币，充斥市面。资本家也在这里开垦荒地，大者达数千亩，也多数成为大地主，特别是以张作霖为首的私田，有五千余垧。他的所属官吏也是上行下效，都拥有很多熟田。而一般贫苦农民是无力开荒的，只有作地主的雇佣，牛马一般给他们劳动，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

锦州大军阀张作相的发家史

高坦　整理

一、家庭出身

张作相生于清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死于一九四九年,时六十九岁。先世务农,原是河北省保定府深州张家庄人。在乾隆五十七年,因家贫又遭旱灾,逃荒关外,到锦县杂木林子居住。先给地主家扛活,后来自己有点土地,自己耕种,可以维持一家生活,因而便在杂木林子落户,到张作相已经六世了。张作相的父亲弟兄三人,他父亲永安居长,二叔永宏,三叔永年,都是农民出身。他父亲在中年以后,改业赶驴驮子,来往锦州热河一带。他三叔在中年后,改业作瓦匠,手艺很好,常常进锦州城给大户人家干活,修盖房屋或做零星修补等活,很得利。张作相在小时就不愿作农民,因为看农民很苦,一年到头没有闲时,而吃的穿的又都不太好,把这个意思曾对他三叔说过。他三叔因此教他学瓦匠,并带他到锦州做活,那时他才十几岁。因做瓦工来往锦州日子长了,看见当时锦州城内,有些富豪官宦人家,生活非常奢侈,使奴唤婢,骑马坐轿很享福。因而心中羡慕,曾对他三叔说过:象我们作瓦匠的什么时候才能作大官发大财呢?他三叔回答说:"我们不能作当官发财的梦,只有守本分,好好耍手艺,混个衣食不缺,再养活几口人,旁的谈不到,也不必胡思乱想耽误做活",以后还屡次劝过他。

二、两次为匪

张作相在二十岁左右，便不愿做瓦匠了。开始随着旁人往热河省朝阳一带去当土匪。当时正是清代末年，清政府腐化昏暗，已经无力维持地方治安，各处胡匪蜂起。小者路劫，较大者强抢（俗称明火的），再大的绑人勒赎（俗称绑票的）。张作相初往朝阳时，是随人做路劫的土匪（俗称劫道的）。当时他父亲得到消息，到城内问他三叔说："作相是否还在城作活"？他父亲说听到他为匪的消息，兄弟二人很不同意，但是在朝阳找到张作相时，看他已经骑马背枪了。二人强迫他回家。当时他祖父还活着，也不愿他为匪，训诫一番，怕他再走，不叫他进城。在家不到一年，朝阳有许多和他同伙的土匪屡次去找他，他几次想去，家中阻拦不能走，在家又呆不住，遂和他父亲商议，有一个同乡人王某，在沈阳将军署当门房（即今日之传达）和他家有旧交，因此想到沈阳找这人谋点事做。他父亲怕他言不由衷，借机逃走，仍不同意他去，也不给路费，他没法终于偷了家中一点钱，私自逃走了。到沈阳找到了王某，不料见面时，王某一口回绝，表示什么忙也不能帮，于是大失所望，想回家，而腰中又无路费，只得在皇姑屯做小工。给一家木厂运杉松杆子，由皇姑屯扛到车站，做了几天，肩头都压肿了，得了些钱，又回到家乡杂木林子。有一天，同族兄张作政到锦州城北板石沟讨债，过郭家园吃瓜，作政因瓜不甜，给扔到地下，瓜园的老太太说："你们不可这样糟践东西。"作政说："我们给你钱，又有什么关系！"老太太说："你们给钱也不应该这样"。二人口角起来，张作政打了那个老太太。其子

绰号郭暴断，也是常在外边游荡的人，闻声赶到，用枪将张作政当场打死。又要打张作相，幸亏旁边有人推他一把说，“张作政打你妈与他何干”！张作相才得逃回家中。但气愤不平，时时打算给张作政报仇。因此结合二十多人，有的人有枪有马，但不全有。先到锦县右卫屯投效管带(营长)苑连发。苑当时在右卫屯一带保险，独霸一方，声势很大，苑部下有冯镇西者，是张作相的同乡，而且和张家还有交情，见张作相等来了，先安置在厢房，自己在正房，与苑连发商议，苑不肯收留，还大声说："这些贼小子我不要"等语。作相等人在厢房都听见了，遂气愤而走。这时恰巧有人发现，他的仇人郭暴断在苑连发部下当兵。于是大家在树林中计议。当天晚间，设计将郭暴断骗出来，打死在右卫屯村外，给张作政报了仇。以后张作相便领着这二十多人正式为匪。因人数不多，没有固定地盘，只好到处窜扰，路劫，强抢或到偏僻的农村里捐大户，到哪里吃哪里。

三、绿林生活

张作相在做督军时曾对人说，他们为匪不久，大约不到一年，就经过了一次大险。就是因为争夺抢劫目标，在锦县北部一个农村中，和一大伙土匪发生冲突，双方开火，因寡不敌众，张作相等退到一个有几十颗柳树的大坟地里，四面被对方围攻，三天三夜不得解围。对方在外，能换着吃饭，张作相等在坟地内，三天没吃喝，眼睛都饿花了，眼看着外面要打进来，不知何故对方突然全部撤走，扬尘而去。张作相等人才敢出坟地。听村中人说，对方是听到官兵要来的消息才撤走的，张作相等才脱险。他以后常说："这是他生

平经过的第一大危险。张作相为土匪时，曾在锦县北部廖家屯一带出没，与当地大地主陈家有交情，时常与陈家来往。陈家家主，是前清举人，在地方很有威望，官兵与胡匪，到陈家都得讲交情，不敢搅扰。陈举人对张作相很赏识，张作相也以此为荣。张作相在由师长升任吉林督军时，大家给他贺喜，他说："喜是喜，但是我现在升督军这个喜，远不如我年轻为匪时，陈举人曾经送给我一身趟绒衣服那个欢喜大。"

四、投张作霖与降清

张作相做小股土匪约五年左右，才遇见张作霖。因为躲避官兵的追击，跑到黑山县桑林子投奔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在该处保险，张景惠也是其部下。二人相见时，张作相说明，慕名来投之意，二人谈得很投机。张作霖说："我名张作霖，你名张作相，你我如同兄弟，可常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遂把二十几人全部收留。二人相处很好，日见亲密，真如亲兄弟一般，成为张作霖部下中的底垫人物。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〇年）张作霖在新民府向清朝府尹增韫（字子固）投降，张作相也随着张作霖出匪而变为官了。当时张作霖被编为三营统领，张作相编为右哨哨官，孙烈臣、张景惠等都作帮带。张作霖在投降后，屡次立功，如杀黑山五大匪首（五大哨长），杀杜立山、金寿山等事件中，张作相皆身与其事，出了很大力量，张作霖依为股肱。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蒙人陶什陶聚众数千反抗蒙王，在洮南通辽一带，大肆抢夺窜扰。盛京将军赵尔巽不能制，乃调张作霖为讨匪司令，从事讨伐。张作霖分三路进军。第二路

军由新民出发，就是张作相与汤玉麟统领。初接战时，蒙人非常强悍，路径又熟，出没无长，有时冷不及防，突然相逢，用套马杆子套人而杀，很不易打。开会商议对策时，张作相主张，用步马二军混合前进，均备锋利短刀，步兵用刀砍马腿，马兵用刀割套马杆子上的绳套，蒙人大败，从此潜踪。张作霖得胜还师，升任洮辽镇守史。在洮南修建镇守使衙门，驻军洮南，张作相也随往洮南。后来赵尔巽为了抵抗在沈阳的革命党人兰天蔚、张荣等，又将张作霖从洮南召到沈阳，张作相和汤玉麟都同来，终于杀害了张荣，驱走了兰天蔚等。

五、成为大军阀的经过

辛亥革命后，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先做炮兵二十七团团长，后升五十四旅旅长，驻军沈阳，这就是张作霖的主要兵力。其时奉天省还有二十八师，师长冯麟阁，驻军北镇，权势与张作霖不分上下，同属奉天将军段芝贵部下。张作霖利用冯麟阁、汤玉麟等撵走了段芝贵，谋得了奉天将军的地位。后来又改称为奉天督军兼东三省巡阅使等职。这时张作相也进了一步，继任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师长。从此更不遗余力的帮助张作霖扩充兵力，收揽政权，筹办粮饷，把与张作霖争权的冯麟阁挤下台去，并把冯的部下汲金纯等收揽过来，到处招收土匪，编成师旅，同时与日本联络，借外债，购军火等事，把东北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变为张氏王朝，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所谓“奉军”。张作相任师长职务外，曾身兼巡阅使署总参议，东三省剿匪总司令，卫队旅长等数职。第二次直奉战后，又升任吉林督军，

十数年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仅次于张作霖的一个大军阀。

六、修建大营和修建府第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一次直奉战，奉军失败，兵力损失很大，由于这次失败张作霖才知道胡子队是不能正式作战的（当时张氏部下官兵，多是土匪出身，东北人称之曰“胡子队”）。因与张作相等人商议，军队必须采取办法加紧训练，张作相到锦州修建北大营，就是办法中之一。北大营建于锦州市东北的金家屯，内有营房两千多间。外围高墙，中有士兵营房，军官宿舍，讲堂操场，射击场等。其中主要训练的是骑兵、步兵、炮兵、有许多教官。对士兵施以很严的军事技术训练。据说张作霖本意是修在新民，为张作相力争，才修在锦州。至于张作相力争之故，即是为他已在锦州落户，借此机会，一方面修建大营，一方面可以营求私产。他在修营同时，在锦州城西约九里路的小岭子屯，修了一所住宅，占地四、五垧左右。盖房屋五层，三百多间。客厅、内室、花园、走廊等应有尽有，非常华美。并在门前开道直通东西二面，两旁栽树。更置买良田三千多垧。他修大营据说用了一千五百万元左右，是连同他自己盖房买地在内的。只是张作霖不知道而已。当时锦州无人不知道，有的还啧啧称道，非常羡慕地说：“纱帽底下无穷汉，人要当大官，什么都有了！”又有人说：“人要有胆量，最好是当胡子，你看，张作相要不当胡子，那有今天。”等等的说法，众口相传。住宅落成之日，大开贺宴，招请锦州全城官僚士绅，还有许多人给送去贺礼和木匾、对联等物，极尽歌功颂

德之能事。前清进士佟文政（字焕章）有一联曰：

佳构邑西南　轮奂华居昌五世。

元勋国东北　崇隆威望冠千军。

有人解释给张作相听，张作相大喜，因拜佟文政为老师，亲到佟家送礼拜师。以后提起佟文政，都叫佟老师，而佟文政也很以此为荣。他修建这个宅子时，曾对他妹夫刘丰年说："这个房子留着我养老。"其意是将来有不做事的时候，或者东北政权有什么变化下台的时候，好回锦州享福。当时锦州有人把他这个宅子比做是董卓的"湄坞"，其实这个住宅修成后，他自已住的日子不多，只是供他父亲在家享受而已。而他父亲为人很坏，借他的势力，欺压闾里，鱼肉人民，锦州一带人民受害极深，人人切齿。

七、领兵驻锦时的军风纪

北大营修成后，张作相率领二十七师驻锦州，意在聚集训练以图再举。当时军纪极坏，管伙食的军人，进城买蔬菜、柴草、用具等物非常蛮横，经常少给钱。每逢星期假日，士兵满街上小馆、看戏、吃茶、听书、买零食、坐车等都绝大多数不给钱。军官在连长以上的都在城内安家、纳妾、设赌、走私，花天酒地，与地方官吏勾结，与地痞流氓等狼狈为奸，欺压人民，过腐朽生活。地方上有人不平或身受其害的人，都纷纷向张作相呈控其官兵不法行为，但全不见答复，莫名其妙。后来张作相左右的人们出来传说，张作相不以那些坏事为非，他曾说："军人卖命，又很穷，用点东西不给钱或者白看看戏，白坐坐车，算个什么？这也值得他们大惊小怪的来告，这些老百姓真不知好歹！"

有的军人与做假钞票的勾结，到商店买东西强使假票了，被商人扭住送到商会，商会不敢处理，请示北大营师部。又有军人在妓馆打架，伤了人，被警察带到公安局，公安局也得请示军方，结果都是军方来个军官说，"师长命令带回大营，按军法严加处理，然后将犯人带走。据伺候张作相的人如马弁、卫兵等传出话来说："这些人回营，只是挨一次申斥而已，传话人有的还告诉告发人，应当躲几天，以防这些人出来寻仇报复。诸如此类的事多不胜数，所以后来也没人敢告了。张作相所率军队风纪之坏，使锦州地方的经济、治安等方面受害很大，直到民国十三年，二次直奉战起，张作相带队参加前防战事，锦州人民才暂时喘了一口气。

八、士兵口头品评

二次直奉战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由九月中旬起到十一月初止，约五十天左右。这次战争奉军发动了全部力量，分六路进兵，张作相与裴春生在一起为第三路。此时奉军中派系已经形成，可分四派，但总的还是不外新老两派。张作相、汤玉麟等绿林出身的老派。杨宇霆、常荫槐、郭松龄等由军事学校出身的是新派。两派平日互相猜忌、轻视，有事时则互相倾轧，战时尤甚。张作相与裴春生唯恐新派人物在这次战中立功，曾用种种手段压制阻碍郭松龄，造成了郭松龄反奉的原因之一。但这次战争奉军的得胜，不是从军事力量上得来的，主要原因就是用巨款买动冯玉祥，使之倒戈入京，囚禁曹锟，致使吴佩孚军一败涂地。奉军这次的胜利，既非老派力量，也不是新派力量，只是袁世凯（现大

洋）的力量。所以在战后两派仍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而张作霖总是偏袒老派人，因此在二次直奉战后，张作相因功升任吉林省督军驻吉林省会永吉。其实他在这次战争里也没什么功劳，他不仅在这两次奉直战里无功可言，据随他多年的人说："他一生没打过大胜仗，也没立过什么大功，只是没打过多大的败仗，没被缴过械而已。他的发达主要是老帅（指张作霖）信任他。当时奉军里流传一套口号就是："张作相是福将、吴俊升是猛将、汲金纯是败将"。其意是说，汲金纯一生净打败仗，丢盔卸甲。吴俊升一勇之夫毫无谋料，外号"狗熊"。张作相庸碌无能，全凭好运。当东北军中的老行伍兵士，多看不起这三个人，所以流传这套口号，尤其对吴张二人似褒实贬，说得很滑稽，听着象好话，实在是骂这两个人。

九、督吉时的政事与家教

张作相由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作吉林省督军，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在这段时期他居住吉林省会永吉，并时常来往沈阳，在沈阳下洼子设有公馆。当时吉林省和永吉本地受害很大。主要是经济紊乱，盗匪满地，人民生活极不安定。娼妓、赌博、鸦片、吗啡等普遍流行，到处毒害百姓。地痞、恶棍、流氓等坏人太多，并与军、警、官吏相勾结，欺压人民，暗无天日。如：永吉设有永衡官银号，为吉林省掌握经济大权的唯一机关，发行一种纸币，名曰"官帖"，起初尚好，后来逐渐滥印多发，又不兑现，日趋贬值。官僚大商乘机勾结，先得行情秘报，大发其财，而劳动人民所受的损失不堪设想。私烟馆贩卖吗啡的到处皆是，比

茶馆还多。小型的是家眷铺，一两间小房，地上设桌，炕上置枕，门前贴红纸一块，上写“开灯方便，走泡加大”，这些烟馆吸也可，买烟泡也可，外加卖吗啡。大型烟馆玻璃门窗，金字招牌，有官座、雅座，男女招待。各室内云烟满眼、烟味扑人。卖零食的小贩，持筐提篮，卖唱的歌女抱琴托鼓出入其间，似穿花蝴蝶。这些大小烟馆，都是民国十三年，张作相督吉以后，为了多收捐税才许可设立的。至于赌局、妓院、暗娼等更多不胜数，此外还有各种现象，不必枚举可见当时的黑暗。

1、他的子弟和家属们多数生活腐化，对人蛮横无理，每天出外招摇生事，欺压人民打骂群众，事例不可枚举。如他的次子张廷枢绰号“二埋汰”向来出门坐人力车不给钱，而且坐上车就讲跑，也不告诉向何处去。车夫必须拉起就跑，等跑一程之后，他才告诉向何方去。有的车夫不知他的脾气，拉起时先问“上哪里去”？他立时就踢几脚。有的车夫在他下车时要钱，他也用脚踢。当时永吉拉车的，往往都指着他起誓，如说：“我若亏心，叫我明天一出门就遇见‘二埋汰’”。他的大儿子张廷兰，曾在旧历正月十五灯节晚上逛灯的时候，抢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的娘家向督军署递呈子，参谋长熙洽接到后，立见张作相说：“这事要赶快解决，太不成话了。”而张作相半晌无言，熙洽再三追问，张才说：“他妈的不好办。”原因是张作相怕他大老婆，因此不敢管他的儿子。后来由于熙洽屡次催促说：“此事关系很大，太不名誉了，万一人家告到沈阳，将如之何？”并面见他的大老婆说明厉害，照这样闹下去，督军将怎样在吉林作官等语。最后由他的大老婆勒令儿子，将那个姑娘放回了事，但

已留了十六天了。又如他侄张廷选，借他的势力在永吉顺城街明设赌局，每天有数百人公然出入，地方青年很受毒害，对治安也有很大影响。有时赌徒来的较少，常有局中的腿子站在门口，大声呼唤："这是少帅的局，少帅的钱象江水一样的多，押上多少赔你多少，就怕你们没胆量不敢押，你们来吧！"

2、他的部下师、旅、团、营长等军官，有许多人也设赌抽头、贩运毒品或放高利贷，甚至有的还贩卖人口，谋取厚利。如锦州北关人关魁一，就曾在他部下当过团长，常常来往锦、沈、京、津一带贩卖人口，大发其财。至于军队风纪更是一塌糊涂，坏到极处，老年人现在提起来还痛心疾首。据说当时吉林人对"军人"畏若蛇蝎。小孩闹了，或夜间不睡觉，大人就会说："大兵来了。"而张作相对其官兵犯法，从不注意，始终和在锦州时一样。

3、张作相一生最好任用私人，因此他作吉林督军，他的家族亲眷等辗转拉扯，都到吉林找事作，卑辞厚币，竞援奔走。这些人又多半是媚上欺下，贪财无品之人，上从厅长、县长下至所长、巡官以及税务、公安、行政、司法等各部门，皆有此等人充斥其间，招权纳贿，残虐人民无所不至。而贪污所得，都拿出一部分奉敬张家。因此这些官吏虽然不法，却都做的很稳，人民控诉毫无效果。

十、与张作霖的父子关系

张作相一生很得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也很能采纳他的意见。原因是张作霖为人虽久经风尘，而性格始终粗暴，遇事有时过于鲁莽，而张作相性格正好与之相反，遇事能仔细

考虑，两人正好截长补短，相辅相成。而张作相又是老派人，与张作霖由绿林结交的，与新派人物不同。张作霖对新人物如杨宇霆等，不论如何信任，总有不放心的地方，而对张作相则是一点怀疑也没有的。如民国初年袁世凯搞帝制时，张作霖初时因鉴于张勋复辟的失败，心意不决，是否拥护？拿不定主意。当时曾召集部下要人秘密会议，其中有少数人认为应守中立，有多数人认为应当拥护，张作相即是主张拥护的人。张作霖终于同意了这个办法，加入拥护洪宪之流。又如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与吴俊升意思是凡郭军的军官，校官以上的都枪毙，而张作相则不以为然，和作霖争论很久，主要理由就是东北需要人才，若将这些军官都处死，一时恐怕训练不出这些人才来，万一有战争，将如之何？后来张作霖到底依照了他的意见。因此有人说："张作相为人性格忠厚宽大，心计比较远。他对部下官兵也是如此，从不疾言厉色大声斥责，好象很宽大似的，而实际对部下不好提拔（除非有私人关系的），对士兵生活也不太重视，教育更谈不到。

张作相一生最忠于张作霖，毫无二心。不但对张作霖，对张学良也如此。当时东北一般老派军官，多看不起张学良，认为是毛孩子，花花公子，不能成大事。而张作相则从来没有这样说法，心中也是一心一意的拥护张学良的。张作霖被炸身死时，遗命让他接任总司令，由张作霖的五太太亲身送印匣到他的下洼子公馆，请他到署接事，他坚决不肯，一定拥护张学良继承父业。因此张学良后来也很信任他。在谋杀杨、常以前，曾和他秘密商议过。

东北易帜与蒋介石合作后，张学良做付司令，经常在京

津一带居留，名曰办事，其实追求个人享受，沉迷忘返。张作相遂经常留在沈阳，主持一切事务，张学良恃为心腹。

十一、"九·一八"前后的动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约在二三月时，张作相的父亲张永安死于锦州。张作相回家大办丧事，停灵两个多月，接受各方面人的吊唁财物很多。据当时的杂役许某说："钱是不知道数目，仅帐子一物，就接了九千多轴。重要人物送的挂在灵棚，可以全部露出，一般的挂在外面客棚，是一个压一个，仅仅露出送者的名子。还有的根本没处挂，登账后库里就收起来。每个短的七尺，长的丈二，面宽三尺左右。都是青、兰、黑等素色绸缎做成。每个最低价格亦值当时大洋十元上下。当时锦州米价每斗五角，一轴帐子最少也可值米两石之数。这九千轴帐子按小价也值一万八千石好米。至于接的奠仪（钱）可以想见更不能少"。又有人说："在丧事中每天均有牌九、麻将局四五彩，张作相的三老婆专派两人抽红，到丧事结束时，共抽出三万多元"。张作相在父丧之后，因为处理财物，住在锦州小岭子家中，一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当时张学良正在北京纸醉金迷纵情声色，因之沈阳空虚，军政方面大事无人作主。有关人飞电两方（北京、锦州）一时也不得要领，日寇如入无人之境。

张作相一生虽然善于算计，似乎有些谋略，仅是效忠张氏父子与军阀们勾心斗角，压迫人民是绰绰有余，若是猝遭大变，对于外寇的入侵，则是束手无策。紧接着吉林省督军署参谋长熙洽也来急电，电文大意是："日军已近吉林边

境，如何处理？”张作相回电：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其实就是“不抵抗”三个字的办法。他的心里很明白，日寇进东北，锦州在所难保，赶紧收拾家中细软财物款项，携带家眷一直逃往天津。他在天津早就置有楼房和很多财产，自己觉得还可和一家人维持高贵生活，至于东北国土的存亡，早已置诸脑后了。

“九·一八”以后，东北人在京津一带的各方面人士，如军官、学生、工人、职员等都呼吁抗日，一时形成高潮。张学良也被形势所迫，屡次接见学生和有关人士发表自己的意见作正式讲话等等。而张作相从来没有什么表示，虽有人在当时也看见他时常面带忧色，但不是忧国忧民，而是怀恋他在东北的家产。

朱庆澜（字子樵）曾组织救国后援会，聘请张作相为名誉会长，以号召东北人。他固辞不受，经再三劝请，只应许作个委员（当时有委员二十多人，旧军政大员居多），但是他未出席过一次会议，直到后来这会结束，他未尽过一点力量未出去一文钱。朱庆澜为这事对他很不满，曾在一次宴会上和持松和尚大声说过：“张作相太不关心东北了”！其实还不止如此。

十二、和敌伪勾结

东北沦陷后，伪满政府把张作相在吉林省和沈阳、锦州等处的土地、房屋全部收归国有，定名叫“逆产”。如锦州城西一带他的土地很多，边界上都有石桩子，上刻“福厚堂”字样。福厚堂是他家的堂名。在伪满时锦州城西大洼屯修小学堂，利用这些石桩子做条石铺道。因为当

时伪满“逆产”另有标志，这些旧石桩子都拔扔了，村民修工的人都说：“这是老张家的石桩子，上面还刻着福厚堂呢？老张家真是福厚德薄。”然后大家哄笑，意思是张作相在锦州没做过好事，应该得如此下场。他的住宅在伪满康德四年改作飞机场，国民党时沿用，解放后又扩展些面积还作飞机场，直到现在。张作相家在锦州开设的商号很多，如粮栈、油坊、烧锅、客栈、银号、杂货店等。“九•一八”后一律停业办理善后。但是那时由东北向天津汇款是很受限制的，少数还可，多数更麻烦。因此张家生意停止后算下钱，他的管事人无法给他汇往天津。还有许多欠他家高利贷的人，见他家势权已去，也不肯好好还了。那时张景惠正当伪满的国务总理大臣，与张作相是旧交。张作相派他一个内弟（是哪个老婆的弟弟不详）在伪康德八年十月到长春面见张景惠，恳求帮忙。张景惠说：“现在关内关外是两国，钱款来往的制度很严，不好想法，除非辅臣（张作相字）回到满州国来做事，不但这个事不成问题，连在东北所有的财产都可发还”。张作相听到后，向他内弟说：“他做汉奸，还扯我做什么？”但心里确实是摇摇欲动的。经过三四天的考虑，终于决定返回东北，以收回自己财产。在计划决定后，曾给锦州市老友刘葵忱来一封信，因为当时刘正替他收债，对债户许可借十还六即可了事（俗名六成收账）。当时欠他钱较多的朱紫贵（锦州士绅）、王在邦（士绅、曾做锦西县长）等人，债额都是数以万计银洋。正在商议之中，债户还给五成，忽接张作相来信说：“六成收债之事不要进行，我打算最近回锦州自己办理，将来不但十还六不行，就是欠十还十还要照付利息，叫他们等着吧，不要当我

在东北的力量一败涂地了！”根据这封信就可看出他已经决意投敌回东北了。

伪满康德九年夏季约六、七月间，张作相带领两个随从，一个翻译（中国会说日语的），一个老婆（他是一妻六妾，这个不知是第几名，但据看见的人说年纪只有二十上下）来到长春，先见张景惠，张景惠盛宴招待，握手言欢，互道阔契之怀，又隔三、四日，张景惠和有关的日寇商议好了，领张作相见伪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礼，在场的人有张景惠、张海鹏、熙洽和几个日寇等。当时的盛京时报曾在第一版上用大字登载张作相到新京（长春）的消息，还有张作相在长春车站下车时的照片(便服立象)。文字里有“多年飘泊，今日归来”的词句，如同欢迎在国外的侨民返回祖国的口气。见溥仪后又到锦州省视父墓（其实他父亲的坟在“九·一八”的次年就被一群农民在白日间公开的掘了，以后由他家管事人吴某重埋的。），他父墓地在锦州市北帽儿山，距市十几里。省墓后回锦州市，当时伪锦州省长王瑞华也设宴招待，席上有锦州士绅刘葵忱、庞仙芝、张奉璋、马步云等人作陪。在锦州居住一月有余，与他的管事人王某、周某见面多次，指示对回收财产和追索旧债的种种方法，而后回天津去了。但后来因为和张景惠屡次函商回东北后地位问题，迟迟不决，其中似有许多问题，因而未等他再回东北就已经光复了。又据有人说：张作相有十几个儿子和十几个女儿，在当时对他回东北的看法很不一致，其中有的人就看到伪满不见得长久，现在投入将来怎办？还是不去的好。因之张作相先虽决定后来又反复，这也是一个原因。以后派两个律师到东北讨索债务，一是天津律师唐宝谔，一是日本律师大木干

一，大约按八、九成索去部分旧债。

十三、国民党时期一个再起的传说

东北光复后，张作相曾屡次图谋东山再起，衣锦回乡。陈诚已经有心用他。在一九四八年夏季，锦州盛传一个消息说：蒋介石已任命张作相做政委（政务委员简称）回东北办事，意在收拢东北民心。当时有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不是一声冷笑，就是嗤之以鼻。原因就是东北人民对旧军阀都抱有深仇大恨，本来是冤家对头，尤其是锦州一带人对张作相仇恨更深，要想用他收拢人心，简直和火上浇油一样，人民的心更散了。蒋匪做事糊涂颠倒于此可见。但因不久东北和全国相继解放，此说不管是虚是实，总之是未能实现，枉费心机，终成泡影。

十四、平日的为人

张作相一生为人有心计，料事较远，喜怒不形于色，对人外貌和蔼似乎没有架子，而心里猜疑最多不肯轻易信人，同情心很薄，对部下官兵不太体恤，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不关心。民国十七年，锦州七、八两区闹水灾非常严重，地方筹办救济，曾派官绅两界代表解麟轩、刘梦九等四人到吉林求见张作相。三次到署才得见面，本望他关心家乡，定能出些财物或在吉林省帮助募捐，不想见面时先问："你们做什么来了？"代表们说："因锦州水灾来求大帅帮助"。他又说："什么地方？县城冲了没有？代表说："七、八两区距城尚远。"因接着说许多灾情，他听后冷淡的说："你们不在当地想法救济，大老远的找我作什么？以后关于这样地方

小事不必来找我，没有别的事咱们再见吧。”言罢回身而去，把这几个代表扔在客厅里，由付官送客，代表们扫兴而回。

张作相在吉林曾纳一妾，是永吉附近乡下人，已经和一家订了婚，而且和她的未婚夫感情很好。因进城逛庙，被张作相看见，看这女子姿色好，派人强买了来，给他家两千元现洋，让他家向男家退婚，然后接入公馆。这个女的未婚夫是个青年农民，面貌长得也很好，在一年之后竟然想方设法进来当上了督军署的卫兵，常常出入内宅。有一天和那女子说话，被张作相偶然看见，女子说是她表哥。张作相心中已经明白八九，但不露声色，反而很客气，握着那个卫兵的手说：“好！咱们还是亲戚，你好好做事，我一定提拔你。”那个卫兵很欢喜，以为不但未露马脚还对他很好。可是不出一个月，张作相派这个卫兵到外县去出差，在路上突然被人在暗中用枪打死还把枪马劫去，同事人们都以为是遇见土匪，又因这个卫兵平日和大家很好，因之有许多卫兵们都很惋惜，在送灵回家时还凑了些钱给他家。这事过后不到半月，张作相有一个晚间在那妾的房中喝绍兴酒，外面忽闻室内枪响，卫兵和家人们急忙闯入，看见那女子死卧血泊之中。张作相对众人说，手枪走火，不幸打死了她，言毕大哭，看样子很伤感，大家劝解，草草埋葬了事。那个卫兵生前曾和一个姓郝的卫兵互换一块手表。那姓郝的约在三个月后，偶然在酒馆里看见一个督军署骑兵小队里的一个骑兵，带着一块手表，就是他以前换与那个死去卫兵的，询问来源，言语支吾，他才明白，那个卫兵不是遇匪而是有人指使那个骑兵埋伏半路打死的。因此推想那个女子也未必是因手

枪走火而死，只是不敢明言，后来这个姓郝的卫兵，因事被开除，回锦州做小贩才偶然说出来的。从这样事件中，可见张作相的为人是毒辣的。

张作相一生嗜财，到处置买土地房户、开设商号、放高利贷不遗余力。至于他的家属子弟们在外胡作非为，勾通土匪，招权纳贿，勒索敲诈，设赌贩毒等行为，他从来装作不知掩耳盗铃。

十五、最后的下场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张作相死在天津。这个出身绿林历经晚清、北洋、伪满、国民党四个时期的大军阀，在亲眼看到解放之后与人民告辞化为异物矣。

对于张作相的死，一般人都说是心脏病而死，但是还有另一个传说：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后一个夜晚，张作相居住的地方居民组召集本组各户开会，要求户主亲自参加，而张作相家派了一个人去。在开会前主持会场的人发觉这个人不但不是户主而且还不姓张，原来是张家的一个佣人，当时叫他回去换户主前来开会。后张作相居然亲身去了，但是主持会场的人认为由于他耽误了时间很不满意，将他当众批评了一顿。有这样的话："你不要还当是你当督军的时候，你要明白点，现在解放了！"他当时闭口无言，但在散会后归家就寝时暗中吞金自杀，等到家中人发觉，已不可救。

十六、附　　记

这篇稿件是我走访了几位和张作相有关系的人，再加上我过去所知道的事情回忆写成。走访的人有张作相的族弟、

族侄、亲戚、佣人和曾经替他做买卖的商人等。这些人有的从民国初年跟他当差直到“九·一八”事变。有的是他的佣工，由吉林到天津直到他死。这些人的谈话是这篇稿的主要来源。还有些事实是我在写稿前无意中听人说的，现在那些人已经没有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却保存着这些材料。如张作相修北大营和驻军锦州的情况，这是以前老商人王仲三、周贵廷说的。“九·一八”前后张作相的行动，是前锦州市政协委员刘棨忱说的。在吉林的情况是吉林省永吉有几个人说的。“九·一八”后张作相回东北情况是伪满锦州省省长王瑞华说的。还有些零星材料不一一列举了。

以访问所得的材料为主，以我回忆的材料为辅，经过一番初步的互相印证，去伪存真写成这篇稿件。因为涉及张作相的一生，可能脱漏的极多，而且写出来的也恐怕不尽翔实，望各方面人士知道详情者给予补充或订正，是深切盼望的。

锦州军阀汲金纯罪行片断

刘梦九　高问樵

一、把持地方行政

奉军第二十八师五十六旅旅长汲金纯奉张作霖之命，率领他的部下来驻锦州（县）。当他到达锦州那一天（时间约在民国四年），县知事项惠丰（字贺年）即奉张作霖急电调赴省城。地方机关首领和士绅等，大家以为新到的二十八师，向来不守军纪，随便扰乱，心中非常惶恐。而项监督又突然赴省，地方上主事无人，万一出一点特别事情，没人负责，所以群众很感不安。于是各机关首领和地方绅士齐集东街财神庙内议会大厅商讨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情况不明，讨论不出结果来。究竟项监督因为什么在军队到后就上省去了呢？这时有一位士绅崇佩山说："我听一个消息，项监督调省去把他撤职了，另调以前曾作彰武县知事的王文藻前来，这是汲旅长在省城时向大帅（张作霖）要求的。他为什么这样要求呢？因为王知事与汲旅长有深厚的交谊，他藉着县知事与旅部两方面合手好办事，免起纠纷这个理由，向大帅要求。张大帅本不十分愿意，但奈于情面勉强答应"。这时大家听到这个说法都认为县署和旅部都是一面，王知事处处仰仗军方，将来地方上有事情，就不好办了。尤其对王文藻这个人素来就知道，他在彰武做县知事时，当时汲金纯正在该处驻防，与他互相勾结，向商民加捐加税，二人平分，地方

人敢怒不敢言。后来又做过奉天省西路清丈局长，在锦州城内北街设局办公。也依仗汲的势力，大肆贪污。此时因清丈局撤销，在省候任。由于以上情况，锦州士绅议定向省去电，挽留项知事，以免王文藻来。

二，压制地方公议会

电报去后，旅部方面得到这消息，汲在晚饭后，又召集各机关首领和地方士绅到旅部开会，劝学所长刘梦九先到。当刘到旅部客厅时，仅商务会长魏振卿一人在那儿，有团长郭瀛洲（字仙桥）陪同说话。等了一会儿，又有农会会长赵香圃，收捐委员苏纪轩来了，别人都没到。天已入夜，不能久候，汲旅长由后屋过来，坐在他的主位上，两边排列马弁五、六人。他拿着小旱烟袋，由马弁装烟点火，一直吸烟并不发言。后由郭瀛洲团长开口说道："今天旅长请诸位不为别的事情，听说你们给省署大帅打电报保留项知事，旅长特意来向大家问一问这个事究竟是什么意思？项知事上省是旅长请求大帅把他换了。旅长为的是保卫地面，请调王文藻来都是熟人，为的是地方有好处。你们大家保留项知事，究竟项知事对大家有什么好处？王知事有什么坏处？可以把这实在情况说一说，如果项知事真有好处，旅长还要给大家帮忙，也一同保留他。"当时大家对于这个事无言可答。后来刘梦九说："项知事上省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旅长这番意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因为县长有调换的消息，所以大家才去电挽留。而项监督在地方上并没有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坏处，这是历次县长去职时照例的作法。至于省里准不准，我们就不知道了。对于旅长这番意思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调任王知

事文藻来，我们也更不知道。”郭说：“这事，旅长是为地方好，项知事既然对地方没有什么太好的感情，那么就依照旅长意思办吧！”士绅们没办法，曾见过项监督的母亲说明为难的意思，他母亲说：“我给小儿去急电，决不让他回来就是了。”

三、阴谋害人

我们挽留电到省后，正合张作霖的意思，打算让项回锦。这时汲旅长听到省里消息，次日汲就给省去电不让项回来，电文中有“有汲则无项，有项则无汲”的辞句。张见这电后，大发雷霆，骂了一阵，归终还是不让来了。张遂召项说：“你不用回去了，给你挂安东道。”项说：“大帅既然要栽培我，就给我一个小差事吧！”后来给项挂恒仁县知事。汲给省去电报后，怕项回来，曾在锦州车站附近布置了人，准备项回锦下车后，对他暗行杀害。又传项在省城时住在西关某一客栈内。有一天项由南市场乘人力车回客栈途中，有人在项肩上拍了一下，项当时并未注意，回到客栈后项的当差的看见项衣袖上有血问道：“监督胳膊上怎么啦？”项才察觉是被电刀刺伤，经治疗后才愈。

四、盗买旧官衙

因为王文藻是清丈老手，熟知丈地的诀窍。又给汲在锦县东部和南部，土质较好的地方，报领官山，强占许多自垦的民地。因旧时农村有的地方接近荒野，如村名叫“东荒”、“南荒”、“荒地”的都是。农民在耕种之余，有人自己开荒，于是渐渐变成熟田。他为了省钱，并不自动

向政府报请课税，俗称“黑地”。有的历世相传，无人告发，官方也无从了解。王文藻对这情况知道得很详细，因此派人下乡，将这种地想法查出来，由汲等军官们承领霸占。人民不敢相争，眼看着自家多年辛苦所开垦的土地，被汲等占用。还有的一家只凭这点土地为生，立时夺去饭碗，所谓“当天穷”了。据说当时受这害的有数百家，其中还有生活无路，告状无门，投河跳井，寻死上吊的不少。汲在占领大片土地后（约两千晌左右）大部分分租与农民，收取很重的钱粮地租。另有一部分地汲派人自行耕种。派去的人也很蛮横，农民都怕他们。现在锦县东部还有一个屯子叫汲家窝铺，就是以前他家设立窝铺的地方。有人到过那地方，有汲家修的院子，五正六厢大车门，是为管事的和伙计们住的。

六、假公济私

汲在锦州用商人杨云峰为经理，开设乾亨通粮栈和乾亨通当铺等买卖。据说开乾亨通粮栈时并未拿出多大资本，是杨云峰的主意，将军队上军费方面的钱暂借来收买粮食，然后把粮再卖给军队，转手之间获利很大，可说是白手取财，以后这两买卖做的都很大。

七、敲诈勒索

民国六年汲接任奉军二十八师师长后，有一次城里北街纸坊福裕和失火，这纸坊是北街刘家的生意。刘家是本城富户，过去以开帖子铺起家，一般称为刘帖子铺。失火时，汲金纯搬个椅子坐在门前看众人救火，当时城内秩序很乱，兵匪不分，因汲坐在门前，就没发生抢夺事故。汲以为事后刘

家必来申谢，不意刘家弟兄并未前往。多日无信，于是有一天汲命人把刘家大东家（外号大帖子）请来说：“我修盖宅舍缺钱，要借二十万吊钱。”回家弟兄商议后，于是又到汲家说明愿以十万吊钱奉送师长修工，不必言还。汲说：“你我素无关系，我岂可白白受你这些赠送。”刘再三请求，汲才令他的一个妾，拜刘某为义父，此钱作为见面礼而收下。

八、玩弄妇女

锦州城内原有文庙两处：一在北街，是府文庙，一在城内西北角，是县文庙。民国初年废去府制，文庙似无两个必要，于是将城西北角的县文庙改为武庙，中塑关岳象。落成开光时唱戏，两旁搭了不少看棚。汲也去看戏。在观众中发现一个女子，青年美貌，每天来看戏。汲派人尾随，打听邻舍，探明是城北三屯的姑娘，住在城内姨母家。汲知道后即派人去提亲，以银大洋一千元为聘礼，女家不敢违抗，此女即被汲纳为妾室。数年后与一卫士私通，日久渐露，汲的大老婆和长子乘那个卫兵又在这女子室中时，将卫兵擒获，拉到后院枪毙了。将那女子绑上用白酒草纸糊脸窒息而死。然后掩埋，汲回时说是病死的。

此外汲的姬妾很多，大多不安于室，丑事时有所闻，不一一列举。

九、残暴好杀

汲金纯生性残忍好杀，说到谁不好，往往说：“不如枪毙了”习为口头语。他由锦州驻防升为热河都统。锦县县长王文藻也随他到热河做事，就死在汲的这个口头令上。汲

在河热不久就因战事不利从热河退出，行到半路时，王文藻的车落后很远。汲问王的车怎么落后如此之远？同时说：“真是不知缓急，这是什么时候还慢腾腾的，无用之人真不如枪毙了！”正好有个向营长在旁。向在过去，曾借汲的名义在锦县下五旗村，强买了几十天地，王文藻报告汲知道，汲质问时，向营长只好说：“是给师长买的，因此汲将地收为已有，连地价也未给。向营长白费了心机，闹个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恨王文藻，常想报复。这次灵机一动，连忙飞往后边口称“奉都统令”，将王由车上拉下，不容分辨，即行枪毙。返回后汲问向说：“方才你作什么去了？”向答：“奉都统令把王文藻枪毙了！”汲大惊说：“我何时令你毙他？”向说：“不是说，他无用不如枪毙了吗？”汲虽很怒，但是也并未把向加以如何处置。直到后来王家向张作霖处控告，才判向死刑。

汲到热河当都统时，将乾亨通经理杨云锋带去当热河省财政厅长。主要就是为了给他弄钱，搜刮百姓。退出热河后，上级命令汲将财政交待清楚。但汲未交，因为也无法交。上级催促紧急，汲说财政方面尽由财政厅长负责，我平日来未曾过问，不知内情等语。将责任尽推在杨的身上，但又恐上级将杨调去，问出真情，于是遂于一个夜间，派两名卫兵，假装胡匪，强入杨家将杨杀死于沈阳私宅以灭口。

从以上二事，不但可证汲的残暴好杀，也可见帮助军阀残虐人民两条走狗的悲惨下场。

汲的残暴行为很多，上述事实不过一部分而已。至于他的军纪败坏，士兵不法等情况，则是属于二十八师的材料，这文里并未谈多少，容后续志。

黑山县著名匪首老二哥（李魁武）的罪行和下场

郝让先

一、匪首老二哥（李魁武）的出身、家世和为匪经过

黑山县著名匪首老二哥，姓李名魁武，老二哥是其为匪的绰号，家籍辽宁省黑山县西北六十里的三台屯。父务农，生子三人，老二哥排行居中，所以得出这样绰号，老二哥生于光绪末年，少年时即桀骜不驯。在竹马玩耍中，常常抢夺邻儿的器物，且每每打骂欺侮同里少年。其父母亦不知管束，放任自流。因而地痞行为和流氓无赖的坏习气，从此就逐渐养成了。另外三台屯一带，正处于黑山县边陲，北毗阜新，南接北镇，是个“三不管”的三角地区。三台屯和白厂门以西，西山沟地方，是医巫闾山的北尾。山岳重叠，沟叉纵横。老二哥幼年的环境如此，家庭教育又如此。他到二十岁后，更目睹那些辽西著名胡匪如野狼、青山、双红、二升子、毛锦州、毛义州等人，大马金刀，杀人放火，任意强抢民女，掠夺财物等等的无法无天行为。因而他当胡子的思想就油然的滋长起来。没过二年便常同沈老疙瘩、占山好等明来暗去的出外抢劫。大时卡大钱（指在大通道上拦劫），有时砸明火（指在夜间抢劫住家的财物）。从此他便一次又一次的干上了土匪的勾当了。又过几年，自己也拉拢几名底

柱子（胡子所说的隐语，是对自己亲近而贴底人的称呼），组成二十三名小绺子土匪，老二哥的匪号也就开始传出去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主义，放弃东北。竟将所有东北军陆续撤出关外。当时日本军队已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等地，辽西各县一时遂形成无政府状态。

那时各县虽然组织了维持会，但只能维持县城街面，至于城外各村屯，尤其是边陲地方，大批胡子就左一起，右一起蜂涌而起。这时老二哥已为匪数年，且底柱子很多。同时他们听说山海关内外有辽西义勇军的活动。他们自己并没有爱国思想，只是抱着趁火打劫的思想，冒充起义军，竟树起高大红旗，到处裹了不少百姓。为首的是占山好，其次是老二哥李魁武，草上飞郭九贤，春字沈老疙疸等。连同老百姓号称千人上下，正式胡匪骑马在前打头，末后跟的就是手拿棍棒，或徒手空拳的百姓。有些还是胡匪的亲戚和家族，有驴驮子、有大车，这都是准备打进屯子后，拉东西用的。他们拉着大队浩浩荡荡的从三台、黄马窝铺经过石家沟、南三家子等而扑到陈八道壕。适时日寇的骑兵已经二日进黑山城内。旋又遣步兵乘火车向北伸展，双方相遇，并未冲突。因为老二哥这伙胡子，他们并不是安心抗击外敌，而是借打日本鬼子为名，实行其抢劫惯技，故而一听日寇到来，即行卷旗回窜三台、花楼、四堡子一带黑北两县交界地方去了。日本鬼子下车后，听说陈八道壕来过义勇军，就把房子烧了数十家。

二、老二哥攻打二台子的失败

同年冬季，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代表同战士约十余人，从北平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使命，经山海关、兴城去北镇路过四堡子、三台子、白厂门、二台……，然后直奔彰武和通辽一带，去发动有武器的蒙汉人们起来抗日。事有凑巧，在三台子就宿中，竟和匪首草上飞郭九贤，老二哥李魁武接上了头。经过谈话申明救国大义，郭九贤表面上赞成当义勇军，同时也征求了老二哥的意见。老二哥表面上虽也首肯，但心中有了打算，总是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假借正大光明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破村入屯后捞一把干的东西。他们两人就这样又树起义勇军的大红旗来。这时白厂门东一带如八道壕、赵屯、头台、老河深、李屯、罗台、大夏、二台等，均有地主和豪绅们组织起来的联庄会。以公廒屯大地主杜化桥为首，下分部兵团练及骑兵团练两种，声势浩大。武器及弹药亦极充足。这些人因为有军阀们的家族，由沈阳或长春源源的运来枪械供应。外加黑山的警察队数十名。也由于苏县长退归关里，群龙无首，只好跟队长牛万庆回驻到自己的家乡二台子（白厂门东八里距三台十五里）。他们大小枪械都很齐全，且有数名干练的好打手。这时屯内恶霸地主义聚号，是由张德荫、张仲三当家掌权。更是反对义勇军入屯，支持地主武装。他们听说三台四堡子一带，过来了义勇军的干部，又得悉草上飞和老二哥都树起义勇军大旗，开始要干抗日的活动了。白厂门会圈瓦解了，二台屯正是他们两个匪首觊觎的目标。因为二台屯内枪械子弹多，财主家中的物资厚，予料这头一仗准挤在二

台上打起来。果然，当日傍晚就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借道通过并收编一切武装起来抗日为号召，下书给二台屯的联庄会。会首张仲三，队长牛万庆，立即声明不准通过，如上来，就打打看。信使走后，且调来罗台、头台、老河深、赵屯……步骑团练约二百名。同本屯八大户炮手以及牛万庆的警察队等，立即分兵把口，配发子弹，大肆作阻止的准备。义聚号且杀猪宰羊，搬出大米白面，犒赏所有参战的人员。最后且把屯内青壮年编为工事、运输、抢救、医护等四组。隔一天后，当太阳偏西的时候，从二台的西面南面就上来了义勇军的尖兵（侦察的骑兵），随后大红旗就在屯西台子缸山上，王八盖子山上，随风摆动起来。接着军号滴哒，人皆匍匐前进。枪声有时密一阵，有时松一阵。屯子里面的警察队和团练有窑可凭，有炮台和掩体可守。屯子外边的义勇军越摸越近，双方战斗就此开始了。义勇军方面的人，虽属过路，但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且真心为人民、为抗日而打击敌人的。他们整整十名，首先从二台的西面大沟中，且战且进的靠近义聚号的前胡同。又运用机智、有勇、有谋的夺下来几处掩体。而且占据了一幢小院和一条矮土墙。这就给南面老二哥绺子处所攻取的目标，造成了犄角的有利形势。致使老二哥大部匪徒，很容易的攻下二台子屯的西南街各家（即西树沟南树沟口的一些贫苦人家约计三十四户）。可恨老二哥这伙人们，口是心非，假充义勇军抗日，而心眼里是惦念着抢夺财物，不是实际来打击地主武装或日本侵略者。在匪徒们身后，跟着十几辆大车，有的还牵着驴驮子，带着挑子、绳子及老弱残兵，多半是胡子们的家属。准备把二台子屯打破后好抢东西。攻打时持枪的土匪在前，这些人就在后边高喊：

“攻啊！前进呐！拉大网啊！”天黑后二更时分，二台子的西南街，大部分为老二哥和草上飞郭九贤的一部分匪徒所控制。这些匪徒就开始抢掠起来，翻衣找被，翻箱倒柜。有的点火烧房，烧柴草堆。火光冲天，照得满街通亮。子哭娘嚎，叫苦连天。我义勇军战士们看见匪徒们的虐民行为，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战方法，是不可以共事的，是难得最后胜利的。并且北到通辽还有更大的任务摆在眼前，时间紧迫，事态难期两全。当时就且战且退，最终他们便绕道奔阜新而北上，离开了这些人。

这些冒牌义勇军的匪徒，人数虽多，终是乌合之众，而且存心不良。当那些真正义勇军战士撤退后，他们还在抢东西。匪徒和警察队接近后，互骂不止。郭九贤骂牛万庆为牛犊子，牛万庆骂郭九贤为外孙子。结果，老二哥绺子的一部，就被牛万庆警察队所包围。草上飞的那一帮，也没攻进义聚号大院（当时地主联庄会的大本营），反倒有了伤亡，被打死的七八具匪尸勉强从大墙底下拖回来，装在大车上拉走。原打算拉抢得的东西，现在倒装上了阵亡的匪徒了。

天快亮了，老二哥和草上飞才会了面。知道这样干下去很难取胜，当即退却，妄图再举。但退却是匆忙、紊乱的，老二哥部下的十多名挂了彩的匪徒，竟遗弃在西南街最靠边的三间房内。天亮了，牛万庆便把这些匪徒一一枪毙在屯外的草甸上。这一场争杀，老二哥假借抗日美名来攻打二台屯的地主武装，由于乌合之众，目的不纯，结果遭到惨败。除白搭二三十名伙伴的生命和把二台西南街贫苦人家的东西抢掠一空外，而大地主义聚号和大老财张洛湘、孙宗武等的家资，并未摸到分毫，可是牛万庆队长倒因此得功。后被黑山县方（此

时黑山县城已快要由维持会改为伪县公署，据说王化南和李铭三正在逐鹿黑山县县长一缺），调回城内做全县的警察讨伐队队长去了。事后第二天，由于联庄会上报义勇军攻打二台未成，全行西退的消息，日本鬼子由沈阳派来两架飞机，到白厂门和二台子一带大肆扫射和投弹，这次炸死几头牲口，又把一个在屋里坐着的妇女炸死。

三、老二哥投降日寇、出卖朋友

老二哥和草上飞郭九贤在打二台子失败后，痛定思痛，把牛万庆恨透了。听说他当上全县的警察讨伐队的大队长了，更是要找他的别扭。所以在伪大同元二年，黑山县西北界面和城乡附近就处处闹事。秦屯车站被胡子攻打过，黑山县车站也被胡子攻打过。邮局局差老赵的儿子赵庚申被绑走无下落。陈姓王姓住家被砸明火。据说黑山第三小学后院女生部住有教员三名，于子夜进去胡匪五名，叫女教员给他们烧水做饭，吃完后并奸污了她们而去。这些都是老二哥唆使他部下硬手底柱干出来的。又因为营坊（距县城西方公里）张老庆是他老丈人，胡匪在县城跟前夜间落脚时很方便。他为了扰乱地方，为了满足私欲，为了和牛万庆做死对头到底，最后在魏家岭，老二哥等蹲在窑内(房子和庭院)，牛万庆亲率警察队在外面包围。牛万庆既想一网打尽，又想个个抓活的。在黄昏时他就顶烟往上闯。结果头部中弹身亡未能得胜。牛死后由伪公署给买的大红杉木棺材，停放在火神庙内办起追悼大会。这是笔者亲眼见到的。随来的二台牛姓的人们（在讨伐队里当班长或队员的）都抚棺大哭。而二台的恶霸地主义聚号及其仆从的八大号，也派张相臣为代表，亲

到黑牛山的灵前致祭。

这时伪黑山县长是李铭三，参事官为松田直树，警务局指导官为中山竹雄、小关太吉、田北义彦，还有日本警尉上杉正规、西谷弥太等。他们为了急于肃清地面，争得功绩，好提高自己的权位。对付全县土匪，便采取了剿抚兼施的办法。

一九三六年前后（即伪康德三四年间）警务局来个曲翻译名泽治，日本话说得很出色，有交际手腕，在各指导官面前是很得脸而受信任，但大烟瘾很重。有一次他为办理缴枪事情到了三台，经人介绍，竟与老二哥相见。老二哥也是瘾君子，二人相见很投机，就喷云吐雾起来。且吸且谈，非常密切。终于谈到县局对土匪的剿抚政策上来，曲便劝老二哥乘此时机，放下枪杆，赶紧改邪归正，受抚投降，同时立功赎罪，永保平安，我可为你担保一切。老二哥闻此也正中心坎。以后果然交出三支大枪，匣枪一支，且说动同伙同屯十几名匪徒，也交出枪支弹药等。曲某回局向指导官陈述经过，指导官夸曲办事得体，遂将老二哥李魁武召到黑山设宴款待。且为其在西街租妥小院一所，令其迁家来住（为的是叫他找寻投降的匪类），从此老二哥就成为当时所谓"良民"了。便在城里过上了安闲享福的生活。同时警务局又由鸦片零卖所，给他起了一个大烟证，一个吗啡证，允其公开吸食购买，且不收价款。他和妻子就这样在黑山住了四五年。一向不回三台，表面也不为非作歹，但暗中却出卖过两次朋友。据说日寇在光山子大沟枪毙的四五名胡子，还有在黑山城外小南庄屯道旁的大土包下用洋刀砍死的六名匪贼，都是老二哥给扎的眼。大约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他给

他儿子娶媳妇，大大的打扰亲戚朋友，高搭洋房子，杀猪十余口。来道喜的军、政、警、学、商、工各界都有。用马车接来的官太太，都带金镯子两三付。就连笔者也曾亲去吃酒。此外他家乡三台、白厂门、刘屯、四堡子等地也有不少老乡和屯不错的，全来上礼，接钱不少。老乡们看了这种情形，都不约而同地说："人家老二哥李魁武，当胡子还当出息了，老二哥真够上大要人了！连日本人、日本官都捧他。"

四、老二哥的复起和伏法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日寇溃败投降了。东北各地一时又陷于无政府状态，有的成立了维持会（无非还是伪官吏和豪绅的集团），有的连维持会也没有。幸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的工作人员领导群众，维护治安，如北镇县支队长赵文龙就首先来过黑山，我县首届县长云戒三、丁科长等，也都不避艰险和危难，在黑山开始建设政权，组织武装。所以当时黑山、北镇就有武装齐备的两大支队出现了。朝夕训练，对维持地方治安上更是不遗余力。所以县城秩序非常良好，附近各屯亦均安谧。惟偏僻地方则鞭长莫及，仍有匪类的蠢动和骚扰。

老二哥李魁武是时早已把家小迁回三台，便乘机到边外找到占山好和春字沈老疙瘩等，共同约会旧夥，勾引新匪，又拉起大帮来。老二哥和占山好是大头子，其次为沈老疙瘩等。且树起大红旗杆，上写"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就还"二十个大字。籍以表明他们这夥人所以要抢夺烧杀的原因。同时还给各附近屯子下条子要钱，

找会首从各家齐。如不齐或齐不到，匪人就开始进屯抢烧一空。他们这夥匪团约三百名上下，大约共是十几个绺子，全是骑马，马鬃和马尾都扎有红绿布或各色绸子。这些马匪在大路上毫无秩序的奔驰，马声呼呼乱叫，冲起沙尘障眼，路断人稀，百姓都吓得象避猫鼠一样。他们从边外拉过来，吹号的在前头，接着是骑马的，后边便跟着他们家里人。有的拉驴、有的拿绳子，是准备抢完了，好往家里送。这些匪人都是黑地庙、窑沟、鲁家荒、白厂门西沟、四堡子、江家沟等处人。这是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事情。这些虐民害物的匪团，从大郑线芳山镇车站旁边经过，首先到杏坨子，便闯进了大蔡沟村。所有附近七六个屯子，如纪屯、龙湾、杨屯、修屯、史油坊……都住满了。每占一屯即分别乱闯各家，翻箱倒柜，抢夺东西，凡是完整不破的被褥、衣帽、鞋袜、布匹……等只要是好的物品，均行抢去。甚至连做鞋用的袼布也被拿走。更命令各家不许关门，夜间屋屋都得点灯，那几天里大蔡沟一带，真如大年三十晚上那样明亮，屯里人有的跑了，跑不了的（匪徒每在进屯前，往往用骑马兜大圈子，把跑出的人圈回来），就得伺候胡子，做饭烧水，牵马喂马。全屯男女老少就变成他们的奴才。这回他们说："现在没世界啦！只有我们这天下第一团的人们说了算。各家有年轻的姑娘可以和我们结婚，我们当拦把的（拦把是胡子头的意思，这是匪人黑话），都能出头给当媒人，给操办一切……。每找到一个，就硬行搭配一个年轻胡子，并给操办结婚，给他们同伴娶媳妇入洞房。就这样成天在大蔡沟一带杀猪宰羊，吃喝玩乐起来。可是家家户户，亡家破产，全屯人们简直是陷于地狱一样。尤其这老二哥新从外边弄一个年

轻而又泼辣的姘妇，才二十几岁，匪团里的大小拦把都以老二嫂呼之。她好骑大红马，也会使用大小枪。她的为人更坏更恶，女孩子们对匪人强迫结婚有拒绝者，她便扒开裤子给捺着。她看谁家有新另布头，就向这家要新衣服。没有就吊起来或压杠子。有时她又到各家敲墙跺地，听有空声就扒开找东西。诸种罪恶，不胜屈指。

同年十二月一日，我云县长闻老二哥在大蒜沟一带种种害人之事，甚为发指，当即约会黑山、北镇两支队，在彼此人数枪枝相差的情形下（即匪多枪多，我人少武少），黑夜驰赴大蒜沟屯，前往救民，歼灭匪类。谁知带路人走了岔道，浪费了时间，等到天亮，才将大蒜沟屯从西南两面包围上，这时匪已查觉。当老二哥、老二嫂等数十匪骑，由屯内顺道向南冲去，经我支队战士和云县长开枪截击，匪即落马数名，老二嫂左胸亦被弹穿一处，堕身道旁呻咽不已，老二哥欲救不得，便割爱率部下向南西折而逃。其他占山好、春字沈老疙瘩等闻枪声即开始与我支队交战，我支队人人勇敢，立即击死击伤匪人不少。但匪的大部分均从杨屯方面逃遁，且大呼"到靠边屯集合。"

这次战役我黑北两支队是大获全胜。毙匪十一名，伤数十名。使大蒜沟一带的村屯人民，又从水深火热中复苏起来。故全屯老幼对打扫战场的我支队战士，无不尽力帮助，亦无不交口称赞："打的好！打的好！真给老百姓报仇出气了！"观其情绪，看其神色，愉快感激之情是以言语不可形容的。但我支队战士，亦牺牲六名（现葬于八道壕车站东南数十米外的烈士墓内）云县长也受微伤。

再说老二嫂被击堕马后，向群众求救说："谁把我救

活，我就给谁做媳妇。”但大蒜沟人把她恨透了，不但不救，反倒用粪叉子、木棒子把她活活打死，有的人把她衣服给扒精光，赤身露体。最终还把她和其他匪尸共十一具，都拽到屯东洼坑边大树下掩埋了。当夜被边外鲁家荒人把匪尸偷偷抬走一个。又匪人临走时曾把该屯弹棉花的工匠王才，带到靠边屯，说是他给县支队报的信，打的死去活来，没法跳入井中，但又被捞出来枪毙了。更有大蒜沟谷姓老汉，家有一女，被某匪看中，与其强迫结婚，因有县支队攻入，某匪未得脱身，即躲入缸中加上盖。支队战士搜查到屋，问老汉有无匪人？老汉不敢明说，即以手势暗点大缸，当即揭缸抓获正法，谷姓女子乃化险为夷。实我支队解救之功。

老二哥、占山好、春字沈老疙瘩等于靠边屯集合后，仍继续窜扰于彰武阜新沿边一带。但对黑山、北镇则存有戒心，轻易不敢前来滋事了。其后四七年至四八年，我解放大军不断从四面八方进出黑山，致使这夥虐民巨匪，更无处潜踪。且有随时随地被缴械或被消灭的可能，故而散夥回家，都去化装好人。然而英明的党，英雄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土改后任凭老二哥在家乡三台，穿上破旧衣服，戴上破帽子，假装贫雇农，常到三台农会溜溜达达，但是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控诉他的各种罪行，经我政府人员的细致调查，一切罪证属实，当于五二年在三台拘捕。又于同年五月和其他三十多名的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在黑山南门外伏法。

锦州军伐郭瀛洲的罪行记略

刘 文 朴

一、郭的出身及其罪恶根源

郭瀛洲，字仙桥，原籍辽宁省本溪县人。幼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系一流氓出身。日久结成党羽，危害地方，因买回民食物少给钱，因此回民与郭结成仇恨。郭纠合群氓，将回民用绳绑缚，口衔猪尾游街，惹起全回民的反抗。因为这是对回教最大的侮辱，引起了公愤与之械斗。郭等力不能支，失败无处安身，遂退逃到了辽海一带藏匿。但因日久资斧告罄生活无路，在这种形同丧家之犬的漂流苦况下，正值清末，日俄在我辽东大战，地方混乱，家家闭户不安，土匪四起，群盗如毛，抢男霸女，绑票勒劫。大户人家富商大贾，为巩固他们的身家财产，发起组织民团保卫地方。此时有冯德麟半匪半兵的团练队，居住辽阳，距州城五十里的黄泥洼镇。名为保卫地方，实即按地抽饷的保险队伍。到处招募游勇，郭即乘机报名投该队当兵。而郭之为人长于言词，善于逢迎上峰意旨，机警百端，狡猾万变，最得长官欢心，冯视为左右膀臂。待至冯由左路巡防队统领官升任暂编第二十八师师长驻防北镇县时，郭已经冯的迭次提拔，青云直上升为该师一百一十一团团长。冯郭均系贪婪之徒，又以出身草莽，只求利己不管损人，强取强夺，视为无关轻重。尔时正值民初地方兴学，没收庙产出卖学田，作为校舍。办学经费除城

镇外，凡是离城稍远的寺庙学田，即立时变产出售，以为兴学经费主要来源。冯在北镇依仗驻军主将的权威，以私人的势力廉价掠得了土地和庙产很多。举一可以证明，例如北镇县城西北的念佛堂，周围有八个宽广七壮的沟壑，经和尚多年经营，树木成林，果树满沟，价值十余万元庙产。冯用军势权威和借口办学，驱逐和尚远逃，大发其财。白手得来还欲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同他的大儿子冯庸走马提鞭前往观看，正在得意洋洋，其子冯庸认为这是孽产，行至中途勒转马头转回，由此父子失和。

彼时又值奉军军阀练兵，扩大队伍，增加势力，急需开辟财源，准许人民报领山荒、荒山，丈领清赋升科，拍卖官产，以增收入。山荒、荒山是国有官产，清赋是民户熟地内的浮多，例如有地百亩，只按百亩纳课，但因耕种日久在地之周围临河靠山之处，河有冲淤，山有闲荒未垦之地，而本主自行开垦成熟耕种，亩数增多，就成地多课少，准由本主限期报领升课，否则过期本主不报，就准他人首报，照章归首报人承领，地之本主不得争执。此例一开，冯又借此为由，在北镇又得了很多良田。郭系冯之部属，追随多年，臭味相投，看冯由官产庙产以及首报熟地、首报荒山发了大财，自然要效法他的步伐而行，事属当然。

二、到锦先夺旗产分肥

一九一四年陆军第二十八师五十六旅旅长汲金纯由彰武开来锦县驻防。郭系该旅的一百一十一团团长亦随同驻防城内，在他们调防锦县时，汲、郭即蓄心到锦之后，亦照冯在北镇办法借势夺买官产发财。那时锦县官产由县署掌管出售。

汲先请准张作霖调彰武县长王文藻来接锦县县长，因王先年曾充驻锦西路清丈局局长，官公各产内幕尽知，而又与汲、郭密切，便于舞弄以少数的金钱，即可掠得大量官产。王则从彰武苦缺小县，升任锦州优盈大县，又以旅长的权高势大能做升官靠山，当然愿从。所以王文藻县长到任之初，先即着手为汲、郭竭立办理分脏式的购买官产勾当。那时正是辛亥革命后期清末民初，所有前清衙署，如副都统衙门、协办衙门、管庄衙门、纳都衙门、府经历衙门、锦县衙门、锦县典史右堂衙门等等一律出卖。民户人家欲买这种官产，不仅不得而知，即使知之，而县署高抬价款手继麻烦亦难以到手。就这样他们按照予定计划，明目张胆的归汲、郭分脏了。汲金纯旅长得东街副都统衙门(俗呼大人衙门)一所、北街协领衙门一所、北街右堂衙门一所（俗呼四老爷衙门），郭瀛洲分南街管庄衙门一所（做了他的公馆）、分旧锦县衙门连南面两处大狱（做了他的花园和后来修的家庙祠堂），都是以很少的金钱，剥夺来大量的官房官产。这是军阀汲、郭与地方官勾结，任意营私舞弊，掠夺国家财产，入了私囊，发了横财，遂了心愿。

郭分了锦县城内旗署官产之后，又着眼郊区寺庙的掠夺。他看东郊紫荆山的荆山寺，庙产甚是丰富。该庙在紫荆山西麓，俗称活墓子沟，东西有六里之长，南北宽三里有余，中间由高峰下来一道漫岗，左右各有小河一条，漫岗上葬有元朝封为国王之位的穆呼哩的古墓，葬时是悬棺故称活墓子沟。沟北山坡上建有荆山寺，由来已久，历代相传。经住持僧开垦有香火地一千余亩，山坡上值有果树和杂树甚多，树木阴翳，泉水长流，风景清幽。郭则先遣牛副官与该

处邻屯坏人勾结，用威协手段，向和尚述说："庙上的香火地，原先都是自垦，捐课无多，其余都是无课之地。现在国家准予首报，全归旅长首报，就要丈量分段，你不如将全庙产和山场果园杂树全卖给旅长，给你几个钱，然后你云游高山名刹，到何处都能烧香念佛吃饭。否则的话，庙上香火地，块块有浮多，浮多地都被郭家报领，就是庙上香火地，块块与郭家报领地相连，将来种地，不是他妨害你，就是你妨害着他，纠纷起来他有势力，他是军队旅长，你是无财无势的穷和尚，本来他报你的浮多地，他知道你对他准不满意，背地里恨个牙根直。现在若是起了纠纷，倘或他翻了脸，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杀人不死枉为仇，他向县署请求办学为名，要紫荆山的庙做校舍，没收香火地果树园做学田归公，你岂不是人财一起丢吗？"以上这一席话把和尚说得闭口无言，只管低头，一筹莫展。过了几天，不知怎的，和尚在这样威逼利诱下，就把这庙产和香火地杂果树等都给郭旅长了。究竟郭给和尚多少钱，系秘密办的外人不得而知，大约为数不多，等于白拿一样。这还不算，还有沟西口上的百官屯有数十户贫民和中等人家，在庙地相连的山边沟旁开有十亩或多则二三十亩熟地，耕垦多年，向无国课。郭闻之后，派牛副官到屯对各户说："你们各户的地都是私垦无课的地，现在旅长报领，你们有否执照？"大伙说："我们开垦的地无国课那有执照，只有和这地相连的老地母子的执照和这地的典当出兑的白契文书，另外没有别样的文契。"牛接着说："那末就将这块地拿出来吧。"众户不敢抗违，一齐交出。等候多日，也无消息，后来到年底租地，核议地租时，牛副官说："这块地都归旅长了，将来每亩地给你们两

元钱，现在你们愿意还种这地就交租，不然给别人。”民户忍气吞声的，就这样将产权丧失了。按着当时奉天省政府规定，民间无课之地和熟地无课清赋章程，到期不按首报人承领者。原为督促有地人隐匿不报或迭经展期延不报领之意。郭从此就夺去了各户的产业，使失地农民全家老幼无以为生，啼饥号寒。

四、硬夺古墓祭田归其所有

在锦州市东郊距城十八里有英家坟屯。屯的东山坡上有三百年来仍然保存的尹家古墓。内葬满清尹文恪公名泰和其子文瑞公尹继善。尹家当年的旧住宅，在现在市内阜康门里路北。父老相传称为旧相府者即是。在满清时他的大门上曾挂有“相府”二字立匾。尹继善之子名庆桂也当过宰相。他在雍、乾、嘉三朝祖、父、孙三世为相。前门上又挂过三朝三相的匾。据锦县志略所载，嘉庆四年尹庆桂年属七旬，皇上赐诗，有“名重三朝三相国”，“勋隆一代一贤臣”之句。他家既有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做过这样的高官显宦，他的祖先墓地，自与平民不同。因此，坟场是满清皇帝的上赏，坟前有两甬御祭碑，九眼透龙，辉煌高立，远远就可望见。碑之阴刻有上赏坟园的四至，东至山分水，西至山下道，北至分水岭，南至万字大沟，包括山地三千亩，平地二千余亩。平地内有熟田一千五百亩，上赏时做为坟上祭田，所得历年租银，都做尹家春秋祭祀祖先之用，其余熟地归看坟人夏姓耕种，补助生活。在满清时代，凡系民有房园、坟园、田园这三种土地，称为三园地，不纳国课。尹家的坟园和祭田在三园之内，自然不能例外，也是无课之地。而郭瀛

洲夺取了紫荆山紫荆寺的庙产和霸占了民间开垦无课之地后，尹家坟在荆山寺北岭之北，离荆山寺只七里地，遂又垂涎尹家坟一千五百亩祭田。因祭田无课，使他有夺产的借口，他就又将尹家坟祭田首报承领。经由锦县捏弄报省官地清丈局批准，由县派人去绳弓丈量，交完价后发下文单执照，就归他所有了。接连他就勒令旧有地户向他交租。坟主尹家畏势不敢声张，而地户更何敢抗违，就这样尹家后人尹兴顺的几百年祖遗的上赏祭田，也就全部丧失了。后来尹兴顺因生活困难想起告状，他就豁出一条老命战战兢兢的往奉天省政府财政厅、清丈局分别控诉郭瀛洲霸占他的祭田，请求返还。因郭仗势不退，省厅也无可奈何。直至"九•一八"后伪满时期，郭的势力已去，尹兴顺又告到长春（那时称新京）伪满政府，于伪满大同二年五月由伪满民政局派来姚履霜、田厚田两名调查员来锦亲到地段勘查属实，才将这失去多年的祖营祭田，归还尹家后人尹兴顺。

五、强掠武圣寺香火地

在尹家古墓以北，越岭过去，相距约有二里，沟内就是校卫屯，屯的中间有庙名武圣寺，由来已久。早年是和尚住持，不记何年改为尼僧住守。这庙有香火地十八饷。郭霸占尹家祭田后，又看武圣寺庙小、人孤，尼姑软弱可欺，校卫屯的会首人等也不敢干涉，就借此庙产归公，照冯德麟在北镇县逐僧强夺念佛堂的办法，将十八饷香火地的执照强迫要去，涂改执照将庙上尼僧的名字，换上他的长子郭邦彦的名字，到锦县公署盖口印，作为纳课根据，就这样很简单的把庙上香火地全部夺去了。由此佃户们就年年进城里到郭家花

园郭德善堂（郭家的堂名）去交租。一直到郭瀛洲病死之后，郭的子孙分家，分给了郭的长孙郭质政，于伪满康德八年由郭质政又卖给众佃户了，迄今如有人谈起此事，老尼还恨入骨髓骂不绝口。

六、逐白云山古庙僧人逐占四沟香火地

由紫荆山向东北去，山岭重叠，一脉相连，在十五里地之外，有座名山叫白云山，是紫荆山的主脉，因该山形有四面威风，山峰上修有四方台。附近古墓很多，西面葬有蔡阁老的古墓，南面在半山坡上有一座庙，庙名望海青云寺，古名聚仙寺。在满清乾嘉时代，该庙住持老和尚是一位佛教会的长老，出京云游到关东，走到白云山，爱慕此山风景，就长住在该庙了。这老和尚又是北京的长老，很有势力，他就请当地官府，在环山周围的沟谷上厚平坦地方，都开成香火地。共开了四沟地，计青山沟、王蛮沟、老沟、一条腿沟，共地四千余亩。按照旧的时代地方剥削方法，雇了许多贫雇农给庙上耕种。并拴了骡马大车数辆，养得牛羊成群，山上栽些果树和杂树，还将该庙建筑得辉煌庄严，名闻远近，招来游人甚多，香火盛旺，颇极一时之盛，老和尚年老圆寂之后，代代相传，接续主持庙产的后来和尚，只顾享福，不善经营，香火和庙产也就日见衰落了。到郭旅长来锦驻防，民国七八年时（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和尚名安宸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浪荡逍遥。郭遂又得了夺取庙产的机会，就派人勾结该庙山下王蛮沟屯中富户郝印堂，作为他的狗腿子，照夺荆山寺庙产的方法，一面引荆山寺为证，说旅长已将浮多检举，你是如何退地？另一面又用威协

手段使和尚甘心退出。和尚犯了诸多清规，常怕有人驱逐他出庙，今见旅长要地，更恐惧的不得了，郝印堂乘此机会百般威胁，结果郭花钱不多，就将这四沟地二百来垧完全作了郭的私产了。而郝印堂经郭派为管事人，年年由郝经租收租，郭即年年秋后进来三百多石地租粮。

七、捏报义地为无主闲荒掘墓扬骨

以上郭瀛洲掠夺霸占了庙产、古墓祭田和广大人民血汗开垦的熟地，仍不能饱其贪婪之欲，又到各处彻底搜刮，在锦县公署王县长和署内管理官产人员的帮助琢磨下，发现城东三十里甬碑屯前，有清代甲午战后，满清领兵大将宋庆（人称宋大帅的）由前线退下，驻守大御路旁时，在养马牧场内修建了营盘，当时占地五百亩。后来到光绪三十二年将营盘迁移离城八里的东八家子，旧营作废，年久荒芜，附近居民就作了公有义地，葬了乱坟乱冢很多。间有空闲无坟之处，已被左近四甬碑、兴隆屯等农民开垦成熟地，但未升科报领，成了有主无课熟地。县署人员给郭找出来，郭见此地又是一块财产，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得到良田，因此他就以他长子郭邦彦的名子作了领名，在锦县公署报了国有闲荒，由县报省，经清丈局批准派绳弓丈放，发下丈单执照，就算归他所有了。郭即派人经营，凡是原先开成熟地而无执照的人，说他们是私开国家官地，罪有应得，今归旅长报领地块认东免罪，否则送交官府，不但从头计算补交粮租，还得处以应得之罪。各户闻之丧胆，都赶快认郭为地东了。至于地内尚有数百乱坟荒冢，不论有主无主，一律掘墓扬骨，用犁开平，作为新垦，招户收租。

八、报领整个紫荆山，包套十七个村屯公地

郭最后又闻有人说，紫荆山是个金山，宝贝太多，旅长既得了这些良田果园庙产，应该改名紫荆山。郭问此话怎讲，那人说，此山四面八方，岗峦交错，夏则云锁高峰，冬末白云罩头。在中秋节后，天道南行，日出于大紫荆山与小紫荆山之间，形成一个旭字，称为紫荆朝旭，是锦州八景之一。最好春夏之交，草木茂盛，药材繁多，荆条满山，刨药材的人，每日肩担驴驮运至城内出售，得利很多。贵重的人参，味香的花脸蘑，亦间而有之，采来出售更得高价。而幽谷丘陵地方，年年羊草长得甚高，秋后草成，各村屯的农民纷纷打割，做为牲畜饲料，贫苦农民无牲畜的，历年秋成单人上山割草，堆成大垛等候冬天草客下乡来买时出售，最少亦卖二、三百元，近山农民多以此为农闲时期的副业收入。更有满山都是石矿，即如在该山南铁路局开采多年的石场，那种石质，非常坚硬，不仅为做铁路铺道之用，还可做为建筑墙的最好材料。如此说来岂不是金山一样吗？郭旅长听完很是欢喜，以为这样宝藏丰富的金山，与他夺来的庙产祭田相连，如全归他报领，岂不是一大块财产。因此郭就从一九二〇年在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用他长子郭邦彦和次子郭邦振的名义，将紫荆山作为国有荒山报领了三万亩。所指四至，南至双羊店以北，北至欢喜岭、校卫屯以南，东至赵泉沟、郑邦屯以西，西至大小齐屯以东。这一大片，南北长十五里，东西宽八里有余，将山的四周村屯，西面的大齐屯、小齐屯、杨家沟、董家沟、英家坟、贺家窝铺，北面的校卫屯、十五里屯、曹家屯、水泉，东面的赵家沟、郑邦屯、兴

隆屯，南面的小寺、双羊甸、紫荆山屯、百官屯，以上共十七个村屯都包括在内，从此各村的“樵采”、“牧养”和穷人葬埋的“义地”，以及山南林业会造林，都不许可了。不但人死后不准在山上埋坟，打柴割草等都不行，至于牛羊骡马随便上山放牧就更不行了。他在这报领的荒山四周交界埋有上刻郭德善堂字的石柱子，经年派有副官、兵卒看守。如见有放牲畜和割荆条、刨荆条疙瘩的进入交界石柱，一律私自扑去，带他们到住所，私立公堂，非打则骂，罚款若干，轻则托人说情亦得送白面一二袋了事，围山村屯各户，敢怒而不敢言。

九、纵兵殃民

郭平日对于官兵一味放纵毫不管束，纪律既不严明，军规更谈不到，每日任凭官兵在锦州大街上随便游玩，不去妓馆娼窑，就去戏园澡塘、饭馆等处出入，上妓馆娼窑是任意搅闹，上饭馆、澡塘、戏园多不花钱，还得好好招待，倘招待不周非打则骂，砸窑子、砸戏园子、打人力车夫等事日有所闻，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自从二十八师驻锦以来，官兵随便往各村屯号柴号草，强迫无价供应。离城二三十里地村屯，每日给军队、公馆（军官的住家）送烧柴大车不绝于途。更难堪的是大兵下乡要柴草时气焰万丈，稍有不遂，打骂随之，借此敲诈、勒索、讹诈、弊窦百端。丘八老爷故意装做凶恶，豪横面孔，穷苦人家的人见而头痛。流氓狡猾之徒，帮虎吃食，为虎作伥，欺压善良，蹂躏乡井，毒害人民。

十、被告退地

郭将荆荆山全部霸占之后，剥夺了环山周围各村屯农民的生活生计，惹起了群众万分的仇恨。但因当时郭手握军权，素性残忍，容易借题杀人，以故各屯会首人等虽有集义，不敢贸然晋省控诉。待至一九二一年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升了热河都统，郭升了吉林滨江镇守使兼吉林第六混成旅长，全二十八师改编离锦。又值次年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奉直第一次在关内大战，调郭由滨江带领第六混成旅一个团开往河北省永清、安次两县迎敌参加作战。及至奉军败退出关，郭带领的一团兵马溃散无存，狼狈逃归，回滨江镇署后，又呈请续招新兵，仍欲将旧团恢复。张作霖对郭非常不悦。当时各屯会首人等认为有了控告的机会，始敢举出兴隆屯的王平斋、王子藩二人为代表，进省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控诉郭瀛洲霸产害民等情，请求传案交军法处审讯，退还被霸各地，而重民生等情。代表们在省坐控，一连递了十余张控状，这才由军法处送交张作霖批阅。张见之下，异常震怒，即于是年冬将郭的滨江镇守使兼旅长的本兼各职一齐撤掉。立时将控案交锦县执法处长常荫槐，限十日内传案审讯，秉公办理，勿稍徇隐，呈覆核办。常荫槐接到训令，一看甚严，不敢偏袒。此时郭撤职在家闲居，他住旧管庄衙门胡同，与执法处是在一条胡同内（即现在南街管庄衙门胡同），郭在东头，执法处在西头，临开庭审讯之日，郭步行前去，满面颓丧，又气又羞，不欲抬头，深觉可愧。经过审问之后，派处内秘书李鉴清前往勘查。李为人梗直，不惧权贵，带同绳弓先到双羊店林业会地区一带仗量，后又到各被

占处详细调查，确与控诉代表人所说逐一相符。回城报告常氏，正拟由处呈覆保安总司令部，郭见势不佳，托出锦县当地士绅，陆辑五、杨云峰、徐子聘、段一樵等人调停，愿情将前报领十七个村屯“樵柴”、“牧养”、“义地”和林业会的林区，连荒山三万亩完全退出归还各屯。四甬碑屯前的废营义地，亦甘愿由四甬碑屯南尖山子处他备价自买半方好地作为补偿。并将他早年占领时所掘的坟和地边剩存尸骨，他给迁至新买义地内埋葬。其余紫荆山寺被逐的逃僧，武圣寺的老尼姑，都不知那里去了。白云山望海青云寺的小和尚安震还了俗，亦不再要庙产。士绅们一半保全郭的面子，一半和解，就这样算结束完事。事后，林业会和各村屯成立一碑碣，碑文内记经过事实，并刻有退地后的新四至，作为界石，以存永久而免再起争端。现在此碑仍然在百官屯南岭大道旁巍然耸立可证。

十一、在锦死去，死后被子盗骨翻尸

郭被撤职后在家闲居，意颇怏怏，心不愉快，适有在他原先滨江镇署当时参议官的福建人，姓柯名沅字芷浔，是个名士，写作俱佳，来到他家访问叙旧，看郭寂寞无聊，建议他修个花园以养余年。郭接受他的建意，就在分买旧县署地址，修了一个花园，名叫郭家花园。园内修的小桥流水，亭檄辉煌，四时花木，万紫千红，映衬着东侧的宗祠青松翠柏，炉鼎丰碑，分外可观。正中修了五间大厅，厅上悬有匾额一方，是柯芷浔写的“养园”二字，上有题跋，落有名款，点缀得堂皇雅致。郭住在其中，很象儒家风流，林泉退养。其实他是假斯文，故意抬高身价，沽名钓誉。以后一九

二四年奉直大战又起，奉张知道（奉张就是张作霖）郭与冯玉祥素有交谊，遂起用他委为头等咨义，派他携款动运冯玉祥，凭他三寸不烂之舌，真说服了冯玉祥班师回京，由此直军大败，奉军得到最后胜利。郭的功绩自属很大，当然必有重报。但因奉张不忘他的旧恶，并未予以高级职位酬其功勋。及至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张在京就职陆海军大元帅，和张一九二八年被炸死后，其子张学良继承父业以及东北易帜后改任东北司令长官，到一九三〇年又晋京陆海空军副司令。郭始终是一名咨议，并未得任相当职位。郭由此恼恨，闷火中烧，得了精神病症。延至“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郭看更无希望，加以精神病重，中风不语，就于伪满大同二年春病故在锦县。死后葬在紫荆山荆山寺南岭上。这坟地是经他次子郭邦振请的风鉴先生看的新坟地。郭次子郭邦振常背人说，这块新坟地风脉很好，将来大发展在二门上（他是二门），这话被其四子郭邦宁窃听记在心头，等他二哥郭邦振死后，郭邦宁就于夜晚带人偷偷的到坟地上，将他父亲郭瀛洲的坟掘开盗骨翻尸，改埋葬在他的四门穴脉上了。这真是，当年扬骨掘坟事，今被儿孙照样裁。

我所知道的“万国道德会”

毕玉洲

我于一九四〇年加入万国道德会，为终身会员。开始在绥中县分会担任文书兼识字班教员，以后委任为分会智育系系长。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去新京财团法人，满洲帝国道德总会职员高级训练班，受训六个月，十月二十三日期满毕业。“八·一五”祖国光复，这时国民党长春市党务专员办事处借我总会训练地址，开办党员讲习大会。由我班选送十五人旁听，我列其中之一，听讲习二十一天。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我即返回绥中，重整旗鼓，联络旧人，组成万国道德会绥中分会。我被举为常务理事，曾偕同张风阁（伪满绥中大汉奸，任万国道德会绥中分会理事长）去沈参加辽宁省道德总分会讲习。十余天后返绥仍主持会务，直至解放。有钱者自顾逃命，一般者亦无心恋道，绥中县道德分会遂告解体。我先后服务于“道德”达九年之多，就我经历范围，将所见所闻万国道德会之概况，叙列如下，仅供参考。

一、万国道德会之起源

一九四七年万国道德会辽宁省支会曾刊发一本小册子，名曰《万国道德会概况》，其中对万国道德会之历史，已有简

略记载。按其记事，得知“万国道德会”起源于山东，由山东历城之江涛峰与其子江希章所创办，设筹备总处于济南。力倡尊孔读经，时为一九一八年之事。到一九二一年该筹备总处呈准中央政府内务部立案。在泰安召开成立会，“举孔子奉祀官”孔德成为会长，康南海为副会长，江寿峰为监理。一九二四年江希章曾来锦州、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安达、齐齐哈尔等处举行游行讲演，宣传自己著作白话四书：《息战论》、《礼运》、《道德经》、《大千图说》等。一九二六年江寿峰死于济南，由其子江希章为监理。江是在秋孔子圣诞日召开代表会，提出修正章程案，遂明定宗旨条文曰：“本会以改建社会，缔造大同，促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计划为宗旨”。

在此之先，东北地区（吉、黑、热、辽）王凤仪（字树桐，人称王善人）已有相当影响。倡道德，办女学，到处游讲，并能以性理疗病，拢络人心。万国道德会观其影响颇大，遂率众推举杜绍彭往东北进行所谓访贤达之活动，邀王凤仪入会，以王之学说与主张灌输民众，以王之影响扩大道德会组织。次年一九一九年江希章、王凤仪合流，将东北之义务女校，均扩充为万国道德分会，至此万国道德会才在东北站住了脚。

二、万国道德会之背景

万国道德会以社会教化团体的名目出现，以慈善之面目收买人心，大讲人道，宣传逆来顺受。明则提倡女学，兴办义校，实则进行愚弄，使其甘受统治者之压迫，反抗者即为不道，顺从者誉为有德。因此颇得统治阶级的支持与提倡。

从内部成员来看，大多为统治者（官僚、地主、巨商、士绅），掌握领导权，而一般贫苦百姓吸收入道进行利诱、愚弄听其摆布。因此，国民党政府及伪满政府都大加支持利用，以期利用万国道德会为其培养“顺民”与“臣民”。一些大官僚亲自出马，打入会内，掌握实权，也有的暗中操纵，给予活动之方便。因之数年来发展颇广，遍及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沿海一带及东北九省。按地区说，华北会员多于华中，东北会员多于华北。伪满时期，其组织遍于县镇，据不完全统计，伪满时期，会员达到八百多万人（不一定准确）甚或更多。仅以绥中县来看，经常活动之会员即达三、四百人(挂名会员不在其内)。从组织来讲，各地分会之会长均由地方官吏（省、市、县、镇长）兼任。由此可见道德会之生存乃仰仗于为反动政治服务，并非所宣传之“平民团体”，亦非所提倡之“非党派宗教民意代表”虽非宗教能融合宗教，亦非所谓超政党宗教，另造时势，作中流砥柱之团体也。

在一则“会员问答”中即直认不讳的供称：“本会在教育上、政治上、国防上、均有相当重大之责任”。不言而喻，其责任就在于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之人材，缔造只许买办官僚、地主剥削压迫，不许百姓反抗斗争的“大同世界”。

三、万国道德会与王凤仪

第一、王凤仪的出身

王凤仪（树桐）热河朝阳人，世居朝阳城南一百五十里，地云蒙山树林子村。幼时为地主放牛，十四岁时给地主

扛活。清代甲午年间有二道沟士绅杨柏（字荫轩）宣讲善书，遂入学听讲后自悟道。在其父死后，守其父墓三年，利用此一段时间为人看病，讲其伦理，劝病，乡民迷信，故往来者很多，有百里之外求治者，至此名声渐扬，称为"王善人"。王凤仪从此弃农讲道，周游各地，创办学校，兴办义务女校，直到伪满康德四年死于长春（新京）。因其目不识丁，而能创造一套"道德经"，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已视其为超乎"神"了。

第二、一付奴才相

王凤仪之子王国华于伪康德二年所著一本《笃行录》，录其父一生之活动，有些近乎神离，大肆渲染，即勾画出一付甘为地主效劳卖命之奴才本色，兹录两则于后，可借此了解王凤仪本来面目。

其一，原题："牧牛时仁至义尽"

家父牧牛不与其他牧童同在一处牧放，因见其他牧童将牛羊圈在一处，不问草之足食与否，一或出圈即行毒打，甚至有打断足者，有伤痕生疮蛆者，有食不得饱生病而死者，有以强凌弱而负伤者。家父见此种种情形非常痛心，所以牧牛二年，未打伤一牛，病弱者另行牧放，不令同群，生息时尤特殊照顾，不令受伤。冬日晚间常将牛犊置于伙房里，因此孳生甚多，且常谓牧童曰："因有此牛羊，东家才与我饭吃，我若不注意令其肥大繁殖，岂非太无心肝乎"。

其二，原题："佣工时立志矫俗"

家父每见常人佣工（俗云找活），主仆两方互相争论，甚至有差钱无几而事不谐者（俗云不妥），因此立志曰，我当一个不讲价的佣工者。因之无论到哪家做工，均由东家作

价，未曾争论一次。惟工作时特殊注意其事物，故初年似乎工资较少，而次年增加甚多。且常自足曰："以疲弱之身而能与身体魁梧者比，真幸运极矣"。

注：此二则均采自伪满宏道善书局出版之王国华著《笃行录》内。

第三、王凤仪之道德观

"我也不是佛教，我也不是道教，我就是讲究人道"。这是王凤仪所讲之"道"，其道有三：即姑娘道、媳妇道、老太太道，每道都有几句经：

甲、姑娘经——姑娘性如绵，志如根，身有补助力，提满家为已任，是一家之贵星（其意大致为：要当好两头瞒的姑娘，别当两头传的姑娘）。

乙、媳妇经——媳妇性如水，意如根，托满家为已任，是一家之福星（其意大致为："媳"为女加息，万事息争之意。"妇"为女加帚，意为主要好帚勤于活，少多嘴，合五色，合六味，不单独行事）。

丙、老太太经——老太太性如灰，志为根，巍巍不动，兜满身为已任，是一家之福星（其意大致为：二十岁至四十岁为行道，四十岁至六十岁为成道，六十岁至八十岁为了道。所以说老太太要做人样子，所谓老景本无多，不必苦张罗，儿子也别管，媳妇也别说，这样就能享福了）。

王凤仪还说："人当好了，国家也就好了"。并宣传"人之相对而生，绝对而行，理论两本，倒找一面"。家庭中各行各的道，论情不论理，别讲父不慈子不孝，各人按各人的道要求，自然就好了。他还说："女子为本，女子不明道，就要生胡涂子女，胡涂传胡涂，就变成胡涂世界了"。因

此他提倡办义务女学，办妇女讲习班、识字班，企图从胎儿出世就由其母灌输他的奴才之道。

王凤仪周游东北各地劝道离不开其“三界分清，四界定位，五行圆转”的主张。他宣称“三界”是人的来踪，“四界”是人的去路。

“三界”讲：性、心、身。

性——去习性，化秉性，反回原来天性（以天性作事）。

心——去私心，去贪心，反回良心（以良心待人）。

身——去罪身，去嗜好身，反回德身（以德身处事）。

“四界”讲：志界人、义界人、心界人、身界人。

志界人——为佛国人（有向上志气，立地成佛）。

义界人——为天堂人（不做坏事，唯命是从）。

心界人——为苦海人（勾心斗角，计谋巧算）。

身界人——为地狱人（争贪搅扰之人）。

“五行”讲：金、木、水、火、土。

事事离不开五行，其内容大体与算命之唯心的性理学，大同小异。从像貌上观性，讲相生不能相克，分出各种命人之面色，如：金——白色、木——青色、火——红色、土——黄色。

并称某性都有阴阳两面。谓恨、怨、恼、怒、烦为五毒（恨则伤心，怨则伤脾，恼则伤肝，烦则伤肾），并劝说人要“房子小小的，钱要了了的，人要好好的”。

第四、江、王合流后万国道德会之发展。

万国道德会在王凤仪未加入之前，东北仅五十余处（辽、吉、黑三省）。自民国十八年义务女校与会合流，数

量倍增。直到伪满期间，十四年中便推行总分会十三处、市县分会二百零八处、乡镇分会五百二十九处、义务两级小学四百处、安老所六十处、职业传习所五处、怀少园（有的叫幼稚园）一百四十四处、民众讲习所六百五十处、访问团四十五团、戒烟班三百四十二处、簿记讲习班十二处、节孝讲习班二十处、商业讲习班十四班、幼师讲习班十七处、保母讲习班十二处、干部讲习班二十八班、职员训练班四十六班、初级讲习班五千九百班、中级讲习班四百二十班、高级讲习班六十九班、崇俭结婚之家庭计达五百家、朝阳凤仪师范女校一所、辽宁明德中学一所。从关里看来，自"七七"事变起各地统计分会才二百五十处。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发展之迅速，其原因：其一，为王凤仪之声名影响，并将遍及南满江北之女校六百余处。有的并入原有的分会，有的以女校改变立会。除此以外，并宣扬王之主张，提倡叫储金、崇俭结婚，活动颇为活跃，并办农林场、养蜂场，王虽不对外出面，却力争宣传王之"三界"，分清"四界"，定位"五行"，圆转之道。其二，为伪满抓其道德会之影响，大肆扩充拢络人心，变道德会为御用工具，进行建国精神之宣传，以期宣传日满提携，共建王道乐土，达到愚弄人民之目的。以大讲道德为名，而缚人民之手脚，使其头脑麻木，便于统治之。

四、改名"满洲帝国道德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关内外交通隔绝。一九三三年总会授张雅轩全权，与高正午出关在长春统辖东北会务，张为长春总会监理，高兼辽宁总分会理事

长，并创办辽宁、吉林、黑龙江总分会。时王凤仪已居长春，一九三六年康德三年日人三谷清(本人身分不祥)，得肺病，请王凤仪医治。王向其讲道劝病，病渐愈，颇信服。便言道“万国”岂不与世界有联系，无疑未与中国脱离关系，王虽不服也不敢抗辩，下面人也不敢伸张，遂改满洲帝国道德会，设总会在新京（长春）东三马路。后约在康德七、八年间又在满洲帝国道德会名目之前加“财团法人”四字。

五、倡办农村道德会

伪康德四年王凤仪开始创办农村道德会，此时义务女校均被日伪收去。王提倡办农村道德会，可以自给自足，不须人资助，一心办安老怀少之事。这时王提倡世界大同之先导，遂后有伍孝子、朱允公、高正午下去办农村道德会。其大体宗旨只听说分甲、乙、丙村。道德行圆满者为甲村，次之乙村，再次者丙村，可逐步升级。王并主张一人半天地，多了不行。并说一起吃饭一起工作，设立大同公祠，大同公墓，据说曾在苇河县实行过，即苇河农场。是年王凤仪死于新京，事后就不得详知了。

六、伪满绥中县道德分会之概况

第一、起始：伪满康德二年冬季，由锦州省道德总分会来游行讲演团，讲演地址在红十字会院内，后在苏育德院内，开办新民女校。张振阁任校长，不多时日，官方接收女校，张守珍（张振阁之族宗妹妹，张凤阁之侄女）原为女校学生。张振阁即让张守珍开办妇女讲习班（在观音堂胡同），请了个女主任，刘女士（忘其名）主持班内事务。

有贺俊卿患精神病，请刘女士讲道给讲好了，贺就节约素食拿钱拿物资助讲习班之费用。后又由锦州来一日本人"岗本"与锦州省道德总分会理事长赵见龙与绥中政治要人张凤阁接洽，劝张凤阁出面主持道德，张先不允，后经说服，随立道德分会，登高一呼遂即成功，时为康德三年春季。

第二、组织：会长三人，正会长温继岍（绥中县长），副会长张凤阁、常国和。理事长三人，有李国忠、贺俊卿、高淑洁（女）。

会内设四科：即总务、会计、调查、人事四科。

并设有下列各系：德育系（讲道）、智育系（讲学）、文书系（办公文宣传）、庶务系。各系设系长，视各系工作之繁简设事务员多少不等。各村镇支会：有郑福屯支会、黑山台支会、黑水台支会、前卫支会、前所支会、广顺台支会、天龙寺支会等六处。

郑福屯设一安老所，绥中城内由道德会十字会合办一所幼稚园（道德会出人，十字会出钱）。

第三、会员：游行讲演团赴各地讲道，演说凤仪学说，有要求入会者，须经会员介绍，填写志愿书一份，即发会员证及会徽。会徽为圆形，白底金字，篆书"道德"二字于中心。会员入会须缴入会费壹元，不能拿者酌情免费。全县会员经常参加活动，并有联系者约三、四百人，其中妇女居多。

第四、职员：会长都往会里拿钱，量力捐助。小职员大都为义务，不取报酬，困难者由会补助一些。女士们、职员都有些衣履费，分甲、乙、丙三等。给钱五、四、三元。

职会员表现好者，由公共资金出钱给其"立业"，或有

钱者自己储金"立业"，公推者系由公共资金提出三百元（最低）至三千元（最高）不等，储于新京总会会员义务贮金保管处，并立名给受业者，"积金手摺"一本，按年计给生活准备金一成。"立业"即为终身会员，我即为"立业"之人，必须终身献于道德，不得另作其他事业。王凤仪曾倡办此事，并说："创业世界已过，今后乃立业之世界。"创业结仇，立业解怨，冠其堂乎曰："立业乃人死德不灭"。即人死后可以立业之钱取一部帮其葬送，另一部钱又可以给更多的人去立业。他说："将来世界就变成这样世界了"。

职员徽章亦是圆形，系白底黑字，中书正楷，"道德"二字，以示以一般会员区别之。

第五、终身会员之"五戒条"、"十信条"。

五戒条：（1）戒除不良嗜好。
（2）戒除特殊气禀。
（3）戒除虚妄言语。
（4）戒除矫伪行为。
（5）戒除迷离信仰。

十信条：（1）节饮食。（6）笃伦常。
（2）慎起居。（7）守法律。
（3）历精勤。（8）兴公益。
（4）尚节俭。（9）尊圣哲。
（5）尽职能。（10）勋会务。

第六、各种活动

对外讲演：经常开讲演大会。当时伪政府需要宣传就抓道德会来宣传讲演。比如禁烟即抓道德会，但无论宣传什么

学说，必须贯串建国精神、国民训、回銮训民诏书三项，违反其精神者，即为反满抗日分子。

下面再将对外之活动部门分别简述之

（1）妇女识字班：——招收对象是十二——十八岁的姑娘。目的辅助教育之不足，除识字外并讲王凤仪之道德学说，一年一期，够程度毕业可送官立学校或升本会举办之妇女讲习班，没学成者可继续学习，每期也收些学杂费，识字班之教员视学生之多少而定。

（2）妇女讲学班：——招收十八岁以上之妇女。主要讲授王凤仪之妇德女道，每期四个月，约收三、四十人，会员及非会员均可参加。有固定学习地址，在内食宿，每月缴纳一斗米，实无力缴纳者由会内负担。毕业后成绩优良者或留会工作，或送锦州中级讲习班深造，将来派往各县担任讲演主任（或讲习班主任）。

以上两班从绥中县来说最多设过三十一处。

（3）游行讲演团：——不定期，每团六、七人，每次组织四至五团到各村讲演王善人之学说，但每次必须讲建国精神，最多时一次编过八至十团。

（4）安老所：——均系孤寡之男女老人。设在郑福屯，最多达到三十人，一切开支均由会内各善友自愿赞助，并有四、五天地供其耕耘。所内有一专职讲演主任主持，其活动除早晚各二小时行进清性（即立誓之意）归命（即行一日之反省之意）外，即无其他活动。

（5）幼稚园：——约有四、五十小孩。有保姆三人，一个主任，二个讲演员，收学杂费不多。

（6）对内训练：——在会职员及学员必须精读本会印

发之道德书刊，领悟王善人之精神，实行“储金立业、崇俭结婚”，每日早晨须清性，每人叙本日应如何作人，怎样作人，作人的方式，如何养成一个健全道德人材等。每晚须归命，即以早晨之誓言检查一天之行为举止，观其全日作人作的怎样。两人发生摩擦谓之“碰性”，必须在归命时作一番反悟才算拉倒。

（7）经济来源：——会内开销统由各大善士赞助之。有捐地产者，有捐衣物者，有捐银钱者，有捐谷米者，多者多捐，少者少捐，会内规定宗旨为自动捐助。其次靠收缴会员费。其三为自给自足，靠会员劳作生产解决。

（8）产业：——分会有房产十二间，土地四、五天（不包括安老所之经营田亩）。

七、进："职员高级训练班"之始末

一九四五年（伪康德十二年）六月一日，我进新京财团法人满洲帝国道德总会职员高级训练班受训六个月，至十月二十三（已光复）毕业。

对选送学员之要求

（1）要求在道德会服务五年以上者方为合格。

（2）要求被选送之学员，按总会所定题目，写出两篇文章：一为“道德会之我观”，一为“志愿文”（见后边附页），经总会职员高级训练班审核合格方准了入班。绥中县被选取者二名，一为我，一为刘芳龄（女），报到地点到新京东三马路路北一〇三号。

此班主任为括兴华（总会教化部部长），副主任为徐善修（清华毕业生），教员（讲师）八人，学员共计六十人，

每日上课约十小时。每隔几日有一次“滤道”（就是检查学习成绩之意）重点学习课为“道德真缔”。其研究题目有以下几科：

（1）道德真缔（2）东洋史（3）论孟（即论语、孟子）（4）簿记学（5）建国精神（6）法律规程，共六门。教员分工为：

何其大：授法律规程。

汪冠九：授文书知识。

张绍昌：授道德历史。

徐善修：授道德真缔。

王龙图：授道德福祉。

岳兴华：授东洋史。

苍先生（忘其名字）：授论孟。

吴先生（忘其名字）：授簿记学。

训练两个月，街面即不稳定。“八·一五”日本正式投降。长春市面非常混乱，共产党在街头宣传，苏军亦已进城，不几日国民党之接收大员也相继到达，交通也已断绝。我等学习也不安心，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此时岳兴华曾在训练班说：“如今光复了，实为乐事，过去咱们都学习伪满之事，今后我班仍继续举办，不过愿学者可继续学，不愿学者可听自便”。家近者都回家了，家远而火车不通则留下继续学习。留者共计三十多名，以后岳兴华亲上北平万国道德会联系去了，班内交徐善修负责。徐说：“你们三十几人由我负责，仍照常开班，不过建国精神改授‘三民主义’了，由张绍昌（总会企划部部长）授讲。”

此时又将总会名目改为“万国道德会东北临时联合会办

事处”，职员高级训练班名目不变。

正当恢复上课不久，国民党长春市党务专员办事处，即借我们地址开党员讲习大会，参加者都是王道学院等学校之学生，我们班也选十五名参加旁听，其中有我，共讲习二十一天，内容主要讲“三民主义”，结业后留下了我们的名字。

八、国民党时期的绥中万国道德分会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我由长春回到绥中，打算把绥中的道德会复兴起来。这时老人已经散了。我便联络旧道德会人，进行重整旗鼓，粉墨登场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便亲往求见原道德会副会长张凤阁，并向他说明复兴之意。此时张颇不爽意，情绪低落，皆因社会指责其为汉奸之故，经我再三劝说，张才准备出面仍办道德会。一九四七年一月又接辽宁支会来函邀请参加辽宁省支会举办之新春讲教员大讲习。我便与张一同赴沈。时张兴南为万国道德会辽宁支会会长（过去当过东三省议长，并在国民党省长徐箴未到任前代理过几天省长），各地参加讲习者约二百余名，均系地方道德会骨干人员。讲习前伪省长徐箴亲临讲话，详细内容已记不清楚，无非讲几句捧场活而已。共讲习十几天。此时听说国民党东北行政长官杜聿明邀请宗教教化团体首脑人物聚会研究所谓“戡乱”办法。当时道德会方面有张绍昌参加（张为辽宁省道德支会理事长），张答：“内乱要把握人心，研究宗教道德可安定人心”。后来杜聿明便下了一张布告（石印），其意大略为：“任何军宪警团不许借故妨碍宗教、道德事业”，嗣后，我们都拿着布告各回本县，张贴于本会门首街

墙，果然原住我县道德会房屋之军队纷纷迁出。自此清理本会产业，挂上招牌，又重新开始“办公”。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被选充万国道德会绥中县分会常务理事。理事长为张凤阁。另一常务理事为王汉臣。理事会由九名理事组成。此时组织情况已变更，仅设二股，一为服务股（掌道），一为总务股（掌法），也即服务股系对内，总务股系对外。当时服务股长为张世相，总务股长为刘庆余。

这一时期国民党连吃败仗，共产党大举反攻，声势愈来愈大。绥中地区亦有八路军经常出没于农村。人心所向共产党，而城内之地主、官僚亦动荡不安，惶惶终日，自顾不暇，那有闲心顾及“道德”，因此，国民党时期的万国道德会绥中分会，亦仅是一个架子。农村道德会已形解体，除将大郑福屯之安老所迁回城内外，又在城内各组一期妇女识字班与讲习班，其命运已注定灭亡。之后，实为我一人支持门面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绥中解放，当时解放军之炮声隆隆，绥中万国道德会院内独我孤守空房，在强大的炮火震荡中，炫赫一时之所谓“平民团体”、“教化组织”亦随之官僚地主阶级之末日而土崩瓦解了。

附页

一、在新京财团法人满洲帝国道德会职员高级训练班时，每早必默诵之誓词：

1、我们是仰体善人之教诲，穷理尽性，以致于命。

2、我们愿遵守本会章程，顾全大体，并矜细行。

3、我们重视朋友交谊，忠告善导，直心真诚。

4、我们决破除护己短见，虚衷应物，实践躬行。

5、我们注意本会系统，听令受命，绝对服从。

6、我们要抱定自己的本份，立身行道，不越范围。

二、在临去职员高级训练班前，我所作命题之两篇应取文章

1、志愿文

余生不辰，行年九岁，慈母见背，及长未几，家严作古。余以舌耕为业，嗣闻善人大道，顿开茅塞，毅然加入道德场合，从事服务，已五年余矣，未受训练，此次得入高级训练班，藉资深造，良非偶然，此天与之良机也。卒业后，使我之所知，所行，尽量发挥于后进者，永远赓续不断，仍使后进者递传令之后进者，故吾生生世世伴随善人勇猛精进，不做栏外之超人也，此余入班之志愿也。

2、道德会之我观

大国家之兴亡，世运之兴衰，英雄之成败，予读史书，稽古证今，未尝不深深讨其原理，故亡必有所由，兴必有所兆，此兴亡之道，岂可不求甚解乎？若知当今之世，际此自战体之下，正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世界和平，复兴东洋之文化，以期早日实现，此非国运兴亡之时也。尤其我道德会，担当教化之使命远尊孔孟，近法善人。大声急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救世救人之口号，实不能徒脱空言，以作清谈之高客，余思至此，不禁有感焉。欲罢而不得，吾知我会中徘徊不进，精神麻木之同仁，不知凡几矣。鸣呼！今后我会推进之方策，不得不详究其意义，以进展也。余虽不敏，自笑雕虫小技，愿将余之所感，供献诸公先进之前辈，兹列举于下：

首先积极建设农村道德会，以谋自给自足，而顺兴国策，使地无余利，民无余力也。货无弃于地也，力无恶弃于身也。再则训练道德才智兼备之职员，积极筹设省县各会男女学校，灌输道德之种子，造就才智完备之青年，促进人类健全也。

综合以上各节，以余之鼠目寸光而观之，实我教化事业当务之急也，亦即是余之道德会之我观矣。

梨果之乡话今昔

李俊儒　杨永平

绥中县北部山区，盛产水果，以梨为主，并以白梨为著名，畅销全省，在国内外市场也负有盛名，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所谓质量高是核小、糖质多。绥中白梨有悠久的历史。从解放后，在党的大力扶助下，有很大的发展，产量最高年份达四、五万吨，行销国内外，在绥中县经济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因此山区人民生活大大提高了，不仅丰衣足食，有的人家盖了新房，添置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广播喇叭等。贫困落后的山区，变成了繁荣富庶之乡。今天山区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美景和过去比较真是何啻天壤。在旧社会管山区叫做穷山沟，吃的是玉米粥掺树叶，十七、八岁的姑娘穿不上裤子，吃不饱穿不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着这个苦日子。那时梨果为什么不起作用呢？那时梨果也养肥了一些人，在绥中城里有发财致富的几大梨窖和几大梨店，以及各式各样的梨商。我们俩人在旧社会长期经营过梨果，对绥中过去梨果商人经营梨果的一些手段和梨农所受的种种盘剥，知道事情比较多，现在尽个人所知，愿意把它记录下来。

一、梨果产区情况

绥中梨果最多的地区有大王庙、明水塘门、秋子沟、葛

家、宽帮、和尚房子、大屯等地区。后两个地区属于建昌县，在过去属于绥中县梨果经营区。这些地区离绥中近的七、八十里，远的一百四十多里。这些地区山地较多，种庄稼的很少。人们一向靠梨果维持生活，粮食大部分靠外地供给。在过去山沟里，沟沟岔岔家家有梨树，多的几百株，少的几十株或十几株。交通非常不便，加上那时候梨农对技术措施不懂，力量单薄，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梨果丰收与否，全是靠天吃饭，凭天赏。至于产出的梨果出售，也任梨商任意摆布，得不到实惠。

二、梨商的发展变化与种种的剥削形式

在很早以前，距今六十多年前，绥中铁路还未修成的时候，绥中就有经营梨果的梨商，一般的管他们叫"大杖子"，意思是梨窖周围用秫秸夹上杖子围墙，由他们收购和销售。买梨的一般是沈阳、吉林等地商人，用大车来时拉烟、麻，回去装运梨果，也有一部分海运到营口销售的。当初只有李老纯、张老庆、黄老恩等人开的"大杖子"梨窖四、五户。以后铁路修成了，梨果运销便利了，梨商就有了发展。到民国年间和伪满时期，梨商发展到大小二十多户，较大的有万太德（财东朱子阳）、张梨窖（财东张老庆）、永德长（财东马三麻子）、四合顺（财东杨老福）四大户。梨栈专以承受托运梨果为业的就有十三户。较大的户有福兴和、信发和、永德栈（马三麻子经营的）、永发和四大户。还有六家梨店，专门代客买卖梨果。这些梨店有兴和成（路老翠经营的）、福巨兴（邢老恩经营的）、天成东（宋老国经营的）、福巨成（李老纯经营的）、谢家梨店（谢老振经营

的）、王家梨店（王老润经营的）。

到伪满时期梨商比旧中国时期又有进一步发展。因为日本鬼子占了东北以后，铁路统一了。运输更便利了，原来南满、中长、京奉、陇海各条铁路主权不一，互不衔接，中途屡次倒车，货运很困难，梨果属于鲜货，时间性强，必须快运快销。加上伪满经济统制，梨果受统制比其他各物品较晚，其它行业受统制后，有很多人转入梨业，购销形势又有了变化。由于梨商的竞争，由原来的坐地收购转到产地直接收购，因而在农村又出现了“梨果买办”和“白脖子梨客”。在城市也出现了梨果小市场等等形式。这些形形色色的梨商象蛆虫一样吸吮着梨农的血汗，他们过寄生生活。

首先谈谈梨商的经营方式和购销过程

（一）梨窖：主要是贮藏梨果，以囤积居奇和进行大宗运销为主。他们通过梨店坐地收购，或到产地直接收购。一般是秋储春卖利润很厚。合行的，平时也行进大宗运销。大户梨窖平均储藏量高达三十火车之多，专有一套人马，长期雇用人员八十多人，临时性工人多达三百人左右，这种行业是梨商之中最殷实者，后来梨商们看到梨窖有利可图，一些梨店等也代上了梨窖储藏业务。到伪满后期梨窖的经营者，把兼业的算在一起达三十多户了。

（二）梨栈：专办梨果客商的托运业务。梨商把货物交给他们办理运输，每车梨只收取手续费。这类行业也托运其它货物，也有的梨窖兼营梨栈者，如永德栈和永德长梨窖都是马三麻子开设的，这样更便于梨果的运输及时获得双重厚利。

（三）梨店：是代理店，梨果交易市场性质。梨农运梨

到梨店，通过它来卖，梨客梨窖小商贩通过它来买。每天叫行，成交后向买卖双方取佣金，并代办梨农和外来客商食宿，收取食宿费用。这种行业无赚无赔，从中吃干的。后来有的也象梨窖似的储藏梨。一般都是在梨行不快的情况下，以较低的价格收买梨农的梨存储起来，准备梨行快时再卖，所以获利很厚。

（四）农村梨果买办：这种行道的产生是由于梨商的竞争，由坐地收贮发展到产地收贮的一种产物。因为在小农经济个体时期，梨商到山区沟沟岔岔分散收购是有困难的，所以梨商在产区就物色了代理人，由他们把一家一户的零散的梨果，代梨商购起来，梨商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大概每火车几十元费用不等。另一方面梨商一般的采取赊购办法，这些买办又起“担保作用”，就是担保负债。梨农和梨商不发生关系，买办一手托两家，是个交易的桥梁。这些买办大都是当时农村有钱有势的一些士绅，一方面被梨商利用互相勾结压榨梨农，一方面这些人平素也是梨农的统治者。他们除了得钱之外，每到城里梨商处，可以吃吃喝喝满受招待。在产梨地区这种买办著名的大约有四十个左右。分布在产梨集中地区，在大买办之下，还有不少他的腿子叫小买办。小买办散布在各个村屯，这个数量更要多些，他们在大买办所得好处之中，也喝点汤汤水水。最著名的大买办，有碣子山的朱正德、明水砖杖子的娄振安、明水黄土坎子的陈殿恒、明水杨家杖子的刘长平、大王庙水泉沟的李树芝、建昌县朱杖子的朱子扬等。他们对所在的地区进行垄断包办，别人不许到他的地区去买，梨农也不许到别的地区去卖，梨商离开他们也买不成。他们本身也有很多梨树，个别的发展为座山梨商，

自已经营。在产地设有一套经营梨果的人马，在绥中县城也开设梨窖，如朱子扬在绥中开设万太德梨窖。同时私（土匪）、官（旧官衙）两项他们都吃的开。如朱子扬家中有炮台打手，小帮土匪不敢进，大帮土匪是朋友，伪满警察和他们都有交情，形成地方恶霸，无人敢惹。梨农不卖给他不行，梨商不敢到他的地区染指。另有绥中马三麻子和他拉上了关系，让给马三麻子两个沟的梨果（大杨树沟、枣木棒子沟）。

（五）白脖子梨客：即所说的跑车板的零散行商。这些梨商是由农村梨果买办分化出来的。有的买办看到贩运梨果赚钱，他们有时也收购梨果，多以赊购的形式成车或担装梨外运，进行投机搗把。因为他们这些人久居农村，到外面大城市卖梨情况不熟悉，货少本小，大城市货栈很瞧不起他们，往往赶不上行市，多有赔钱的。他们穿的又土里土气，上身是短棉袄脖领里面是白布的，大城市货栈称他们为“白脖子梨客”。是一种讽刺嘲笑之意。他们把货卖完，受别地客帮拉拢要钱，逛窑子，有的把本都遭光了，往往坑了梨农。

（六）露天梨果小市场：对周围附近农村所产的零星梨果，在西关露天广场有小市场。也有一帮吃经济饭的当地梨牙子，拿着秤从中掌握买卖代为过秤，收取佣金。总之大大小小都有人要从梨果中捞一把。

其次谈谈梨商几种剥削形式，梨商所以很快发财致富，对梨农采取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大体上有五种办法：

（一）差价：贱买贵卖，垄断居奇，获得高额利润。因为几户大梨窖通过买办到产地收购梨果，后来梨店也兼营

梨窖，收购价格自然操纵在他们手里。梨农得不到实惠的价格，特别是梨窖秋储春卖利润更大，对差价利润来讲，在当时还算是比较正当的，除了差额利润以外，还有以下几种额外巧取索套。

（二）赊购：梨窖到产地通过买办收购梨果，一般的不给现款，大多数是赊欠，定期偿还，往往把梨卖了之后，周转几次才偿还梨农的梨款。所以梨农一年辛辛苦苦收了梨，虽然卖出，还不得现钱，就是还钱的时候也是分期零星偿还，七折八扣顶不了大用。大的梨窖如永德长（马三麻子的），凭着他的财产信用大，还发行了期票（即欠条），在收梨时顶钱发给梨农，按着期票付款的日期，持票到永德长取款，有时这种期票还流通市面，和纸币有同样的效力。对于赊购虽然有付款期限，但往往不能兑现，梨农因为到期催索梨款，往往成群结队到农村买办家去催促，而买办就跑到城里隐藏起来不给面见，梨农只得忍气而返。尤其甚者，有的梨商因挥霍浪费把本赔光，结果也就坑害了梨农。我记得大王庙吴二沟白脖子梨客孙老巨，把到沈阳卖一车梨钱都遭光了，结果还不上梨款，坑害了十几户梨农。还有天益福梨窖商晁一，将赊购来之梨卖出之后，假造赔累，把买卖荒闭了，声言业不抵债。梨民到他家来要钱，一看什么也没有了穷的够呛，只好自认倒霉而已。过了一、二年后，这个家伙把钱拿出来置了好几垧地。他们就这样的巧取豪夺压榨梨农。看来绥中过去那些发财致富的梨商都是赊购梨果来作本钱，白手起家的。

（三）高秤：这些梨商们不仅在价格和赊购上找便宜，他们还在秤头上做文章，搞涨秤。这些梨商们平时豢养一些

“秤头”（过秤的人），在收购梨果过秤的时候，用大秤铊，每包梨一般一百二十斤，只能秤出百斤来，掉秤二十斤。他们的办法是：有明的有暗的两种。明的就是那些土豪买办仗着势力，把秤铊故意放在一百斤上，一抬即撂下来，卖主如不同意时就不给你过秤了。把你的梨放在一旁不理，梨农因为怕得罪他们，又不敢到别处去卖，最后还得哀求他们认账了事。这样的事，买办朱子扬最厉害。所说暗的就是秤手把秤杆用烂梨搓碎往上一撸，光滑的秤杆变成涩的了。再把秤铊上的细绳换成粗绳，一方面可以多压星，一方面这样就可以放到哪就算到哪。秤杆撅多高铊也不动了，并且掌秤的和抬梨包的都是一伙人，刚一抬起来马上就一撂下，很容易迷惑梨农。久而久之梨农也摸到了他们的鬼把戏，因为梨农对每包梨重量多少心中也有个数，但每次卖梨都掉秤很多，吃亏不少。所以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来对付他们，梨农要求用他们自己的秤，有一次我和“秤头”们到葛家石硼沟梁老大爷家去收梨，这个老大爷把秤杆用油擦的又光又亮，把秤铊的绳换细皮弦也擦上了油，这个老大爷一开头就说了，咱们得公平交易秤上讲良心呀！要求用自家秤过梨，我们看透了他的心思，我们几个人就商议了对策，这时天快吃午饭了，我们说现在得休息一下，吃完午饭再过秤。在午休的时间，我们另一个同伴，偷偷地到梨包处抓几个烂梨用手一攥往秤杆上一撸，这样就变涩了。把秤杆放到背阴处怕被日光晒干了。午后开始过秤，还未逃出我们的圈套，把梁大爷弄得目瞪口呆，有苦说不出。在这其中还有一个笑话，高杖子有一户梨农有个傻儿子，为了躲避我们的高秤，他暗中把秤梨的秤铊底粘上一块黄土泥，结果每包少秤二、三十斤，他父

亲莫明其妙，为啥掉秤这样多呢？第二天梨运走了以后，这个傻儿子向他父亲说了："爸爸呀，这回咱可占便宜了，我把秤铊偷偷粘上一块黄土泥。"这才知道自己下药自己吃了，把他父亲气的破口大骂。为什么过秤的人这样呢？因为不涨秤他们的薪金就要少挣，还有保不住饭碗的危险。这些人都是吃卖良心饭的。马三麻子梨窖就有李宗、张玉仁、外号刘大饥荒等这些忠实"秤头"。

（四）苦投：什么叫苦投呢？就是在过秤装包之前，梨商雇佣一些投梨装包工人，由几个工头带领，用他们非常熟练的两手，把次梨投出去，投的特别细，不仅有伤痕的梨不要，就是够搯的也不要（指大姆指和二姆指合过来的梨全投出去），装的都是个大最好的梨，一般的梨给梨农留下。再卖就更不值钱了。当时梨农管这叫作"苦头"。

梨农为了取得被他们欢心，减少"高秤"和"苦投"，每逢装梨的时候家家户户准备一些酒菜好饭招待他们，较好的户有的杀羊，求他们手下留情，但也没有什么用，不过在损失上又添上了浪费罢了。

（五）套债：梨果产区的人民，根本缺乏粮食，即是梨果大年也得不到现钱，遇到梨果小年就更苦了，借粮借钱负债过日子，这是山区梨农的常事。而绥中几个较大梨窖，为了霸占市场（永德长、庆余祥、孙梨窖等），就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农村买办向梨农放粮、放钱，一般是月利二分到四分，就拿粮食来说春天借一斗，到秋天就得还一斗四升。梨果地区根本不产多少粮食，到秋天只有折算钱款用梨来偿还，这样到秋后产梨就必须指定卖给他们了，抵还债务，所以叫"套债"。意思是用债务把梨先套上，通过套梨又放了高利

贷，由此可见梨农所受的盘剥是一层又一层。

梨农也有通过自己运到绥中市场直接出售的。这只是一些有力量的大户人家，用车运到绥中来卖是合得上的。一般小户用毛驴驮一驮梨，途经百余里，卖个三元二元，去了盘费店账，所剩无几，也非易事。在那时候无论坐地出售或到绥中来出售，怎么办也不好受。所说受到这种盘剥的都是一些中小户。那时山区的群众生活象加碑崖、王家店、秋子沟一些地方常年累月喝玉米面掺树叶的稀粥，冬腊月小孩子光着屁股晒太阳。有梨不值钱，抱着金碗要饭吃。群众有一种歌谣说："梨果大丰收也喝包米粥"，"山户山户总不富"，意思是说梨果不值钱，债务累累，一年压一年，压的翻不过身来。

三、绥中梨商几个暴发户

绥中经营梨果商人有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大大小小不下百八十人，都依赖梨果过着他们的寄生生活。但其中发财最快的成为当地有名的财主，典型的有几大家：最突出的是永德长财东兼掌柜马绪武，外号叫"马三麻子"。他父亲那辈还是一个肩挑小贩。他们哥三个，后来都经营梨果。马绪武排行老三，手段最高。哥三个都亲自掌握柜事，他们采取的办法也比较毒辣，不但用钱收买梨行工人为他们卖命，在同行中还极尽大鱼吃小鱼之能事。在东北各大城市都有驻在员，消息灵通，和其他梨商作竞争，进行欺行霸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往吉林去一车花盖梨，行市每百斤八元。他们知道后，就往吉林发去很多花盖梨，照六元抛售，把行市压下来了。别的梨商因为核不上，谁也不敢再去了。以后行

市涨到十五元，而他们就源源发梨到吉林去，获了一笔很大利润，吉林就由他们一家包牌子了。马老大在沈阳皇姑屯设有总联络点。由妓馆里花了二千元买了一名妓女，善于交际，为他作妾。绥中东园子王鏊林，西关王云的儿子（名记不清了），是他们雇佣跑外的。我听他说过，王有一次到沈阳皇姑屯见大东家交待柜事，大东家对他很招待，看他鞋帽不整，就给他买了衣物鞋帽并嘱咐他说："好好干吧，肉肥汤也肥。"所以这些人都为他们效劳"。马家由于梨果发了大财，在农村置买好地三十多垧，有商号三处（梨窖、梨栈、钱粮业）。马家河子又植有三百多棵苹果树的果园。在绥中修建三处宽敞华丽住宅，家庭设有厨房雇佣厨师，过着十足的资产阶级生活。在敌伪时期各个衙门口也吃得开，所说钱大通神。伪满检察院，韩检查官住在他们院里，作为他的靠山，各警察机关也都走了门路。火车司机都为他们从大城市带急件行单信件，所以各梨商谁也竞争不过他。

孙梨窖原来也是一个摆梨床子起家的，后来变为绥中远近驰名的大梨商。在农村置有几十垧好地，建筑宽敞华丽的住宅。伪满警察署，管警尉住在他们院里，作他的靠山。

同顺祥、杨东瀛也发了大财，在城里置买宽敞的住宅，在农村置买了十八垧好地。

其他如陆老翠、宋治国、谢老振等几家梨店同样发了大财，在农村都置了田地，这些人在土改时都是地主。

四、伪满末期的梨果统制

梨果受经济统制比其它各种物资较晚。大概在伪满康德十年秋，建昌县首先成立了梨果组合，实施了公定价格。组

合设在绥中，对建昌地区出产的梨果，完全由组合统一经营了。绥中当时尚未成立梨果组合，各梨商仍是自行经营。但也要受到价格的限制，违反公定价格就算经济犯。我记得马三麻子、齐鸣远、孙梨窖等在四平高价卖一部分梨，由四平被查出，通过绥中警察署把他们逮捕了，打了经济犯。以后在伪满康德十一年，绥中也成立了梨果组合，归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统购。各梨商集资加入组合，到产地收购，分等包装送到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按等收购，然后由株式会社向外运或拨售给当地小商贩，这时期梨商的油水就不大了。

以上是我们两个人在旧社会，经营梨果时期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很不完整，希望知情者补充订正。

伪满隆化县禁烟政策的内幕

何浚洲

前　言

这个材料是我目睹、口尝、身行、手办的事实。

我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成长于民国时代的沈阳。喧身于伪满的奉天省公署、热河省公署、国务院总务厅等机关。曾任股长、事务官等伪职。游历过沈阳的鸦片巢穴，接触过张学良等吸食鸦片的军阀，也会见过前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和臧式毅省长等身染烟毒的政客，更见过我的亲友被鸦片所害流落街头的惨状。特别是在伪满国务院时，参加过鸦片会议，兼任过禁烟总局检查官，并在隆化县长任内，直接执行过热河省隆化县的烟政。隆化县是一个主要产烟地区，每年向伪满政府交烟干量达三十万——五十万两，因此所受的毒害尤甚于别处。并且自己也曾受过鸦片的毒害。所惜才疏笔拙，事多时限，很难罄我所怀。此次付梓，聊供史家斧正。

一、禁烟政策的由来

"王道主义"是日本鬼子侵占东北唯一的招牌，禁烟政策就是在这个招牌下挂出来的自欺欺人的幌子。它是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植树（也就是伪满当时实际掌握大权的真皇帝，奉承关东军第四科驻满日本军总司令部内特设专管

伪满行政事务的一个科，科长是少将以上的官级）的命令"在大同二年（一九三三年）奏请执政（溥仪）下诏，由国务院地方处和私报处共同作成禁烟计划，就开始了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毒化政策。

其实这个政策并不是从伪满才开始的。远在日本维新以来，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政府即执行了毒杀中国人的恶毒政策。他们利用旧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头脑昏庸，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制造和贩卖毒品的窟穴。如在大连有白面儿（海洛英之一种）制造厂，天津日租界上有海洛英制造厂，热河承德离宫里棱角洲北侧有鸦片提纯厂（假手热河督统汤玉麟主办）。沈阳南满车站一带的日本居民区，更是日本鬼子贩毒、制毒、运毒的场所。使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受其毒害。上至军政头领，下至商贾农民，很多人堕入他们的毒网。当时连号称中国海陆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也都受他的日本顾问荒木的引诱，吸食了海洛英。因此可以说这是日本鬼子蓄谋已久的一项毒化政策。只是到了伪满时期推行得更加明目张胆和有组织有计划罢了。

二、禁烟政策的目的

伪满禁烟政策也叫"断烟"政策。口号是："推行仁政，挽救鸦片瘾者，在十年内把伪满洲国的瘾者，完全戒除净尽，保证三千万人民的身体健康"。口号确也堂皇，可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大阴谋。它有以下三种用意：

1、把所有鸦片都收归国有，以便施展毒计。

2、扩大毒化范围，加重鸦片毒素，以便灭绝伪满的中华种族，好完成大和魂（日本民族的总称）的殖民政策。

3、为抽取鸦片精华，作成军用麻醉药品，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策略。

三、禁烟的组织机构

开始，怕人言物议，管理鸦片的专门机构没有单独成立，只附在专卖系统之内。在新京（长春市）有专卖总署，在省为专卖署，在县为专卖分署（后均改为局）。一面控制生活必须品，如大米、白面、烟、白糖、火柴、酒类；一面专门管理鸦片买卖事务。并于伪满全国各地大小城镇设鸦片零卖所，大施贩毒。

约在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年），特别是伪满第二个真皇帝武部六藏当权时，把这个机构加以强化，改归正式行政系统，在新京设置禁烟总局，成为国务院直属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在有关各省公署内设有烟政科，其它省则归实业科、经济科、农业科或总务科管理。在各县公署内也有同样的设施。

四、禁烟政策的真面目

1、禁烟初期鱼网政策

在禁烟初期，先对瘾者进行登记，发给登记证。凡持有登记证的人，都可以向管烟的机构领取大烟泡。这些大烟泡大多是纯质的熟烟膏，既好又贱，一般人都争先恐后的抢购，诱使瘾者竟相登记入网。因此毒化范围日益扩大，受害的人日益增多。

2、禁烟后期的残杀政策

把中国人诱上了"贼船"之后，便开始了残杀政策。其

手段是：

（1）抽取鸦片精华

鸦片固属毒品，但若吸食原浆本货，还是不能把人立时害死的，只能逐渐使人瘦弱，减短寿命和降低生育而已。日本鬼子感觉慢杀不解渴，在规定的“十年断禁鸦片政策”的时间内，不能遂行屠杀的任务，就别生毒计，把从民间收来的原浆大烟，送到新京南领大陆科学院（专门制造药品和毒品吗啡、海洛英的工厂），抽取大烟精华，充作皇军御用麻药。而把剩下的渣滓，再掺进一些带有兴奋刺激性强的硫磺等毒品，作成大烟泡供给中国人吸食。这些大烟泡，每一小包称为一函，十小包装成一盒，称为一中函，十中函装成一盒，称为一大函。层层包裹，盒盒精致，令人见而珍惜。瘾者买到家一吸食，感觉刺激性很强，很过瘾，越吸越离不开它，以致非吸它不可，就是再吸原浆烟，不管吸多少，反而不过瘾了。这种烟是越吸量越大，中毒也越深，用不上一年，就周身浮肿。病情是先由脚上肿起，肿到膝盖。皮肤即行溃烂，流浓淌血，不久即行死亡，毫无挽救办法。

在伪满热河等省，常常有横卧沟壑呻吟待毙的人，就是这类毒品毒害所致，这样的惨状我目睹多次。

一次，大约是康德四、五年的时候，我走到承德桥畔，看见三名受害者躺在五裂河的西河沿上，一名已死，一名稍有气息，一名尚能说话。询之，系承德中学学生，年仅二十几岁，中大烟毒才七八个月就弄到这个地步。似此情况，在当时可说是到处都有，不止热河一地如此。

究竟毒杀了多少人？虽然没有详细调查过，但是从人口的繁殖数字上也可以大致估计。伪满初期“国势调查”时，

人口是三千万，到光复时经过十四年，仍未见多。其它走死逃亡固也减少人口，但鸦片的毒害，还是最主要的原因。

鸦片减少人口的原因之二：一种是直接杀人，一种是降低人的生殖能力。吸食鸦片之后，人的身体就变得瘦弱，这些人多数是子女稀少的。日本鬼子深知此情，所以就用鸦片来推行它的残杀中华民族阴毒的政策。

康生院是断治大烟者的医疗机构。它是伴随着禁烟政策的推行，而建立的伪善机构。大约是在伪康德八、九年时，由于毒化政策的阴谋诡计日益为人民识破（八路军及其他革命志士就曾以传单多次揭露鸦片政策的阴谋），才迫使关东军授意武部六藏，挂出康生院这个招牌。大张旗鼓在全满洲各地收容鸦片瘾者，进行断禁治疗。又制造出一种名为“东光剂”的禁烟药，到处宣传他们的假仁假义。其实，康生院为瘾者禁烟，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

隆化县的康生院，最大收容量是六、七十名，而且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当时全县的瘾者不下十万人（全县人口二十二万人，轻重瘾者约占半数以上）。如何能尽数治疗？不用说三年五年，就是三十年、五十年也是无济于事的。况且从治疗效果上看，更属自欺欺人。

隆化县康生院第一期收容三十八名，三个月后仅有八名似戒除，但回家后没过两个月又旧病复发，而且吸食得比以前更为厉害，这不是一场骗局是什么？

3、鸦片栽培的断禁政策

（1）烟地勘查

禁烟必须断种，断种必须查地，理由光明正大，内幕却卑鄙龌龊。其非身临其境，是很难知道其中底细的。

勘查烟地，表面上是缩小鸦片的耕种面积，减少鸦片毒害，增加粮食谷物的耕种面积，充裕人民生活。其实在这美丽幕布的后面，真正演出的却是血泪交流的悲惨情景。

为限制耕种面积，每年春季都组织烟地勘查队。分别到各村种烟户实地丈量耕种烟地的面积，按照种烟任务，不许多种，也不许少种。并按土地等级分配烟干（晒出水分的纯烟）责任量。小苗出后再勘查一遍，将要割取烟浆（俗名大烟奶子）时，再勘查一遍，最后才确定交烟干的定额，即必须交给官家烟干数量。三勘定案，看来安排得精细合理，其实是另有文章。

勘查队一到乡村，立即和当地大户（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勾结起来。这些人家明明种十亩大烟，却只报一亩、二亩。而小户人家，不但种一亩算一亩，还要提高土地产量等级。对于勘查人员的招待费，也是以大压小，按户分摊。还有的狡猾的大户，往往花少报多，从中渔利。如果弱小烟户不服，就给加上阻挠烟政的罪名，唆使工作人员绳缚毒打，用看押的办法。因此，一般弱小烟户不管怎样吃亏，也得含酸忍受，不敢作声。

每勘查一回，弱小烟户就被剥削一回，就欠下了秋天的债务。至于烟干的任务，地少量多，更是无法完成，势必得去哀求土豪劣绅代为设法解决。他们的办法是让弱小烟户到深山另辟烟田，豪绅不给申报，坐享收成的一半。或者给豪绅们包耕他们隐藏未报的烟地，到秋天按三七或二八分。这自然是大户得利而小户空流血汗而已。对于不能出劳力的小户，就以高利贷的方法，贷给小户烟干，利息多半是大加一倍或翻几番，还得用房地产执照作抵押，甚至被迫卖儿卖女。

在康德八年，隆化县孙家营村南二十里的一个小屯子，就有一家把十六岁的女孩卖给三十多数的男子，才交了烟干。

由于营私舞弊，因而烟地面积是越勘查越多，有的小户到深山私自开荒地，有的大户隐藏不报准备放高利贷的。地越多，毒品生产也就越多，人民受害的也就越多。反过来，粮谷的耕地面积就越相对的缩小，人民也就越发受到饥寒交迫的痛苦。

隆化县老局子屯，我在伪满约康德七、八年时到过那里，见到许多青年男女没有衣服穿，只是腰中系一片破麻袋或布头。十六、七岁的男女孩子，赤裸裸地蹲在屋地的树叶子里。这里的人家因为赤贫，都在住屋的地下，炕上铺上一尺多厚树叶子，借以御寒和遮羞。这真是人间地狱的生活，这全是日本鬼子推行毒化政策的结果，是日本鬼子无法开脱的严重罪行之一。

（２）收缴大烟干

在大烟快收割完的时候，由县鸦片组合，兴农合作社和警察署等组成工作队，到各乡村催缴烟干。口称是把所有的烟干完全收尽，以免人民吸食，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实际上是别具毒心的，因为在收烟干时，不仅是收实报耕地产量，而且把春季勘查后，人民开阔的烟田和大户隐藏未报的烟田产量也一齐收尽，以增加全县产量，完成国家的收光计划。同时使瘾者除了买吸国家毒品烟泡之外，无从得到大烟来源，结果是贿赂风行，部分官吏大发横财。而普通的烟农在剥削欺诈之下，日益穷困以至倾家荡产。

（３）鸦片组合

鸦片组合是一个专门收购大烟的机构，也是豢养毒化政

策走狗的地方。内有鉴定（检查大烟质量的）、收购、保管、会计庶务等股。上有主事、董事等日满负责官员。隆化县的鸦片组合，一般时是四五十人，多时达百人，外有缉私腿子若干人，差不多各村都有他们的爪牙。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鸦片瘾者，大多数是地痞流氓，全是些毫无人性的东西。

管鉴定的人，把烟农送来的大烟奶子（即没有晒出水分的烟浆），打抹化验（利用手抹、眼看、味觉等土法化验），扣除水分，分等级，定数量，是一个烟农能否交上烟干完成任务的第一道主要关口。群众称之为“鬼门关”。不管交多少大烟，都得让他们先取一部分，名为“打样子”。其实用不多少，每回取来的样子都比实际用量多至几百倍，是一种发财的好手段。烟农谁也不敢违抗，稍一不顺心，立即为难重重：压等级、多扣水分，甚至硬说不合格，让你等候多天也交不上烟干。或者马上和一些狗腿子联系，故意到你家催逼烟干，轻则毒打，重即看押，弄得你俯首贴耳，任其宰割，方才算罢。

保管股负责过秤，向来是秤大多收，从中渔利。

晒烟股则上下欺骗和鉴定人员勾结在一起，明明是二成水分，硬说是五成水分；明明是一等烟干，硬说是二等。另外还掺糠使假，抵龙换凤，他们大发横财。身居上位的人员，对这种种黑幕，从来不闻不问。这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豢养爪牙的惯技罢了！

这种欺压所得，数目是非常大的。单单涮烟缸一项每次就能提出纯烟上百两，其他更可想而知了。这些取巧的收入，他们却认为是分内的应得，毫不避忌的共同分赃。

凡是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人，不论是干什么，每当烟季都

能大发横财，有烟瘾的自然是越陷越深，没烟瘾的早晚染上。不过他们所吸的大烟都是原浆土货，比吸官烟泡的人能多活几年。

这些败类还同伪协和会特务机关勾结，收集民间各种情报，成为警察特务的外围，就更无恶不做了。

（４）鸦片零卖所

伪满的鸦片零卖所有两种：一种是富人穴，也叫花烟馆；一种是穷人窟，也叫土烟馆。花烟馆多设在大城市，土烟馆多设在乡村。

这些鸦片零卖所，散布在伪满各地。经过前后约十年左右时间，除了贩毒杀人之外还负有特务的使命，按时向警察特务机关密送情报，害人无数。是日本鬼子很得力的特务助手。

总之，伪满的断禁大烟政策，名曰禁烟而骨子里却是推行种烟、收烟、卖烟。所谓戒烟（康生院）、实际上则是放毒。表面上是减少毒品，保证人民生活，口号是“日满共存共荣”。干的是你（满）死我（日）活的恶毒罪行。这个断禁政策十年，不知坑害了多少中国人的性命！